
種七第書叢院究研防國

章憲洋平太

譯 祚 永 金
庭 光 朱

行 卸 局 書 華 中

581
98

PACIFIC CHARTER

by

Hallet Abend



太

朱金
光永
庭祚
譯

平

洋

憲

章

中華書局印行



3 0662 7029 3



太平洋憲章

目次

第一章	一個對於成見之申辯	一
第二章	須要一個和平的藍本	九
第三章	截去日本的爪牙	一九
第四章	中國與日本	二六
第五章	中國與其盟邦	三四
第六章	自由——必須獲得	四一
第七章	菲律賓賓	五〇
第八章	法國在東方	六〇
第九章	泰國人的泰國	六七

第十章	荷蘭人怎樣	七四
第十一章	馬來亞的巨擘	八〇
第十二章	反英的緬甸	八六
第十三章	印度	九〇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亞怎樣	九六
第十五章	紐西蘭展望	一〇四
第十六章	水上堡壘	一一〇
第十七章	儲留備用的松岡	一一六
第十八章	賭徒近衛	一二〇
第十九章	不能有軟性的和平	一三七
第二十章	文字的烟霧	一四一——一五三

581
376
2

太平洋憲章

第一章 一個對於成見之申辯

這是爲辯護所謂成見而發的一個坦白的申辯，字典告訴我們，成見可說是一種反感，就是在未得到證據或事實真像以前的一種不公平的判斷，它是由一種情感或想像或聯想所構成的，在原則上講，除非有一種相反的意見能明白地提出，成見常常是不懷好意的。

當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軍隊開始占領滿洲，轟炸非武裝的上海時，美國的百姓就開始對日本發生一種強烈的成見，他們自一九三三年來，對於希特勒及其作爲也懷有同樣的成見。這些成見都是一種不知其然而然的反感，這種反感就是對於德日罪行而發的一種本能的感覺所造成的。

然而，幾年來我們的政府與人民並沒有攢實據與真相於門外，我們仍能聽取雙方一些令人作嘔的意見，結果對於日本主義與納粹主義的成見或者是敵視的預料都變成了（德日兩國）確定的信心，我們深信：這些成見是由於天性畏縮罪惡而形成的，因此現尙不能加以譴責，現在我們雖不能逕以此定德日之罪，但我們可以深信：當日本由中國手中擄取滿洲，我們即知其不合；而且當我們的政府宣佈不承認武力可以變更領土主權時，也會得到議會與輿論的擁護；當希特勒武裝德國，撕毀和約，我們也即知世界和平已受了威脅。

十年來，我們會聽見過日本對於他們政策的辯護，九年來，也會領教過德國人的藉口，在這漫長之十年中，我們並沒有貿然加入戰爭的漩渦，而不去權衡證據與事實的是非。但是，近年來我們的預料與成見是愈來愈證明是事

第一章 一個對於成見之申辯

一



(南)



01093

實了，他們的策略與信心更堅強化了，終於德日二國向我們攻擊了，他們攻擊我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確定他們的罪名，是這樣半不可破，不先毀滅我們，他們是決不能達到目的的。

根據事實的演變，現在我們敢相信，我們的預料更對了，我們對於全面勝利的信心，也就是基於我們這種對惡行所產生的反響，和所造成的成見——這種罪行非但危及我們的安全與生存，並且，也危及全世界男女的自由與身分。

本書是建立在成見上面，並且深信那些代表美國人民向侵略國家抗議而寫作的人，不應存有中立的企圖。本書對於希特勒或納粹及法西斯主義很少論及，因為作者本人並沒有在歐洲住過，即有所知，也不過是在假期旅行中，匆促而具有愉快的心緒中，略知其地的一個大概而已。故本書所論為遠東與東太平洋的一些問題，因為著者曾在東方住居十五年之久，此十五年中由於事實的報道，國際政策與野心之發展的觀察，并會為採取亞東各國複雜的內容而作過遠程的旅行，并非僅限於在中、日、菲等地居住時之所見而已。

自從德、日、義、三國放棄了和平與國際榮譽以來，美國一直對於他們懷有成見，如今幾乎舉國一致保證用我們的女源和我們的全部力量，努力來掃除那些侵略國所表現的罪惡。我們會聲明過，日本帝國主義，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存在一天，這世界便不適於我們，乃至我們子孫所居住。

難道這些保證與宣言僅是一種宣傳與演說嗎？我們所說的又究竟意味甚麼呢？假使我們是忠心於我們的宣言的話，那麼在今日各種可怕的企圖中，要在什麼情形之下始足為一種孤立心理而申辯呢？

當然，我們是有成見的，但是我們承認我們是應該如此，因為我們對於侵略者的策略與行動所預料的，這幾年來顯示得都有根據了。它使我們發生了一種心理，就是始而中國，繼而英國，法國以及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應戰都是值得的，現在我們已站在戰線上了，我們放棄一切一向以為公正無偏的懷疑，姑息與推諉，這正是時候了。當然我們是偏袒的，而且偏袒得很厲害，然而儘管偏袒，而我們遇到這麼大的罪行原應一決定後，就當不惜以全部生命作

孤注一擲，使這種罪行在世界上絕跡。

讀者讀到這裏，他似乎一定要想繼續讀到下面萬言的解釋與理論，他們也一心想要知道，什麼時候，為什麼我要首先對日本發生這種成見？以及有些什麼重要的事實造成了我對日本的預料是這樣的確定，以為美日戰爭是一定不可避免的嗎？

當我第一次到遠東，遠遠在一九二六年時，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三一年，我對於日本人民一向是讚賞的，在這段時期中的中國，內戰的混亂，暴亂與殘酷却使我氣沮，且無從爲之申辯，而且我更發見中國有許多所謂具有蘇維埃精神的反帝國主義演說家的說謊，簡直令人討厭。

北平是我的家，也是我頭三年在遠東工作的大本營，在這許多年中，長江以北的幾省都在幾個暴臣統治之下，他們無恥地壓迫并奴役這些一無援助的百姓。而日本人統治下的南滿鐵路一帶，却仍維持着法律與秩序，與河北山東那樣困苦顛連而無政府的狀態恰相反，這實在值得讚美的。

日本人在滿洲有她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與帝俄戰爭中得來的，也有從與中國所訂的條約中得來的，還有些權利是由行賄與可羞的威脅中取得的，但是他們在滿洲仍遭受到不幸，中國人到處設法破壞，逃避種種對於日本人正當的或非正當的義務，現在這些已變成陳舊的故事了，這是一個雙方都不幸的故事，但是日本人終於被激而興問罪之師了。我們從前也遣潘興將軍帶一支龐大的軍隊去墨西哥，其激怒人民的程度遠遠低於日本人首次施於滿洲者，但是潘興的軍隊畢竟仍回到老家來，而且我們也并不像日本在滿洲一樣。在那裏設立傀儡政府。

一九三一年秋，及初冬之時，當這年九月十八日所謂滿洲事變之後，日本在滿洲的軍隊是勝利了，於是他們公開施行欺詐，無情，并不願一切聲譽與誠信，這種勝利只是一種捏造事實而成功的事業，此固日本所特有而前無古人的。

對於一向贊賞而尊敬她的人，對於這種惡行實也難於置信的，我回憶這個衝突的經過很清楚，在一九三一年十

月間，我當時就覺得日本人雖然不時向華盛頓，倫敦，日內瓦等地宣佈，「一候秩序恢復，他們的軍隊即將撤退至原有鐵路地帶」，實際上他們并無意就這樣撤兵，還更進一步要占領整個滿洲。

終於爲世人所不齒的錦州事件發生了。

一九三一年的一個冬天，日軍不斷向南輸送軍隊，供應到中國本部與長城一帶，這件事情驚動了外國訪員，因爲大軍只行了二十分鐘，而這種第一等的軍事行動就很顯著地就開始了，它的目標就是北寧鐵路上近長城的一個小城——錦州。錦州是整個滿洲在中國政府行政與軍事統治下最後一個城市了，假使它淪陷於日本之手，天津，北平就會立刻受到威脅。

這個時候，我們國務卿史汀生馬上照會東京，這種軍事行動是要受到警告的，并且應馬上調回隊伍與軍輸，以免錦州被侵犯，而事實上東京官方也已通告「政府，日本軍隊并不期望佔領錦州或接近長城。

從那時候起，我對於日本人任何宣言的信心已降低到冰點。我於是去看本莊繁大將，那時他是關東日軍司令，我要求他告訴我，什麼時候占領錦州，他笑笑，也并無否認的意思，却問我爲什麼要得到這消息，我解釋因爲我離開上海的家庭和工作機關已將近三年了，我要將我的職務清理一下，并想到上海度聖誕節。本莊繁大將并不回答我，一面命人去召見渡百少校，他是司令部招待外國訪員的負責人，當這位少校進來，本莊繁給他下面一段命令。

「阿先生想去上海過聖誕節，占領錦州時也想回來，他要預先知道有充裕的時間回家一行。抄下他的地址，當時機成熟時，只須給他一個字的電報「來」就是了。」

這就是日本在亞州的軍事長官告訴美國新聞記者占領錦州的情形，但是東京却明明白白對美國政府宣佈過，日本是決不會挑釁的呀！

渡百少校雖奉行命令，他也還嫌拙笨，十二月廿六那天，他打個電報給我「來」，我於是就去定好廿七號到大

連的船，預計廿九號可以抵大連，不料事隔五個鐘頭，又來一電報「稍緩」，廿九日復來第三個電報「速來」，我很匆促地去了。但是直到正月一日還不能抵大連，其時相隔大連數百里之遙的錦州却在一九三二年的元旦被日軍佔領了。

同月廿八日在上海，我對於日本人的善感又遭受更進一步的挫折。

一月廿五日我復離開滿洲新大陸回到中國最大海港，其時上海已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中，日本人提出要求，維持地方秩序與安全，并停止抗日運動及中國的備戰。

廿八日下午，我與盛澤大將在他的旗艦上飲鸚尾酒，他毫不掩飾地告訴我，今晚十一點鐘日本陸戰隊要占領華界，即所謂「開北」，我當即問什麼理由，我更提醒他，今天下午中國當局已經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并且已簽字同意日本提出的條件了，上將答稱，中國的警察已聞風退出開北，那裏有六千日僑，日本的陸戰隊不得不開進去維持秩序，當我一上岸，我就立刻以電話通知美國總領事克銀漢。

「阿本德，也許你弄錯了，」他反對，「請你不要把這種驚人的消息打電回美國去，因為日本的總領事在前半個鐘點以前還告訴我，這嚴重的局面已結束了，現在中國方面已完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但是盛澤的陸戰隊果然於這天晚上十一點鐘開進開北，中國軍隊也究竟按着他們應做的，完全在他們權力範圍以內應做的，奮起抵抗。這場戰爭一直延長到三月裏，犧牲了中日雙方幾近三萬伍仟名軍隊。

這事件固然使我「反日」的成見加重了，但是為什麼呢？

當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開始進攻華北的企圖益為明朗化時，日本的政策與手段使這種成見更加被證實為日本既定的政策了。這次的攻擊是一個冷酷的陰謀，對於任何糾紛也沒有設計去補救，就這樣單純的決定下來，因為中國的統一力量發展這樣地好而快，使日本人不能再久待了，她覺得，如果她再不開始閃擊，將被迫而放棄統治東亞的企圖了。他錯估了中國的力量，而等待得又這麼長久，這事實也就是現在中日戰爭的原由。

特別是這些事情，再加上其他許多相似的情形，把一向對日友善的我改變為批評他們的人了，後來更變成一個資罪越的人了。我的批評與判斷激怒了日本人使用報復的手段，他們遣流氓來搜索我的公寓，打我罵我，并偷去我的文件，後來他們更圖暗殺我，終於我是被趕出我的家以及那曾任過工作將近十五年的地方了。

這不是因認為我是反日份子，所以這樣對付我個人。我最初的成見倒是同情他們。這是他們併吞東亞大陸的手段，第一步先使人發生一種反成見，然後再進一步，造成了罪惡的事實，我這種罪行的報告文字就使日本人更仇恨我了。

這種事實一定使美國人感到震驚的，這些美國人他們沒有去過遠東，未翻過地圖，也沒有到過日本人占領的大地域，更沒有計算過日本人占領了多少方哩的地域，以及在他們統治及拓墾下究有多少人口等統計數字。當然這對於任何一個曾在遠東住過十五年的人更會覺得驚駭，因為他已深知日本統治的地方的情形，一如從小孩時他就知道家鄉的情形一樣。

遠在北方的哈爾濱，冬天的日子很短，水銀柱總在零度以下四十度。新加坡幾乎就在赤道上面，那裏的氣候四季一樣，一年之中日夜的長短也沒有什麼分別。哈爾濱與那凍結的松花江與其兩岸積雪，終年閃爍於北極光下。新加坡有藍的海與瑪爾夫球場，在那裏遊閒的人仍可以在任何獸蹄踐踏下過着自由的生活。

瀋陽與其他的滿洲城市，那裏只有日本的女人穿着很好的皮裘，漂亮的絲織品，而中國的婦人却在襤褸的破襖中發抖。北平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但駐有近十萬的日本軍隊，那裏有一條幽靜的馬路，兩旁小酒店裝起眩目的氣燈（霓虹燈），在那紅光照耀下，酒醉的日本軍人時常演出踢打中國百姓與苦力的一幕。

沙面那裏整天可以聽見榕樹底下鴿子咕咕的叫聲。香港這山城的晚上仍很光亮燦爛，黑水的港灣中也依舊反映出秀麗的面目。馬尼刺，那個會以自治教育得到偉大成就的地方，如今已是萎靡殘敗得不成樣子了。因為那陰謀而可痛恨的市長已遙向隔港的敵人屈伏了。

上海、廣東、巴塔維亞、仰光、檳榔嶼、巴里、河內，以及青島這些地方我了解得很清楚，我親眼看見過敵人轟炸，投彈，而且日本的侵略者更給它帶來了疾病，飢餓與失望。

我對於日本的成見，并不是因爲這次日軍偷襲的時候，英美僑胞遭受了被逐與逃難的恥辱，我的成見却產生於我目睹日本人如何壓迫在她所統治下的高壓，滿洲及中國人民的情形。當然，她對於菲律賓，馬來，以及爪哇的人民也不一樣會很客氣的。時間減輕了那在數千萬被屠殺者中漏網出來的人的怨恨，被毀的城市也可以重新建立起來，但是當在日本統治下，壓榨其所征服的人民時（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教育與自由都被摧殘了，侵略者的鞭子更不斷地抽擊着那些不願屈伏於妄自尊大的日本人之下的人民。

日本主義這一罪行爲什麼最後還要向美國挑戰？這是一件使人不了解的事，或者是可以這樣解釋，我們的成見不見得便會被和平的說教所緩和的。

在五年多的戰爭中，中國犧牲了一百五十萬軍隊，如今美國的士兵也同樣遭受這種死亡的情形，在滿洲的戰場上一個淒慘的冬天，我曾看見許多未埋葬的中國人的死屍，一任它暴露讓犬狼爭噬，骨如山積。

一九三七年夏，我曾在天津看見日軍以篙尖之鉤和槍尖把光身的中國兵整百的推翻到河裏去。死屍先是沈下去，後又浮上來，隨着漲潮漂流數哩之遙，復隨着洪水氾濫再漂到都市裏來，在六月的大熱天，這種情形竟延續了好幾天。

在上海同年八九月間，燒死屍的煙，竟被風吹到公共租界，日夜不絕，氣味令人欲嘔。

馬尼刺，香港以及其他遠東熱帶的地方，因爲天熱與濕氣的關係，死人必須在廿四小時內安埋，但是日本人却不把我們的士兵，海員以及死在巴塔納的陸戰隊埋葬。

在上海我曾看見一個炸彈殺死六百個人，四百多人受傷，或成殘廢，一個七百五十磅的炸彈，落在熱鬧的街上，一切生命行動都似乎停止了三四分鐘之久，但見飛砂走石，漫天煙塵，偶爾還夾有碎石崩潰的聲音，空氣中充

滿着血腥與噙人的氣味，當一切歸於靜寂後，始聽見受傷人的呻吟與慘叫，他們且手足揮扎清漫無目的亂爬，然後才聽見救火機，救護車尖銳的號笛聲。生命是再世的了。

對於這些事我是反感的，我深恨那以侵略與殺人爲榮譽的國家，我認爲他們必須再受榮譽與禮尚的教育，使其尊重弱小民族的權利。

我再爲辯護所謂成見而作一次申訴。我鼓勵美國人民永遠維持這種對日本帝國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成見，我鼓勵他們要具有損除惡魔於世界之外的決心。

第二章 須要一個和平的藍本

以敵人自居者已向美國攻擊，而將我們迫入了全面戰爭。我們的政府曾經宣佈過，我們的總統也曾再三申明，我們參加此次戰爭一定要得到全部的勝利。勝利雖是這麼遠，但是却十分可靠。

我們得到全部勝利後，我們怎樣呢？我們是不是要將我們為什麼而戰的一些事實詳細列出呢？我們是不是仍希望這一次和會仍像凡爾賽會議一樣被一些陰謀，欺詐，自私，一知半解的空論所操縱，並爲了私慾而使用壓力呢？我們又爲什麼要進行全面戰爭，並且除非全面和平一定堅持要得到最後勝利呢？現在我們是受其他三十個國家所委託而抵抗納粹，日本與法西斯主義的。我們應該把這些問題交給我們自己，我們爲了擁護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原則而戰的三十二國，不但要使敵人，並且要使世界上各處被壓迫的民衆，以及少數剩餘的中立國，都要明瞭這次全部勝利得到後，究竟計劃怎樣一個世界。

以我們現在所知道，那些由訂約或交換而締結成的和平，也許結果可使人類的文化消滅。動人的原則原理，如今已不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時一樣可以滿足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們熱心於歐洲各民族自決的想像，然而結果呢？都是互相承認那數百萬人民現在仍在那未收回的地方遭受到壓迫。

廿五年以前，我們開始參加那一個偉大的鬥爭，原想「爲民主政治造成一個安全的世界」，而且也想打勝這一個「可以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戰爭是我們勝了，但是十二年來民主政治與生活的民主化仍無立足之地。代替了以戰止戰的勝利，鬥爭仍繼續了鬥爭，侵略性也便越擴大，現在我們又在從事戰爭了。——這個戰爭是這麼可怕，若以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的生命財產的犧牲來比較，真是微乎其微。

三十二個聯合國所以有這種合作的態度與努力，是因爲大家都一致認爲日本、德國、與意大利的人民都是擁護

他們仇視大英自由的領袖與政策，這種領袖我們必要懲罰他，這種政策也必要消滅它，然後我們才可以談到我們的計劃。

一九一八年德皇威廉棄后倉皇走荷蘭，王公大臣之放棄了他們的王宮及城市者這麼多而且逃得這麼快，其程度使得另一些規模較小的「逃避」只值得在報上登上四五行消息。這次戰爭中當我們得到了全部的勝利後，我們的代表對於聯合國勝利的真正意義應包含些什麼，這問題在作無謂的論價與爭論時，是不是又會一任那些納粹，日本，法西斯的領袖們潛逃到安全的中立國裏去呢？

我們并不渴望四強再有如凡爾賽和會這種組織，卅三個聯合國的人民也并不再甘願忍受迄今尚未知的剝削與困難，而將未來遠大的計劃一任幾個漂亮的紳仕自私自利，坐議爭價，來決定怎樣分配贖物，或再重建帝國主義或再建獨佔權利。因為這種制度只足以造成未來更可怕的戰爭。

對於和平的工作應立即從藍本上着手。聯合國應儘其所能來解釋他們爲什麼而戰，這種藍本在某些細節上并無須如造一所房子的藍本那樣地精確，房主、建築師、承包商都知道這種藍本在工作進行時是常常要變動的——如應在這裏隔一道牆，在那裏新開一個窗子。

但是聯合國迄今尚未決定這圖樣的尺寸，類如究竟要基礎多少深，牆要多少厚多少堅固等等。決定了這種基本問題，而公之於世人，實可使戰爭少拖延些時候。若這建築的藍本有變動，就將使戰爭久延，使有些新國家對於加入那一邊有所躊躇，或使各地會發生一種因地方情況與需要的變動而有衝突。

對於和平條件的建議而有異見，這會使我們的敵人，得以重整旗鼓，與背城借一的決心來延長這次戰爭，不過這是很容易克服的，因爲日本，納粹與法西斯的領袖都很明白，他們不是全盤勝利，就是全盤失敗，所以他們仍將繼續戰爭，只要他們的百姓能支撐他們多久就戰到多久。

總之，沒有什麼比經過倫敦同意的白宮宣言能更刺激軸心國領袖，使其劇烈支撐這個戰爭。因爲這宣言中聲明

於聯合國戰勝後怎樣審問并懲處他們對引起戰禍所應得的罪。

假定和平條件中重要決定的坦白宣佈，能說服那些支撐敵國魁首的武裝人民。那麼無疑的，這個和平宣言——假定它是很好——不但足使我們被侵略國的盟友感到欣慰，并且足以鼓勵從事於游擊或以怠工削弱敵人的那些淪陷區人民。

那些現尚遭受日本虐待的人民，對於日本敗後，他們的命運究竟怎樣的一點，並沒有明確的意識着，所以他們到如今并未有傾向我們的趨勢，這種對於幾萬萬亞洲人民的疏忽，實為一個不容輕視的弱點，足以表明聯合國間缺乏一致的嚴重性。

以中國，朝鮮，滿洲來說。中國在第一次大戰時也是我們的盟國，但是凡爾賽和約却欺騙了她，反而給日本在山東得到一根據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朝鮮人民以為「民族自決」是允許他們可以脫離日本的羈絆而自由，然而他們結果是失望而知已受騙了。所以對現在的朝鮮也應確實允許以自由與真正的自治才對。

對於中國也必須保證，償還其過去五十年中見奪於日本人的權利。

滿洲也應答應她不再遭受日本人的虐待。

約有二千四百萬朝鮮人，三千五百萬滿洲人，一萬萬二千萬名中國淪陷區的人民。假使這幾近一萬萬八千萬的人民知道聯合國勝利將怎樣使他們得到自由與安全的話，那麼他們可能很快的幫助我們牽制了三四個日軍師團的占領區。

東京政府現已統治着四萬萬的人民，下表細列者，是一個未證實的數字。

日本本土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第二章 須要一個和平的藍本

滿洲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佔領地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菲律賓羣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台灣及其他小島	五、〇〇〇、〇〇〇
法領印度支那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泰國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馬來半島	五、〇〇〇、〇〇〇
緬甸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荷屬東印度羣島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共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對菲律賓不僅許以恢復自由，而且許以獨立，對中國也已許以公平待遇——不過并未予以特殊的待遇而已。至於滿洲人、朝鮮人、台灣人、柬埔寨人與安南人、泰國人、馬來亞人、緬甸人，以及幾百萬東印度羣島人都尚未明知聯合國勝利後他們將怎樣？這是應該告訴他們的。

就是七千萬的日本人，也應該告訴他們將來的命運是怎樣。他們恐懼失敗會帶來貧困、饑餓、壓迫、毀謗、與復仇性的條件，這也似應先明白宣佈的。

日本維持北自北極圈南至赤道以南東印度這樣大的一塊領土，自然無不在緊張中。約有一萬萬九千五百萬人民在中國佔領區，朝鮮，滿洲與菲律賓，他們都渴望聯合國擊敗日本後多少有點自由，但是另一萬萬三千五百萬東印度，馬來，緬甸，泰國，印度支那與台灣的人民，他們只有大西洋憲章會承認他們有選擇其自己政府之權利，但並沒有甚麼保證。至於日本人民，他們并不希望怎樣，只怕一旦他們現在所予人的凌辱被擊敗後，將遭受怎樣的恥辱。

與困苦？

一旦德國被擊敗，日本即會掃甲而歸，這種見解的人亦沒有考慮過那強烈的可能性，就是日本之攻擊民主陣線并未受柏林方面的命令，而完全是以本身利益爲出發點的。也許可能，日本之所以乘這時攻擊英、美、荷太平洋上的據點，也正對於德國可能失敗後一種自全的辦法；當然日本并不希望德國同被擊敗，但是誰又會保了火險而又希望他的房子被燒燬呢？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號，日本在亞洲的戰略上的處境極其危急，其燃油汽油之儲藏量已達無可再低的程度。那時他南侵的最前線是法屬印度支那，很危險地被四週的敵人所包圍了，東有菲律賓，南有荷屬東印度，西南英國則佈防於星加坡馬來與緬甸，而中國則又在其北方，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中，日本自無惜盡其力之所及南進以求一逞，因爲她不能再冒險維持原有形勢而不動。假如希特勒一旦失敗，日本的處境更無希望了。因此她積極南進，她成功這慶快而完善，現在她在南亞已有很堅固的基礎，已無須再擔憂德國的命運，如果她再能在此未被擾亂過的新佔領區中，繼續經營十二至十八個月的話，她的力量就將加倍了。

正如德國欲恢復歐洲的工業經濟，而使整個大陸都爲第三德國而工作一樣，日本也在她中國的占領區中，南洋羣島一帶從事積極增加帝國的財富與實力。日本在她的占領區中，對於老百姓定了極嚴酷的軍法，她奴役他們無微不至，她并不單以在軍事上占領了重要都市鐵路，港灣，機場等地爲滿足，她并在中國占領區中得到了超過她遠征軍供應量以外的食米。她將農民源源不絕的抽調入軍役或兵工廠工作，而只留些老弱婦孺在國內，從事生產工作。

檳榔嶼，英國並沒有破壞無可估值的錳礦最大的工廠，現在日本已日以繼夜地在開工，馬來與東印度的錳礦也已經生產大量的礦砂了。馬來，爪哇與蘇門答臘因爲當時取軍與人民甚至連一棵最小的橡樹都不及砍掉，因此今天日軍得到比我們所希望更多的橡膠。在菲律賓，她已再將金鑽等礦從新開採。她們由菲律賓與爪哇航返日本的輪船

不再空駛了一整船的油，還有大量軍事的供給，足以助其軍隊防禦羸疾。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有一個短短的消息，暗示了日本人現在做甚麼？這消息說潛水艇在中國南海一帶擊沈了一隻日本郵船，單就被救生還的人中，就有五百四十名是財政，工業，經濟各界的領袖，還有化學專家與工程師，他們都是被這隻船送到南洋去的。

在所有占領區中，大日本的銀行，輪船，與保險公司都有它的分行。這些巨大的財產都是以僅次於無條件的收買下來的。有時候也真有用錢的，但是一般的說起來，這樣地獲得也不過是較簡單的偷竊而已，因為所謂「錢」者，都是些不可靠的軍用票，這種通貨既非制錢，又不可靠，也無任何法律的根據，這種「錢」是由軍隊印發，而在槍尖指下強迫佔領區人民使用。日本人已完全控制了富庶地方的財政貿易，農業，工業，與政治，他們與土居人民的總數幾及美國人口的三倍。

一九四二年，婆羅洲，蘇門答臘與緬甸的資源與重要食糧早已被日本攫取，當然荷蘭與英國也破壞了他們的油井，油管，與煉油廠。但是日本人却早已料到這一着。在她未與珍珠港以前，她的倉庫與碼頭都塞滿着掘井工具，油管，煉油機，并且在最近四年來更以驚人的速度造了許多運油的大船。

自一九三七年來，日本人在中國占領區中所表演的貪婪與公然的掠奪等等的惡作劇，現在也同樣在菲律賓，東印度，馬來，印度支那緬甸等地扮演了。日本人曾在占領北平不久以後，就組織一個沒有資本的銀行，并且還成立一個號稱資本三萬萬元的華北墾植公司。在上海也成立一個華中拓殖公司，資本壹萬萬元，又命汪精衛在南京設立一個「中央銀行」。華北與南京各銀行都發行一種無價值的紙幣，而強迫中國人以良好的通貨去掉換。拓殖公司則收買鐵路，動力廠，碼頭，工廠而以這種無價值的紙幣或軍票償付。同樣的，這種專以擷取資源財富為力的拓殖公司與銀行，日本亦在新占領或新征服地上建立起來。

這些偉大的工廠，并不用以生產日本人的軍需或日用品，而僅以最簡單的手段停止他們購買原料，有時候就將

那些重要的機器充公，再搬到日本或滿洲去。在所有的占領區中，所有的鐵路，河流，沿海航務，航空線，以及現存的海船，現在都歸日本人統制與經營了。——第一儘先使利陸海軍，第二是便利日本人維持下的工廠。

沒有一個被佔領的國家是允許與其他國家貿易的，所有貿易必須經過日本的票據交換所，在交易終結以前，每一件事都要經過日軍之許可。每一次日軍都要收檢查費，這些錢并不解往日本帝國國庫，而却解往日本軍部。然而自上大將下自士卒，對於戰利品的分贓卻從無紛爭，因為他們認為「拮据」是最合理的分配。

假使日本能安然維持這種組織，且繼續在她占領區中施行掠奪，假使她能改變她們的工業與生產完全供給其軍用機械，那麼她的力量就會很快地增長。

美國與其他聯合國的陸海軍領袖都認為不應使日本有喘息的機會，而必須使她在占領區中得不到戰略上的安全，並且在她所擬建立那不名譽的「新秩序」的區域中，使她在政治上感到困難與不安，這也是同樣地重要。於是我們必須向那數萬萬在日本剝削下統治下的人民特別提出。日本戰敗後他們究竟可獲得怎樣一個地位，這樣才可以激動并鼓勵他們怎樣去積極的與消極的抵抗，以及怎樣去鼓勵不合作的方法。

本書并不擬對和平作一簡要的藍本，而是各種困難問題的說明，這種困難都是和平使者曾在東方，印度，以及遠東近鄰等地方所親歷過的。本書是一種總述，這種總述是為各地土居人民所需要知道的，并也應該告訴他們，聯合國勝利後究能給他們些什麼。

命運造成美國變為數萬萬人類前途的主宰者，他們都以為我們對於從各種殘酷的和緩的政治、經濟的奴役下做解放工作已經太遲了。當他尋求尊重自由自治的途徑時，他們希望美國立刻成為他們的解放者，并肩作戰者與保護者。

自珍珠港事變以來，這已變得很明顯了，就是除非蘇聯加入這戰爭，我們與中國都必須拿出全力去作戰才能打倒日本，環境既非我們所造成的，也不如我們所理想的，它仍迫使我們要在遠東担負維持公正和平的工作。東方

的人民期望我們將侵略者日本驅逐出去，并且也深信我們可以得到最後勝利，而他們也就不再會遭受日本的侵略了。

而且他們所期待於我們者，并不僅乎此。他們相信我們不會將那些受過日軍洗劫的政治社會，經濟管制等復興工作棄之不顧。

現在我們正是時候可以予那些亞洲與南洋羣島數萬萬的人民以頑撲不破的保證，使他們得到自由與正義。我們所有的同盟國，她們急需我們的幫助，我們的軍需品，我們的借款，我們的食糧，以及我們的軍隊。就是那些尚保持帝國主義以統治屬地人民的國家，現在為生存而戰，也都很堅決地主張予黃種人，紅種人以公正的待遇；這種主張若待勝利完成後恐不能不走樣。

當戰爭一停，所有的國家都一定很窮（我們較其他國家略好），那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都要重新整理他們統治屬民的舊主權。他們要儘其所能趕快開拓他們以前的領土，以求充實資力與繁盛，如果我們一定要等待戰勝以後，假使我們一定要等待召集了和平會議，那時他們發展得已羽毛豐滿，勢力膨大，陰謀密結而迫使聯合國去默認它，這樣又會使東方的人民感覺到我們已欺騙了他們，而把他們寄括在大西洋憲章的八點，以及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之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上的熱望一筆抹去了。

下面是從一九四一年仲夏至一九四二年仲夏間羅斯福總統演說及文稿上摘取下來的幾句話，它足以使遠東的人民相信美國是不會卸下擔任這解放者的角色的。

我們戰爭的意義，是使人類得到自由。

無論私人或國家，戰後將永無特權之例。

我們的責任是使自由得能存在於世界上，且使它永遠存在。

我們現在是為安全而戰，為進步而戰，為和平而戰，不但為我們一代而戰，也為以後永世不絕的子孫而戰。

我們之所以要戰爭，是爲了要掃除這世界上的暴行罪惡。

我們的祖先曾告訴過我們，我們之所以要戰爭，是爲了要保持這個理論，就是所有在上帝仁慈的眼光下的人一律是平等的。

我們與聯合國都同意廣大的和平原則，我們而努力解除侵略者的武裝，而使各國人民得到自治。

這些話都有高尚的目標，莊重的語氣。但是這種話遠在一世紀以前，我們也早就聽見威爾遜總統講過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邱會議發表了大西洋憲章，特別着重於幾點。這裏就是英美二國共同宣誓的目標——雖然這具有歷史性的民主國領袖的會議是舉行在大西洋海上，但這種目標亦同樣適用於太平洋。

「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

「兩國尊重各民族自由選擇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凡被武力所剝奪此項權利之各國，兩國均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治政府。」

「兩國尊重其現有義務之原則下，將力使全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不分勝負，一律平等享受爲他們經濟繁榮所必需之原料及貿易。」

上面一段的含意，在挪威看來是很明白而可自信的，就是巴爾幹，波蘭，荷蘭與其他歐洲國家看來也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對於法屬東印度支那幾百萬人民，他們失去了政府，苟延殘喘於貪婪的殖民地中已長久了，他們怎樣呢？又那會幫助日軍侵略的緬甸人，又如何處置呢？荷屬東印度那七千萬人民的命運怎樣？對於泰國，馬來亞這憲章又怎麼解釋呢？而尤其對於中國，印度以及日本的人民，這宣誓又是什麼意思呢？

貿易，財政，與經濟的調整須待戰後仔細研究，因爲各國借款的負擔，與各國飢餓貧困的情形都可有進一步的估計，但是，如果對於改進黨東人民的國家與政府情形有一個特殊的藍本，而由聯合國宣佈保證的話，如果這藍本能對目下在日本壓迫下的人民維持正義而給予確切的希望，方針與理想的話，那麼東方人民對於戰爭的態度將更會

生勳，而使日本所持以獲勝的工作更變得困難了。

命運迫使美國扮演兩個偉大的角色。大家都知道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且為數萬萬人民所期望為理想聯合國的領袖與發言人。

那第一個就是為使戰爭得到勝利而正在扮演中的角色，担任護送戰士，飛機，槍械及坦克，成績卓著。

第三章 截去日本的爪牙

姑認最後勝利是屬於聯合國（本書立論是假定軸心國完全失敗），那麼無須等到最後和平的來臨，休戰條約中就可預先規定一個條件，便是完全解除日軍武裝。大西洋憲章事實上已明白地申明要解除侵略國的武裝，就算沒有這聲明，美國人民也非此不能滿意，并且即使美國不堅持解除日本的武裝，中國人也一定會在戰爭終結後，把它當一個主要條件提出的。

差不多有半世紀以來，日本不斷地犧牲了亞洲大陸上的鄰友，以及領海中的領土，而以武力擴充地盤。這種行為必須制止，并應立刻採取行動使日本不能再繼續她掠奪與侵佔的事業。

日本已統治着七六三、〇〇〇方公哩的土地，這還不將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獲得委任統治二千四百個小島計算在內。而在半世紀以前，日本帝國的領土一共也不過一四七、〇〇〇方公哩，一九〇〇年與中國一戰，奪去了台灣，澎湖，一九〇四—〇五年與俄一戰，復搶去了庫頁島南部的一半，并於日俄戰爭後併吞了朝鮮，雖然她還一再聲明保證尊重這個古老國家的獨立。這三塊擴充的土地共計一一三、〇〇〇方哩，十年後她又併吞了滿洲復增加了她五〇四、〇〇〇方哩土地。

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事變」以來，日本在中國所占領的土地以及南進和偷襲珍珠港後所掠奪的廣大的土地都不計算在內，日本帝國包括其偽組織之滿洲國，其土地已大於五十年前的五倍了。

這種貪婪的野心非但要以解除武裝來校正她，就是她的軍閥也務必要使其失去威信，她的教育制度也必須改革。雖然大西洋憲章會不小心地宣佈過「有選擇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但她的政府形式却仍必須令其改變。這種未經考慮的宣言同樣也不能適用於德國，因為假如德國的人民仍甘願受治於希特勒黨派，德國豈不永遠為

納粹所統治了嗎？

日本軍閥表面上是攻擊民主，而結果卻是剝奪了皇室的統治，這便是日本軍閥最不是信賴的一點，按照日本人神話歷史的傳說，自天照大神以來二千六百多年，皇室是萬世一系的，但是推翻了天皇裕仁並不意味剝奪了日本人對神道教的信仰，他們並不當天皇像上帝一般的崇拜，他僅被認為是種族的化身和歷史，在他統治時所發生的事件，他只須對他的祖先負責，然而人民對於內閣及各大臣所頒之法令，所支持的政策，却都並不要求天皇負責。

日本政府組織內在的危機甚多，天皇在理論上可指派首相，但是却無權選擇內閣的首領，而首相也常須受海陸軍閥的支配——不然的話，他們就拒絕推出海陸大臣，但是，沒有海陸兩大臣推出，就沒有了一個內閣能行使職權。

天皇裕仁雖然在理論上是最高的統治者，但也無權選任他自己的海陸軍大臣，海陸軍大臣須由陸海軍首腦來推選，而被推選者又必須是現役陸軍中將或大將，現役海軍副司令或司令，這些代表軍隊的領袖，並不向首相或內閣負責，也不向現仍行使職權的國會負責。他們可單獨與天皇接近，而向天皇負責，然而天皇却仍不能下什麼重要的軍事命令，反而要接收他們的意見。

這種制度的政府若繼續存在，必使日本再會重整軍備，而引起遠東又一次的新戰爭，正如德國軍閥重新武裝德國一樣，因為自一九一八年後的德國，雖在理論上應該無海陸軍，而僅可有自衛軍十萬人，所以日本在戰敗後，雖不能不允許她有防止走私的水警及維持國內秩序的警察，但仍須注意其領袖人選，務不使其與以前的海陸軍閥有什麼聯繫。

天皇裕仁雖然是一個只有五呎二寸長的人，但是他扮演這個假定是天照大神的嫡系的一百二十四世天皇却很得法。他自己很知道，他是這世界上最古老的在位王朝的元首，日本內閣在一九三六年會佈告天下這「王朝是與天地同存」，日本的宣傳家也歡喜把他們的天皇認為是超於智識的，一切併吞掠奪事業的醜惡都不管他事，他們歡喜讓

世人知道，裕仁是生活在神似的王國中，超脫了這每天瀕於死亡的世界上的切恐怖和罪惡，他被想像如「萬世一系」，或者認為是與日本的命運一體的，亦被認為是牽制東亞的天神。

事實上裕仁是一個普通的人，他是半打孩子的父親，他要統制着他兄弟，叔伯，姨孀，以及堂兄弟間的嫉忌與糾爭，也還要叫他尖銳而嫉視的眼光看着皇室的命運與投資，許多銀行家，財政家估計裕仁是目前世界上最富的一個人，就是他那「天心」中也不能不追逐於這些股票，債券，股息與專賣事業。

日本皇室的財富究有多少是很難測知的，因為天皇到處投資，凡是日本的銀行以及三井三菱兩家大企業中都有他的資本。他在價值十萬萬元的南滿鐵路上即有幾近一半的股份，這都是以承繼或購買得來的，在他的軍隊未南侵以前，他已在菲律賓，泰國，法屬印度支那等地擁有巨大的產權，在菲律賓，日帝國的投資却假借美菲人仕出面經營，其範圍自釀酒以至植桃木林，由罐頭魚廠以及礦業。日本天皇在朝鮮台灣等地並擁有多數的森林與廣大的稻田。

日本對中國的發行會震撼了文明世界五年之久，但是天皇却從不對那些應直接負責的軍事領袖加以懲處叱責或罷免。他對於這些直接對他負責的人，缺乏管教至少意味着他們這種威脅的政策是得他默認的。我知道天皇雖并不知道他的軍隊所做的種種激烈而荒淫的獸行，但我知道他自己一定也曉得在皇軍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奪南京後三星期內種種罪惡，他的兵士已向人類的尊嚴，禮上做下不可告人的罪行了。

一九三八年正月，只離開南京被侵後的幾個星期，沒有高級的日本官員到我寓裏來找我，他對於日本陸軍部在中國占領區種種的暴行，已有過很詳細的調查，他是剛剛由東京做這種報告回來，那天他告訴我關於日軍的種種行爲，是我從沒有聽見過的，而且是這樣的殘酷，簡直不能公之於報端的。

很少的日本人會與一個外國人談起他們的天皇，也許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始終認為他們這套「天照大神的後裔」的神話是妄誕無稽的，然而這天這位客人却告訴我一個關於天皇的概念，這是一個新消息，而且是這麼驚人聽聞的

消息。

他說：「外國人是不會想像得到的，我們那君主的地位實是舉世無匹，現在世界上也只有他才能想要怎麼就有什麼，并且是超越乎一切野心和慾望以上的人。」

這實是一個新智識，我的客人還解釋日本天皇的權力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大，他這種自以為神奇的思想使他高高自居於隔絕世俗而超越一切地位。他更解釋天皇的財產是保障他的安全，而那些下民對他的尊敬心又使他超脫野心和慾望。然後他更洩露了天皇是怎樣知道南京的慘狀，以及蹂躪中國的殘酷等事。

我的客人又繼續說：「我承寵召進宮，與天皇作二小時以上的談話，我走進那因以召見臣下用的宮殿，他即命侍從們退出門外，不使聽見，然後賜我一個跪墊，我就這樣跪在他的足下達二小時之久，他折腰俯聽，我即以占領南京後種種情形附耳輕語，我絲毫不隱瞞，而他也殷殷垂詢。」

「此祕密的會談延續甚久，漸漸使我的兩腿都覺痠痺無力，當他明白了他所要曉得的事情後，即起身離去，愿我再接再續跪一會兒，其後侍從們即將我兩足高舉，施以按摩及運動，等到我能走路纔停止」。

因此天皇對於他軍隊的怎樣行爲是很清楚的，現在他知道他們在香港種種的行動，當較艾登在英下議院報告的更多，就是菲律賓，馬尼刺等處，美國人的遭遇怎樣，他所知道的也一定比美國人民所能曉得的更詳細。

當懲處戰禍罪首的問題提出了，和平使者將會遇到很困難的問題，當然我們也知道，那些發生暴行地方的軍隊司令的姓名，但是例如偷襲珍珠港事，究應誰負責呢？攻擊菲律賓馬來，荷屬東印度是誰計劃的？又是誰贊同這種大膽的企圖呢？當然首相，海相，陸相以及他們部屬的領首是主犯，而且天皇也明明知道十二月七八二天是皇國人民安危關頭，但是對於那些以官僚見稱國內的天皇私人顧問，他們又將怎樣？

所謂官僚的一批負責的高級官員并不能代表任何政黨，因為其份子只要一有空缺即可被當時首相任意推選的，他們都無須向政府，首相，及內閣負責，而且都以此爲終身事業，除了皇帝正式命令免職外，是不能調動的。這個

有權力的集團包括掌璽大臣，宮內大臣，侍從長以及式部大臣。

一切新法律新政令，都須由掌璽大臣簽章始可頒佈。掌璽大臣不但保有這種威的護身符而且還可爲各式宮庭會議的主席，宮內行政以及皇室前途都在宮內大臣的監視之下，而全部宮中內臣都在侍從長管轄之下。這些人對於政策都有很大的影響力，首相以及軍事領袖對天皇關於行政的建議，都要通過他們，或者要在他們列席的時候。不論他們全體或其中任何一人，其影響於裕仁的判斷或政策的力量究有多大，宮庭圈以外是不會知道的。然而這却值得注意，就是每當軍部激烈派企圖威脅內閣時，他們就設法暗殺這顧問圈中一人或幾人。

日本并無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這類的領袖人物，其行政就被一些在軍部領導下強大而殘酷貪婪的內幕人物所支配。表面上日本是裕仁統治着，而實際上的統治者，是那些可以控制首相，并有權解散內閣的海陸軍領袖。不過儘管這種權力的分配是這樣，然而攻擊珍珠港、香港以及侵佔泰國，印度支那，東印度，緬甸的命令，仍是日皇親自批准。未經天皇的批准，這種海陸軍行動是不可能的，即如對華的長期戰爭亦如此，這是皇權唯一的保障，就是未經天皇敕許，其海陸軍就不能越出日本國土一步。

在日本的歷史中，這種皇帝的特權只有這麼一次例外的被蔑視而置於不顧，這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當日本的軍隊渡過鴨綠江由高麗侵入滿洲時，這一次天皇敕許侵入中國的御筆批諭却遲了四天，而且還十分的勉強，這時可說是天皇與軍部最緊張最不睦的時候，天皇之所以在點線上簽字，實因害怕假如命令軍隊返國而他們却反抗，這又怎麼辦呢？

滿洲投機的成功實出意外，因此天皇也承認侵略與擴展實是聰明的政策，從此以後他就不再反對任何侵略的計劃了。天皇這種的敕許，縱容與罪行在戰後理論上之將被判處退位是無疑的了。

日本的教育制度亦必須像政府形式一樣徹底地改革一下。最近的十年來，日本的軍部可絕對的支配其教育政策。痛恨白人，蔑視中國，以及其天授日人統治東亞或全球的危險的觀念，在這時代都已漸漸培養成熟了傲慢，侵

占，殘忍，殺戮。下自各級初等學校，上至大學，其教科書以及課本的圖例，都以傲慢，侵占，殘忍，殺戮為榮譽。全國七千萬學生都被教成自以為高等的神授的民族，只憑其出生與血統，就有權統治次等的民族，這樣的一種民族性就足使日本成為整個東半球的威脅了。

或許有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被教育成功，使他們相信白人的貪婪足以防礙帝國達到正當和平的境地。日本宣傳家的荒謬的論調，廣佈於歐美——說日本是一無所有的國家，因其人口的漸增勢須奪取鄰邦領土，以為移民之地，以求原料之獲得——日本自己的人民很虔誠地相信這句話。

日本的宣傳家很會雄辯，說自一八三五年美國斐曼爾總統遺囑理少將來日本後，人口已增加了一倍，但是他們却忘了考慮在同一時期內，他們的糧食增加了不止一倍，他們也沒有把這事實弄清楚，就是雖然日本的小地主是所得可憐（平均只有一畝之十分之九），然而其百分之五十三的人口在這種小農田裏工作，已使日本勉可自給，而無須顧慮什麼飢餓的封鎖了。

日本也辯稱他們沒有足夠自需的煤，油，鐵，也不產棉花，因此他必須設法攫取能生產這東西的地方，如此說來，美國不也可以盜取爪哇，馬來亞嗎？因為美國也沒有錫與橡皮。

其實日本已增加了其所需的原料，這可由她工業驚人的擴充中測知，日本在其未大施侵略以前，其商品已被日本商賈，商店攜至世界上各大港。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口，就靠這種工業與國外貿易維持他們的生活。直待其國內軍閥企圖建立世界上第三海軍國，及百萬雄軍之前，其生活水準也為亞洲各地之冠。

當日本奪取滿洲，並於一九三七年攻擊中國時，她辯稱這是人口驟增與貧困加重所引起的激動，然而皇國的統計數字却又證明國家財富不斷有增加之趨勢，且其生活水準也較提高了。這種統計數字表明一九三五年日本的國外貿易已達有史以來最高點——實比一九三一年大百分之百，除了上次遍及全球十年的不景氣之情形外，百年之中倒有五分之四的時候，其貿易總是天天趨於增加的。

其實日本並沒有向那些從鄰國扭奪來的地方移植大量的人口，他們占有台灣幾近五十年，但是那裏的日本居民却只有二十六萬人，自從併吞朝鮮以來，這個不幸的國家的人口已由一千一百萬增加至二千四百萬，但是朝鮮仍有廣大的餘地，以最近調查的日本戶籍看，也不過二十五萬人而已，十年來日本一貫以一種浪費的津貼辦法鼓勵人民移入滿洲，然其總數亦不過七十五萬人。

假使，辯稱占有土地是爲了那些地方有原料的資源，日本人就以爲原料是國防工業最重要的因素，這倒還可以原諒，但是若是她的申辯單指原料是工業前途所必需，那麼她自己的經濟史却已給她扯了謊，因爲日本并未占領或併吞任何棉花產區，但是她控制棉花的貿易却是這麼廣闊，而使英國紗廠一家一地倒閉，就是蘭卡斯特也因此遭受可怕的失業，因爲日本貨售價低於英國產品，便是在印度也如此。

然而在打敗日本後，實不應排斥之於市場之外，也不能剝奪其重要原料，致使其生活水準降低，代替它的，是應使其生活水準急驟地上升，因其時他們已不必再負擔供應其龐大軍隊與建立海軍的費用了。關於原料與市場的問類，大西洋憲章會作下列的保證：

「兩國尊重其現有義務之原則下，將力使全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不分勝負，一律平等享受爲他們經濟繁榮所必需之原料及貿易。」

第四章 中國與日本

要和平持久必須有一個基本條件，也是將來總有一天我們要毫無保留地宣言的。它就是必須將日本逐出亞洲大陸與其自一八九四年以來在亞洲以東所占領的島嶼爲根據地之外，這種宣言，除蘇聯外，所有聯合國是一致肯爲後盾的，它實足再燃起亞洲三萬萬三千萬人民希望的火焰，雖然它也會激怒七千萬日本人，因爲對於他們之失去占領地，將是一種非常的恥辱。

這種割去其廣大的屬地與人民，在日本人和其他許多民族看來，似乎激烈了，其實這確是糾正領土問題的一種必需的外科手術——它之所以需要，不但因爲在勝利之日，它將無疑爲中國最低之要求，并且同時也是保障我們自己的良策。若是在戰爭結束後對這種仇惡，這樣的領土竊賊，這近五十年的劫盜行爲仍無公平的裁判，那麼甚至在另一個二十五年過去以前，我們仍不能再從事戰爭。

中國未來的局勢，也是美日兩國間戰爭的主要原因，只要日本能承認在珍珠港被襲以前，乘輿專使與國務卿赫爾的談判，這些困難問題都可以商談或以和解來解決的。當時關於更進一步侵略的阻止，關於商業活動的機會均等，以及南部印度支那的撤兵種種問題，日本早已準備容納了，唯有拒絕自任何中國佔領區中撤退——甚至拒絕討論關於這一切事件的一切建議。而美國却也暗示着嚴厲拒絕中國是否應脫離日本的統制或占領的討論。和解以顯然不能成立，日本人因此開始轟炸珍珠港了。

現在我們正在從事戰爭——整個地從事戰爭，我們究在戰後希望些什麼呢？這答復很簡單明瞭，就是我們希望至少有一個合理的保證，在尊重全美國青年子女的生命之情形下，保證我們不再參加這種整個性的戰爭。我們熱烈的希望，也迫切的需要，至少要有一百年的和平。我們的武裝同志也不要爲一二十年空息的空氣而作戰了，美國非

但需要目前的和平也需要將來的和平，這是未來數千萬青年，甚至未出世同胞，他們都這樣希望於我們遠征歸來的戰士。再也沒有比這種更小的成果足值得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的犧牲，以及將於未來無數慘暗的日子中所犧牲的了。

關於日本之必須自其占領區中竄出，這提案必須建立在一種假想上，就是必使這帝國在軍事上完全被擊潰，如果不是決定性的戰敗，無異就是聯合國未能達到主要的目的。

日本對於積弱而無準備的鄰國的積極侵略，已將近五十年了，日本人不知道戰爭的摧毀性是怎樣回事，因此我們也必須把摧毀帶到他們的城市與鄉村中去，使他們也知道他們是怎樣對待別人的，也必須使日本人時常警惕，原來輕率的占據劫掠也會帶來可怕的報應，只有以這種手段，聯合國始可永久摧毀日本軍閥的聲勢，而將來日本的人民才會沒有這種危及世界和平的流血冒險。

打敗日本，至少要使其在此後二十五年中再扮演侵略者一角的能力完全崩潰，迄今日本帝國在其近世以來所幹事的戰爭中從未嘗過失敗的滋味，日本人民也從未見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中有過戰事。而且每一次戰事總是帶來了勝利，致富，得意以及軍閥加倍的囂張跋扈。這次戰爭必須使有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國際上要給她一個可怕的懲處，也必須使日本那些可怕的愛國者放棄其五十年來劫掠政策的收穫。不必以為是一種為和平而加以懲處的手段，而是要以此脅制其貪婪的軍閥國主義使之不能及時回復，且使中國與朝鮮可得到因其長期忍痛而應得的最低的公平待遇。

當海盜軍閥失去信仰而被解除武裝後，這將會使日本人民在這一代中設法將其從基本的自擾中覺醒過來。這種基本的自擾是和德國人一樣的——他們根深蒂固的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超過其他民族；他們認定其政府機構之無敵，其皇朝之久遠，都應使他們有統治及開發半個亞洲的資格。

如今有許多奇怪的理論流行於美國，討論我們爲了自己的安全，應於戰後維持一個強大的日本，其論點是根據

中國如一旦恢復其北至滿洲南至海南島時，使我們要將在歐洲所從事於摧毀的工作再移到亞洲來——一個兇猛可怕的中國，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勢力，這將與希特勒支配下的歐洲一樣，同爲和平的一大威脅。這是對的，假使中國能得到美國的借款與其他的幫助，她確能迅速地恢復其爲戰爭所受的損毀，可能立刻成爲一個巨大的強國，但是可能與實在，其間却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刻正從事征伐侵略者的任何一個聯合國，說她將來也希望做一個侵略的角色；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中國一旦解脫其所受於日本政治及軍事的侵略，決不至於有成爲黷武主義的動機，事實上，今日中國的領袖也極希望和平，除了因防止其漫長海岸線上的走私海盜所必須的一點砲艦而外，實在也不想建立什麼強大的海軍。爲了要有和平，也爲了要解除日本的武裝，應使中國的邊疆不再受到威脅，中國政府也很願意使其數千萬人復員，他們一放下武器很快的就會被其國內經濟及農業的生活所吸收。

中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於其所講過的一段要言不凡的話，而標其題目爲我們堅信廣大之目標即是作戰。這是從中國官方所傳出來的。宋博士曾在雅禮大學校友聚餐會中演講，這裏舉一段：

「第一就是要求亞洲政治的自由，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並沒有完全解放歐洲所有的國家，更無庸論及亞洲了。現代的發明，消滅了國與國的距離，且使其接觸倍形密切，這世界決不能長期安穩地生存在半自由半束縛的情況下，正如林肯總統所說的，唯有一個單獨的國家才可以有這種情形。

中國現正爲獨立而戰，她也同樣祈望全亞洲的國家都能得到自由，當然有些國家並沒有完全自治的準備，但是這却不足爲擴充殖民地的藉口，美國之于菲律賓，正是一個公平無私暫時保護的顯例。

我們第二個目標，就是經濟上的公平。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公平要完全一致，失其一則另一也不能繁榮，亞洲已不能只認爲市場與居留地的代名詞，或只認爲是橡皮，錫，油的資源，或只是爲開發原料而供給人力的地方，大西洋憲章先倡於羈邱，復爲聯合國所採納，實可認爲經濟公平的一個大憲章，它可以造成一個生氣勃勃的現象。

我們知道，除非有一個普及性的國際安全，那末所謂政治的自由，經濟的公平都是虛幻的，轉瞬即逝的，就拿我們部落時代的祖先來說，那時尚未發明警察與法庭以維持個人間的秩序，困難固然不能說沒有，但是我們為什麼認定與個人間一樣用以維持正義，實施法律與秩序的警察和法庭在國際間就不可能呢？

我國人民對於已死去的國聯是最忠實的擁護者，每當我們國家的生存受威脅時，我們即訴之於國聯的法庭。這種過去的失敗，並沒有使我們完全灰心，因為這次戰爭的恐怖，痛苦與犧牲的喚起一個國際性的維持正義的有效的工具，中國以及其他所有愛好自由的國家，於必需時均將欣然自動割讓其一部份之主權給這種國際政府。」

上述一篇演詞，在那裏面，中國有沒有絲毫想利用其勢力以推翻世界和平的野心？爲了永久的和平與真正國際安全的利益，有多少國家肯勇敢地願意放棄其一部份主權呢？

自然，中國現在是很強，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以來日本也就發覺中國驚人的強大——但是中國的力量是用以防禦的，并非用以侵略的。今日工業上的效能已成爲侵略武力最主要的條件，一個國家設無組織完備的工廠，工業熟練的技術，豐富的工業經驗，巨大而易於開發的資源是決不能從事現代戰爭的。

中國現在的工廠少得可憐，僅有幾條短的鐵路，也缺少公路，沒有海軍，更無機械化的陸戰隊，中國到現在尙不能造一架飛機，一架汽車或一架貨車，兩年多來全靠美國以其裝備與優越的一切來配合着戰時生產，這要使中國進步了二十年，有些冷酷的批評家往往不信任中國所宣佈的好意，他們却未曾考慮，即使中國這麼想，但中國物質上的障礙也會阻止中國成爲一個侵略國的，他們以爲當和平成功後，決不能使日本弱於中國而使所謂「均勢」消失，這種論調，現在已不是時髦的思想了。

日本自一八九四——九五年與中國開戰後締結之馬關條約下，取得了廣大而富庶的半熱帶島台灣，與前一度名爲澎湖島的帶狀羣島，現已爲日本人易名爲琉球羣島。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因爲它是中國南海岸香港廣州的側衛，其居民也是中國人，大家都知道他們在日本人統治下沒有自由，沒有寬厚的待遇已經五十年了。

因爲台灣之近於中國海岸，日本常常要求在福建省一帶保有特殊利益，且想控制廣東邊境之東南部分。日本的商人與軍閥毫無顧忌地利用台灣爲罪犯的根據地，用以滲入中國內陸，尤其是如汕頭，廈門，福州等地。當這些傑出的人使中國在走私與治安上感到頭痛時，日本就在每次事件發生後，即以治外法權要求保護這些罪犯，因爲他們算是日本國民了。

日本人在台灣建立巨大的滯留軍根據地，自這裏出發許多轟炸機慘炸香港與馬尼刺，自這裏與中國的海南島又出動了許多侵略軍隊攻擊菲律賓。

澎湖羣島將日本南端到台灣北端間的中國海岸完全控制着，占有這些島嶼而控制這海峽，足使日本封鎖中國海使不能與聯合國海軍取得聯繫，遠向南方并可伸展其交通線，而無阻障，這種浮於海中的堡壘，像台灣一樣，也必須歸還中國，而爲了維持和平計，必須解除其武裝。

中國不要朝鮮，也從不曾占有過朝鮮，而將來也不要把它當作一件禮物接受；雖然朝鮮也會向北平中國的皇帝長期納貢，而在此種情形下，此一度稱爲隱遁王國的命運，自宜另闢一章述之。

滿洲的情形，雖然與中國息息相關，而我國仍具有各種不同關於滿洲前途的意見，有許多以爲滿洲應給予日本，有些贊成在日本保護下實行自治，而仍有一部人建議在國際共管下成立獨立國家，然後再以人民投票方式決定其屬於何國。

反對滿洲應由日本統治下解放的理論很多，以爲日本已在東北數省化費了數萬萬元的經濟建設，以爲過去十年中移居這裏來的日本人已近七十五萬人，因此他們應在其皇國統治下度其餘生，像這樣直認此五十餘萬方里，具有三千五百萬人口（其中三千二百萬是中國人，其餘是滿洲蒙古及日本人）的地方，爲暴力所擄取簡直是一種可笑的理論，難道三千二百萬中國人，只因爲有七十五萬人無處匿乏的日本人，仗其東京的軍隊，與其政府豐厚的津貼雜居其中，就應該在日本人統治下度其殘生嗎？

過去十五年中，日本以其雇用的日本宣傳家，故意播弄玄虛，假冒滿洲并非中國的一部份，對於中國之堅持與歸還其主權實無歷史的根據，一九三二年國聯派往遠東的調查團團長李頓爵士，曾化了許多時間調查滿洲實在的情形，在其報告書中有下列一段議論。

「滿洲自有史以來，即為各種不同之通古斯族所居，并與蒙古韃靼人自由雜處，在中國優越文化傳入影響下，其人民漸知如何組織其本身，并曾幾度建立王國，此等王國有時會統治過滿洲之大部，與中國北部地帶以及朝鮮。遊，金，清各朝并曾征服過整個中國，統治了幾世紀。」

「中國方面，在其鼎盛之帝國下，亦足能阻止北方之狂潮并轉而在滿洲大部份領土上建立主權。中國人移殖很早……二千年來始終保有其永久之立足地，中國之文化亦流行於南滿一帶，此等文化之影響，於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時為最盛，明政府實際上并擴張其領土至整個滿洲。」

滿洲人在一六一六年推翻明朝政權之前，與一六二八年越過長城征服中國之前，始終被中國文化所滲透，進而同化於中國。滿洲的軍隊有許多是中國人，他們被分別組成單獨的軍隊，名為旗軍。」

李頓報告嘗於說明幾世紀來中滿關係後，復指出滿洲的語言已完全被中國語言所替代了，并述及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軍首義成立國民政府時，滿洲當局已完全接受了此種既成事實。

滿洲人既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日本人就不折不扣地痛恨這一點，所以如果各種日本的利益不消滅，日本移民也不能遣歸，滿洲問題將一如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之亞爾塞斯洛林一樣，將成為遠東和平一大危害。

若替七十五萬日本移民來辯白，這是最可笑的事情，他們之被移植，實為一種軍事策略。有許多移民以及整個村莊都有豐厚的津貼。每個移民及其家屬都給予免費的旅行，占有免費的土地，每家每人給予一千至五千元之資金，在每一個村莊中，日本政府設有免費的學校，獸醫，醫生，與地方醫院，并給移植的農民們以免費的種子。以這種浪費的津貼制度來看，十餘年中僅不過完成了七十五萬的移民，正可證明日本人這種必須以這麼富庶廣大的地

域來容納其過剩的人口的政策是太可笑了。

針對着日本這種可憐的紀錄，却另有一種事實，就是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征服滿洲以前的十年中，絕對自動的中國移民却源源移向滿洲，每年幾近一百萬人，他們都自人口過剩的河北，山東各省移去，而且亦無中國政府任何幫助。

正因為日本人會以其軍隊及大量的金錢的投資在滿洲大施侵掠，中國對於其感覺，正好像美國人喪失了一塊完全面積六分之一，有八百五十萬人口的土地一樣。尤其是滿洲的喪失無異自中國奪取了其百分之四十煤鐵的蘊藏，大部分良好牧地，以及中國人畜牧牛馬的地方，此外這大而肥沃的平原，并又生產重要的農產品如大豆，粟，及小麥，尤其是滿洲的森林，幾占中國全部木料百分之五十。

熱河省，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份，現在也被日本包括在滿洲統治之下，這種地方同樣也應歸還中國。其地富有煤鐵及其他原料，於礦業之發展以外，日本很少利用，只用以種植鴉片罌粟，而其大部鴉片又均用以毒害日本占領區之中國人民，這樣才可幫助日本人自這地方擷取財富。

日本一定將極力反對其被逐出滿洲，她在這裏已投資至少十萬萬元——大多數的錢是正當每一元值美金五角時化費在這裏的，鐵路，港口，礦場，煉鋼廠，有關之大工廠，擴張工業，飛機場，航線，學校，醫院——在這些事業上日本人化了大量的金錢。有些事業也還賺錢，但是有些却遭受重大虧損，大規模地發展工業使滿洲成爲日本的第二兵工廠——這兵工廠非常重要，沒有它日本就不能在一九三七年向中國挑戰，更不能襲擊遠在太平洋上各民主國。

中國將要求，日本在滿洲的投資一定要交出作爲戰爭損害的賠償，如果他們認爲這數目太大，他們可以不付其他足以補償此次戰事之損失。因爲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以來，日本使得中國人的生命喪失以及一切土地的毀壞，摧殘與蕪荒等等損失實廣大無比。中國一再聲明，非至重占滿洲，解放二千五百萬久處囚禁的人民，不停

止戰爭。假定將來真能在遼東平原上擊敗日本軍隊的是中國軍隊。設有這種情形，滿洲的命運就會自動的決定了。

但是無論中國軍隊能否驅出日本軍隊，美國十年前早就聲明，再不允許日本人繼續統治滿洲了。美國政府於一九三二年在國際大事中插入一段道德制裁，我們曾宣告，我們不承認任何侵略造成的領土變遷。十年來我們堅持這一宣言，也從未承認過日本在滿洲的新地位為合法，也沒有將所謂滿洲國看為實際的國家。我們的國務院對於這件事很謹慎，就是我們派往滿洲的領事，雖然自一九二一年後，中國在滿洲已無一絲權力的影響，但名義上還是對中國政府派的。

好黃備人的評論家往往說美國「對遼東沒有一個真正的政策」。他們忘記了自從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我國政府對於「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的看法根本就沒有改變過；假使我們放鬆這個政策，也許我們今天也就不會同日本開戰了。

第五章 中國與其盟邦

對中國主持正義，並不是僅將日本驅出大陸以外，使滿洲，熱河，台灣與澎湖羣島歸還中國就認為可以了，尚有其他待歸還中國的東西，我們必須使她成爲一個與其他國家屬於完全平等自由地位之國家——在她自己領域內必須承認其完整無缺的主權。這在中國近代史中尙屬首次。

這意思就是必須將所有在中國之協定，特種毫無保留交還中國的主權者與行政院當局，也就是必須將舊日在中國領土上保有外國駐軍，外國兵艦及商船得在中國沿海與內河自由航行等特權一律取消，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英美雖遲了一點宣示其取消治外法權的意思，但截至這時止，此種特權已實施了一百年零幾個月了。戰後所有那些願居住中國，或在中國經商之外國人均將受中國法律與中國法庭及審判之管轄，以代替其原受治於其本國法律，及僅受其本國領事之制裁。

英美的聯合聲明取消治外法權，并未曾有任何聲明放棄其他對於特殊協定與特權的意思，也沒有對歸還中國割地之任何計劃有所暗示，這是稍稍不愉快的。

中國深知其爲何而戰，但是中國對於盟邦爲何而戰，除掉知道這是一般的自衛，澈底擊敗三個軸心國，與建立一個所謂「未來更完善的世界」的模糊東西以外，仍未澈底了解。

中國希望，并也足夠資格成爲一個與世界各強國處於完全平等的國家，也應完全恢復其於一世紀前被歐洲各帝國企圖分割前的完整的領土。在中國人的邏輯的心理中，以爲中國的盟邦聯合國沒有同時宣佈其每一國家將以其於中國過去衰微無援的時期竊取來的領土歸還中國，就是聯合國決定將日本在中國的特權，租借地，占領區一律取消也是沒有意義的。

日本的陸軍現已占有上海著名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北平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天津與香港的外國租界，廈門的鼓浪嶼島，廣州的沙面，英美軍隊幫助中國將日軍驅出該地，而對中國人說：「這仍是屬於我們的，你們不要管這裏的事情」，這是太荒謬了，假使我們要實行這種不義之舉，很可能會被逐出，因為中國人的心理，不會在勝利之日再忍受這種不義之舉了。并且中國人對於凡爾賽和約之不平，以及當滿洲被日軍侵略時國聯之袖手旁觀，迄今尙未忘懷。

中國人對於其由列強束縛下之得到完全解放究竟是怎樣的看法，我國簡直是無法了解的。中國將因兩次參加世界大戰，多年的騷亂，對日的抗戰而得到解放，只有澈底明瞭中國過去孤立無援的情況，我們才能了解此種解放的真正價值。

一九一四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前，中國曾遭受下述異族入侵與統治。

遠在北方的俄國，占有中東鐵路，一條橫跨北滿長達千餘公里的鐵道，其鐵道所有權并包括沿路之駐軍權，并實際上具有內河航行權、電話、電報之獨占權益。

日本占有南滿鐵路，這是一條自南端之大連經過瀋陽至長春，而有六百九十五公里長的鐵路，并另有一條支線直通朝鮮邊境，在關東半島上的南端有九十九年的租借地，擁有大連及旅順，辦有巨大煤礦與其他企業，在條約規定下，并許有數達一萬五千的軍隊沿鐵路駐紮以保護此線而維持其秩序。

一九一四年中國的沿海關卡亦為外國人所管制，其關稅收入與分配全置於外人統治之下，中國的鐵路全部作為抵押，中國關稅的收支亦為外人所支配，中國的郵政亦處於外國官員監督之下，許多與中國訂有條約的強國，包括美國在內，在中國境內仍保有其自己的郵局，中國也不能享有關稅自主，其進口稅被限於百分之五與百分之七·五的稅率。

其時之北平，美、英、日、德、法、義、比等國都保有其海陸軍之駐防區，并有權建設自北平至秦皇島的鐵

際，在天津，英、法、德、義、俄、比，都有其租界，并有駐軍之特權。

英國在租借權下擁有威海衛，并計劃使其成爲海軍根據地。德國則長期租借青島與膠州灣，并增強其防衛，作爲海軍基地，且領有二百八十里長之鐵路深入濟南——山東省的首府。

在上海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并駐有外國軍隊，上海之上，揚子江上流、鎮江，九江均有外國租界在其地，漢口亦有英、德、俄、法、日諸國大而重要的租界。

上海之南，沿海岸則有廈門，鼓浪嶼之公共租界，英法則平均瓜分廣東珠江的沙面，英國領有香港，葡萄牙有澳門，法占有宜爲大海軍基地之廣州灣。

在中國的口岸與內河中可發現美、英、德、法、日、義諸國的兵艦與商船，列強可任意遣送其軍隊至其租界所在地。

美國——無論其人民或軍隊——歐洲諸國，墨西哥，與南美幾個國家，均與日本一樣不受中國法律與法庭之制裁，他們在中國是受其本國法律之保護。他們可受治於其本國法庭或其本國領事法庭之前。

在上述這種奴役與侵略的情形下，要求世界各國各地人民都得到平等自由，其距離尙遠，但是當聯合國得到勝利之日，中國將一定會要求，且無疑地將全盤接受它。

這裏有沒有任何有力的議論反對聯合國之立刻宣言，說待勝利之日應予中國以自由與平等嗎？這種宣言不但會使中國自由區的人民領情，且會給予日軍占領區內的人民以最大的鼓勵，并对僑居菲律賓、暹羅、馬來亞、緬甸之中國人將更會有驚人的効力。

英國之香港與葡萄牙之澳門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香港是割讓於英國的，是皇家的殖民地，是不列顛帝國的一部分，已有一世紀了，它乃得自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即所謂鴉片戰爭的結果。

自從葡萄牙強迫中國承認澳門爲租借地以來，葡萄牙在澳門已有三百八十年歷史了，自帆船時代結束後，尤其

自英國將香港闢為世界上一大海港後，澳門之重要性逐漸衰退。在日本尚未參加太平洋戰爭以前，澳門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罪惡、走私、賭博、販煙的中心。很久已來就為中國南海岸罪惡的淵藪，這是必須要廢除的。澳門的價值對於葡萄牙早已無政治上或經濟上的意義了。由葡萄牙派出來專為處理無名目的政治上的債負與事業的總督以及與其他的官吏，一事無成，仍沒有把這小小島城洗刷乾淨。澳門面積只有十一方里，人口按一九三三年的統計僅約十七萬。

要英皇撤消香港是很困難的。一百年來這就是遠東太平洋的海港，也是皇國偉大的象徵。然而香港所有的一切也不過是——一個象徵，不過是一個能自中國華南的經濟生命中榨取大部份利潤的商場而已。

在飛機的效能尚不能作為轟炸，作戰，軍逼以前，香港幾乎被認為是與直布羅陀一樣重要的堡壘與海軍基地。島上的槍，與陸上的砲台使香港不易由海上接近。其西部的港灣更是軍艦，潛艇良好的避風港。但是飛機把香港自不可攻破的海陸軍據點變成最脆弱的地點。香港這個只有九公里闊十一公里長的小島，缺少河流，泉水亦少，水閘小所貯的水量亦少，一旦空中炸彈破壞此種水閘，水即流入海中，百餘萬人即將無以飲食，無以救火了。

香港之所以在商業上有很大的價值，就因為牠是中國南海岸最好的深水港，其北之廈門，汕頭小而淺。廣州泥沙淤積，又受珠江潮汐的影響，三千噸以上的貨船就不能停泊，假使香港屬於中國，中國又何必化費四千萬鎊金發展廣州下游黃埔的計劃？

英國在香港領有三九一方公哩的土地，除其半島外，在大陸上之九龍半島頂端，享有九十九年的租借地。香港與九龍之間僅有不及半里之水，為隔，許多大船塢及倉庫都建築在九龍岸，由九龍到廣州有鐵路連接，在一九三七年事變前，循此可直接北平——甚至可直達柏林，巴黎。因為有鐵路連接北平經過滿洲且可連接於西伯利亞鐵路。感謝中國保衛長沙的戰術與堅韌，該地先後曾被日軍猛攻四次之多，而日本終未能切斷這條聯接南北中國的鐵道線。

以香港的權利讓與中國，非但是英國在亞洲的威勢將受打擊，且將為精神上的苦痛。也許有人會辯護，以為與日軍拚死抵抗時數千萬英、加、印軍會在此山城喋血奮戰，因此香港應為「永遠為英國的一部份」，但是在同樣的情形下，也應為「永遠是中國的一部份」，許多中國的志願兵會死於香港的保護戰，千萬的中國老百姓會犧牲於轟炸與砲擊之下，在大陸上為阻止日軍的侵占九龍半島，會作無效而勇敢的襲擊，於英軍前哨投降前，千萬的中國正規軍因此而被殺戮或受傷。

不管英國最後的態度怎樣——這種唯利是圖的政策便被認為一種合作與寬容——中國對於他自己的新力量與偉大是十分留心的，只要她認為是對的，她一定會提出要求。中國常常驕傲地自覺，她自己有效地抵抗日軍攻擊已五年多了，而英、美、荷蘭不到一年之三分之二就被日軍逐出遼東，當英國敗於緬甸，幸得中國增援，有效地阻止了日軍，使撤退的英軍完成其焦土政策，而不遭受重大損失與投降，中國人對於這些事實很驕傲，并也自覺其重要。

不幸我國尚有许多人與英國一樣，他們懷疑取消治外法權，懷疑對於歸還那些一百多年前帝國主義向遼東發展時，取自中國的一切權利、領土的任何建議。他們推斷以為當日本的侵略的壓力一旦解除，中國將復陷於內戰，混亂，不然的話，她將會發展成爲一個爲日本一樣的傲慢，侵略的國家，這種以過去的情形猜測將來，實在不一定靠得住。

自然中國確有革命與內戰的危險，任何一國經過長期之戰爭，也同樣會發生內部的紛亂。一九一四年的俄國沙皇政府遠較蔣介石的政府爲強，但是俄國仍崩潰於反叛，內戰與混亂中，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戰火復燃的前例。

一般認爲今日的中國只有少數團結一致的領袖與政黨。他們也感到同樣悲觀，這些政黨發生於內亂，但也站在抗日之最前線，中國共產黨、軍閥、中央政府之如何完全一致團結，確是一個重大而有拖延性的問題。

聯合國勝利一旦來臨，中國會自戰場中突然出現四五百萬的老兵，因此她將遭遇種種貧窮、飢餓、失業等問

題，許多大城市中多已半毀，而在勝利來臨之前，許多地方還將在繼續被砲轟、彈炸、火燒中。中國的工業同我們一樣爲戰時生產而轉動。她沒有商船，少數的鐵道也將被毀。

戰勝後的中國不得不須要援助與貸款，糧食與機器，以及我國工業經濟專家可貢獻的最好的服務，假使停止其任何一種，中國即將混亂；假使我們否認領土上、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正義，中國好則怨恨，不好便會發生暴動。

中國是需要借貸，尤其是貨物機器需用於復員與工業建設，我們的重工業在中國市場上富有大量之輸出，單以一專論，中國的鐵道即將不能不重起，不能不重新裝備，并需大大的擴充。

世界上沒有一個大的面積，人口、資源、工業、繁榮的國家，需要我們這麼大量的幫助。因事關我們自己的利害，必須儘我們所能維持中國內部的安定，避免任何足以陷入混亂的崩潰。「大中國市場」之爲帝國主義的美夢，已有一世紀多了，假使能與中國人合作，在戰後這種美夢不難實現，這市場可以予我們以極大的援助，使我們安然渡過戰時生產變爲平時生產間的困難，可使我們防止戰後的大量失業。

中國曾有一段悲慘時期，他們或者不會再贊成利用這種危險的武器，如排外運動，經濟抵制，以及其他專爲政治目的而設，不負責任的組織了。中國人是最聰明的商人與實業家，他們知道投資應與其國內現有法律和秩序的程成成正比例的。至於戰後日本所得到的那種可怕的報償，至少在這一代中，是足以防止其任何併吞弱小鄰邦的動機了。

這不是說關於中國的一切嚴重問題都隨和平之來臨而終止了，但是若能將有關解決以往糾紛之意向明白宣布，也大可使中國老百姓的精神上發生重大的影響，就是在印度，東印度以及其他各地也會得到很好的反響。

還有其他要碰到的問題也可以最後和平同樣來解決的，就是我們的辯華法令，澳州的「白澳洲」政策，以及僑居海外大多數華僑的利益等等。

據官方最近的調查，中國人僑居海外之人口有七、八三八、八九五，其數字并不包括五百萬的台灣人與在香港英人統治下之一百萬。嗣後就是在戰爭結束後那些地方歸還中國政府之後，還仍有許多重要的中國人居於他國旗幟下，如暹羅有二百五十萬，馬來亞有一百七十萬，荷屬東印度也將近有一百五十萬。此外在美國大陸上有七萬五千中國人，菲律賓有十一萬五千，夏威夷則有二萬七千人。

多年來，華僑在經濟的意義上對於中國非常重要。夏威夷的華僑與美國的華僑，每年經常匯歸本國家屬有數百萬美金之數，馬來亞與東印度的華僑也確有同樣的情形，例如暹羅的華僑於一九二九年匯歸汕頭一帶的地方就有三千四百二十萬元的中國法幣，一九三三年不景氣時期其數減至一千四百九十萬元，這種大量的海外匯款使中國於維持貿易平衡得到極大的幫助。

在一九三七年日軍侵華的前幾年，中國政府對於其大量海外僑民的福利與忠誠已表示其卓越之興趣，有許多地方，中國政府每日撥款維持在外國之中國學校，但是中國政府於此最主要之工作只限於保護海外僑民之平等待遇，保證僑民貿易安全以及生活安定的條件之援助。

美國人的命運現與中國人的命運已有解不開的關係，除大西洋憲章的宣言與三十二聯合國的聯合誓盟外，我們的陸軍與海軍部在日本侵略中國的五週年紀念日，發表一紀念文告，在其間念「偉大的抗戰……堅韌而勇敢」的中國人後，以下列一段作為結束。

「今天美國的海陸軍應以其在中國攜手之盟友致敬，並應以絕大的決心，聯合我們的盟友將侵略者自中國之一尺領土中逐出。」

當然，我們一定要實行這誓約，但是若說當其任務完成，我們即脫離而去，不再管和平所帶來那些絕望的問題，這是不可想像的。

第六章 自由——必須獲得

聯合國勝利後，大聲疾呼要求獨立最迫切的就是朝鮮，他們忍受日本的統治已將近四十年，併入日本版圖亦有三十年了。這就是說朝鮮已忍受了五分之二世紀的奴役與貪婪的剝削，這種在日本統治下的奴役與剝削，任何遭受過的人都有一種可怕的經驗。

朝鮮痛苦的情形及其被奴役的長久可被認為應該得到立刻獨立之代價，但是實際上，朝鮮人民現仍不適於自治或準備自治，一旦朝鮮被拒絕立刻獨立，各種黨派，政黨，少數真正的愛國者，一些偽善與自私自利的人都將大聲疾呼，并責備聯合國之造成新的專制帝國主義；但是爲了遠東和平與安全的利益，及朝鮮人民本身的利益計，這種拒絕是必須的。

朝鮮的確須要立刻從日本統治下解放出來，這是人類正義之最低限度；但是他們現在仍不能很穩固地有效地管理他們自己，因此除非教養他們直到能管理自己的地步後，是必須拒絕他們的獨立。

對於多數美國人，朝鮮僅是「亞洲各國中特殊的一個」，朝鮮究竟是怎樣的，其歷史如何，如何被日本併吞的，這些都在世界史中看不到的。

朝鮮是一個半島，突出於亞洲大陸之東北角，除去北方近海參威一帶的幾哩地方外，是與滿洲相連的唯一的一邊陸地。面積約有八五，二二八方公哩，比堪薩斯州稍大，但比奧倫治州小。堪薩斯州約有居民二百萬，奧倫治僅有一百多萬，但是朝鮮却有二千四百萬的朝鮮人，以及不到二十五萬的日本。

除開二千四百萬朝鮮人，住在其本土外，另有二百萬朝鮮人居在滿洲，在日本侵佔此必爭之地，且置其人民於奴役制度之束縛下以前，這些人到滿洲是來爲了追尋自由的。在蘇聯沿海諸省，約有三十多萬朝鮮人，在中國至少

也有遺數目，在美國，夏威夷與台灣也有不少朝鮮人，總計朝鮮的人口約有二千七百萬。

這些處於日本虐待下的人，無例外的都很熱心主張朝鮮獨立，并予獨立運動以金錢上支持，千萬朝鮮人無論其是在中國軍隊或朝鮮軍隊中，或是在游擊隊中已公開在中國及滿洲向日軍作戰。蘇聯西伯利亞的朝鮮人，也都以陰謀、間諜，地下工作為主要活動，以反抗統治其故國之日本人。

上世紀的末葉，朝鮮是東方最落後最腐敗的國家，其皇室甚衰敗，其貴族無知、頑固而貪婪；其官吏貪污而低能。

朝鮮曾向當時北京的中國皇帝納貢有數百年之久，因中國之派遣軍隊恢復其秩序，曾引起爭執，致造成一八九〇年之中日戰爭。此後沙俄因自中國取得建築橫跨滿洲直達旅順港的鐵路權，也變成朝鮮宗主權的競爭者了，但即因此種利害衝突，乃引起了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結果，勝利的日本即武裝佔領朝鮮半島。最初日本人先要求朝鮮為保護國，後於一九一〇年始正式併吞此一度曾為「隱道王國」的地方，因此而引起此後數百年斷斷續續的紛爭的局面。

我們對於此種併吞的默許，以及英國對此舉的縱容實為國際史上最不光榮的一頁，日本再三聲明尊重朝鮮的主權與獨立，而美國對朝鮮亦曾予以支持的保證，此種保證在朝鮮看來是很有拘束力的。

英國允許日本併吞朝鮮，作為其付與簽訂英日同盟的一部份的代價，此項盟約在當時可助其防止德國在遠東的發展，并可使其能由東方調回大部艦隊，其時在威廉二世下之德國，實力甚強，故急於需要該項艦隊之調回。

美國亦曾與朝鮮簽訂永久和平友好條約，如今此種條約亦僅可供我們悲悼了。茲錄一段如后：

「任何其他國家若對簽約國之一造，從事於侵害或不義之行動，其另一簽約國應努力予以斡旋。」

遠於紀元二百年神功皇后時代，日本人寇朝鮮，後於幕府時代豐臣秀吉（死於一五九八年）最盛時，曾企圖攻占亞洲大陸之東部，其計劃也是先征服朝鮮，次為滿洲，最後再征服中國，但是在此種第一步野心的計劃未完成以

前，中韓聯軍即將日軍擊潰了。

前半世紀日本把朝鮮半島比譽爲「直指日本帝國心臟之七首」而實際上這七首却指着另外一個方向，而朝鮮却是日本侵略亞洲大陸最方便的跳板。五十年以前，日本即開始以詭計增強其在朝鮮的勢力，一面與中國親善，一面以其近年來反捷克波蘭之手段結好希特勒。日本之暗殺黨并故黨在京城（昔稱漢城）仁川（即濟物浦）二地造成混亂，暴動，使日本軍艦軍隊可浩浩蕩蕩渡過對馬海峽，開入朝鮮以鎮壓秩序了。

日本的七首實際上終於應用在朝鮮的皇宮內，皇后被日軍謀殺，并以陰謀與威嚇的手段逼使皇帝遜位而予以禁錮，今日朝鮮舊皇系的合法的後裔完全是一個假皇帝，他曾被帶到日本受日本教育，賜其年俸，予以日本名義，妻以日本太木，現在其情況已比一度爲「支那幼主」後爲日軍自其隱居天津攫錮於新京僻宮，而冠以滿洲皇帝名義的薄儀更慘了。

在好的一方面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人在朝鮮會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當其初占其地，甚爲污穢不衛生，并貧乏得可憐，山嶽之森林被摧伐，農村一再患於水災，無適當的公路，文盲倒處皆是，每年流行着傷寒、天花、霍亂、痢疾及瘟疫。

如今山嶽已重植樹木、鐵路、電話、電報之建設也很完備，公共衛生辦得很好，并有許多良好的公路，水利與灌溉工程，促使農產品大增，建立并經營良好之港口。這地方已變成很繁華，很衛生，人口已自一九〇五年之一千一百萬增加至二千四百萬，如今其平均之生活水準已遠過於本世紀之初了。

但是這種衛生，這種比較繁華，這種物質上的進步，并不能構成朝鮮人民的利益。疾病已撲滅了，因爲患病的人不能對其統治者有豐厚的生產。生活水準之提高也同樣是這個理由，就是農民能歡仰事俯藩都贈給了他們遠能多做工作。四十年來所有此種利益均不斷自朝鮮流到日本去了。

假使日本能如朝鮮人民所渴望者，將此半島上生產之一半爲朝鮮人謀福利。也許其情形不會這麼悲慘而不安寧

了。反之，日本都無情地壓迫這古老王國中數千萬不幸而無靠的土著人民，這古老王國已有四千二百年可靠的歷史，而日本那天照大神後裔的虛構而可笑的歷史，却只有二千六百多年之久。

日本人在朝鮮，可任意毆打朝鮮人，任何日本人可強迫朝鮮人出讓其土地，或其商號，而僅僅給予一些薄酬，所謂社會平等的理想，對於朝鮮人是一種嘲笑，所謂在法律前一律平等的觀念被認為是一種可笑的說法。朝鮮人的住所隨時可被日人闖進，搜索，無須拘票，不容抗辯。

學校中禁止教授朝鮮文字，沒有一個朝鮮人能在其本國內得到相等於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高等教育，日本的警察有審判權，對朝鮮人任意鞭撻，監禁及罰鍰而不容抗辯，任何載有土著人民不平之輿論的報紙。均不容許其存在。日本人占有而主辦的鐵路，將一切的破爛的箱子，污損的商品運給朝鮮商店，但却將完好的貨物箱子送給與之競爭的貼隣，日本商店。歷年來日本試圖獎勵朝鮮人民吸食鴉片，但是這數百萬的被壓迫者，很明白這是官方有計劃的腐化與摧殘，所以仍保持其節制之道，很少耽嗜煙毒。

從前許多遠自美國，英國來的傳教士，他們撫慰一些不幸的朝鮮人民，並給他們以日本統治者所允許的教育。然而現在所有這些基督教的機關均被封禁，日本政府攫奪并封閉所有教會學校，醫院與教堂，外國人亦遭受禁錮或被驅逐出境，朝鮮教會團體常被恫嚇，假使教士回國洩露朝鮮的實在情形，即將施以各種報復手段。

日本統治朝鮮時設一總督，該總督僅向天皇與日本陸軍首領負責，事實上其行政完全是武力獨裁，佐以一羣暗探，而以占領軍維持之。警察甚至於日本學校的教員均武裝佩劍，以示其至高無上之權勢。

歷來日本統治此地，從無任何明白的表示，擬以正義與人道安撫這些孤立無援，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其本土內有二千四百萬的朝鮮人民，一旦獲得武器幾乎一致地會起而反抗，這也是日本人自食其果。儘管此類行動在現況下怎樣無望，儘管參加之同志預先知退，一旦祭出將受何種酷刑，但是事實上仍有零星的暴動與集體罷工的事件發生。

朝鮮人民深信威爾遜總統的諾言「民族自決」，曾於一九一九年有贊助自由運動的和平與非武裝宣言，結果造成七千五百零壹個死犯與大屠殺的犧牲者，被監禁者有二百多萬參加宣言的人，這時期殘酷的情形，幾相等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發生於南京的殘殺，震動了整個文明世界。一九二九年復有些無希望的暴動發生，亦仍以嚴酷的殺戮處之。

自中國事件陷於長期拖延之窺境，日本即強使年青的朝鮮人編入日本軍隊，按中國方面資料的估計，約有十五萬朝鮮軍隊被遣送至各戰區。但是日本人并不信任這些軍隊，結果每九個朝鮮兵士中必配置一個日本人，而其他正式任命或非正式任命之官員亦均為日本人。甚之自朝鮮派往作戰之部隊，常受左右兩邊日本軍隊的威脅，并常有日本軍隊掉轉機槍射殺非武裝朝鮮部隊以鎮壓叛變及大規模逃兵之舉，這種可靠的事實亦盡人皆知。

日本人對於朝鮮人的侮辱實令人不可置信，每一個地方，每一條街均冠以日本名字，漢城之舊皇宮或是紫禁城（漢城現已被易名為京城）現已遍生荒草，任人蹂躪。朝鮮有一個相等於北平天壇的地方，現已設為茶亭，以供京城高等旅館旅客消閒之用。當勇敢的朝鮮皇后被日軍謀殺後，其屍體即以油浸之衣服包裹，在皇宮內皇帝住所附近的天井裏焚燒，事後并假傳聖意，辱其亡妻為不貞。但是此廢君仍很有勇氣，當凡爾賽和會進行中，朝鮮獨立的問題甚為塵上時，日本假造千萬朝鮮人民簽字的請願書，表示仍願受日本的「保護」，少數簽字者是真——任何地方都有吉士林（擲奸）——但大多數都是偽造的，其非偽造者亦均係在刺刀下逼使簽的字，此廢君亦同樣被逼，但是他拒絕了，三天後他就死了——被毒死的。

在戰略上講起來，朝鮮實為遠東最重要的地方，西臨黃海，南面中國海，東瀕日本海，自日本門司渡對馬海峽至朝鮮最大港口釜山之距離僅有一六〇餘哩，此半島之海岸線長一千七百哩，有許多良好之天然港口，雜佈着無數多山之小島。其鐵、煤、銅、銀、金等礦對於日本極為重要。尚有少量之鎢、鋅、鉛、筆鉛等礦藏——此一切在戰時均為重要物品，米、黍、棉花、小麥、大豆之豐收使日本伙食室與鈔票夾都增加豐富，朝鮮的漁民生產鹽鱈，亦

足供日本食用。

朝鮮有充分之天然財富與資源足使其民安居樂業，朝鮮人有傳統的勤勞節儉的天性，雖然此種美德在受日本的統治下已消磨殆盡，因當時無論勤勞節儉均與居民無益故也，假使朝鮮人，一旦能為自由所激勵，能允許他們為自己工作，那麼他們的勞苦，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海洋將會賜予他們一個在東方世界裏認為是幸福的樂園。

但是朝鮮的情形與滿洲一樣，必須將日本完全驅出；日本人所有的投資，財產必須要宣告沒收，這當然對於日本將是一個經濟上可怕的重大打擊，然而即使使其損失財富，數達數十萬萬元，亦不足補償朝鮮過去四十年來忍受那驕慢的日本人的統制與殘酷，假使日本放棄其在朝鮮作為侵略，開拓之根據的鐵路、電報、電話、飛機、以及海港等事業，其國內將要引起極度不安，公開的指責，與嚴重的混亂了。

已有三個不同的組織預備在聯合國戰勝日本後，正式提出要求，在朝鮮建立獨立政府，這些團體分別在重慶、中國的戰時首都，蘇聯保護下之西伯利亞濱海省，與夏威夷三地成立首腦部，其中以第一個之要求似乎最先進，堅定而具有影響，并派「使節」李承晚博士駐華盛頓，李氏前曾任朝鮮流亡政府主席甚久。

此實際上之流亡政府現暫以重慶為其避難所，并於一九四一年在中國之首都舉行其第三十三次流亡國會，選舉金九為主席，任命李青天為駐華韓軍總司令。

與蔣介石將軍之軍隊在中國共同對日作戰之韓軍全係志願兵，其軍隊共分五個單位，并常川自朝鮮，滿洲招募軍隊來自自由中國以增加其實力，其給養，一部份靠在美國之韓僑的捐贈，一部份則靠重慶政府之津貼，但是他們裝備衣著均簡陋不堪，如能從美國得到金錢上之援助，或者在美國援助中國之租借法案中配分一部份，而向未來的朝鮮政府算帳，這一定很有效力，但是迄至目下華盛頓仍吝嗇於選擇任何有利於朝鮮之舉。

在重慶之朝鮮政府實為朝鮮獨立黨之支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國軍事委員會批准正式承認駐華朝鮮革命軍之合法地位，其在重慶之團體，除了指揮駐自由中國內韓軍之行動外，并不斷派遣特務以與在滿洲二百萬韓民合

作，并指揮中國淪陷區內千萬朝鮮人之罷工及間諜活動。

自珍珠港被襲後，朝鮮臨時政府即正式向日本宣戰，後來并曾請求正式承認爲向軸心宣戰之聯合國之一，這不獨也是要想正式承認其爲朝鮮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已。

所有這些事實，似均表示重慶的朝鮮臨時政府應立刻可被承認，可被邀請簽字於聯合國宣言，可給予租借法案之貸款，以助其能更充分的參加對抗日軍。事實上美國國務院也已被要求，急須再做這些事。幸而國務卿赫爾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於其答復此項急迫的要求的復函中尙爲接近，赫爾信中的一段：

「本國政府對朝鮮人民之切望自由，一如對其他被暴日或軸心國征服下之人民，同樣地深表同情。

閣下深知，在美國以及他國之各種朝鮮團體均爲其本國人民與日本佔領區之人民而呼籲，而其他各國之團體亦有同樣之情形，蓋其國本土亦爲軸心國所佔矣。故本國政府所能允予在本國此種性質活動各代表之考慮，其主要之意思乃本國深願於聯合國獲勝後，對於現正處於軸心束縛下之人民，竭力避免一切可能剝奪其選擇與建立自治政府之自由。」

國務院的信中，表明了美國政府在其些問題上具有無窮的錯綜複雜，缺乏一致的困難，這只是因爲此一國家，爲了其祖國的獨立而有許多不同黨派的激烈競爭，并不能一致努力之故。他承認如讓他個人選擇一個此種團體，這是很簡單的事，他信上寫着：

「本國政府若將合衆國置於某種場合，致對任何一外國團體之優惠超於其他此類團體，并義務維持此項優惠而不注意產生此團體之國家的現在或將來可能的祈望，此實非一簡單之事。」

赫爾的信并略提其視爲曾考慮過的一種錯綜關係，假使一旦拒絕承認，這要求獨立的組織將會停止以其全力對日抗戰。國務卿對此點也寫明：

「如閣下所示，吾人實難予以置信，除非本國政府首先承認貴團體爲貴國實際上之政府，而有發言權，足下所

精之團體實不能使其所代表之國家爲其本身之自由而有所行動。」

「足下所謂能爲之事，實有類一種『叫賣』，其代價即爲美國政府之承認某一定的團體，并允於該國有任何行動前即付給此種代價，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這是錯誤的，余對來函中此種申明與含意是否能代表貴國人民的精神，現實難予置信。」

赫爾函中的結尾，更針對此點講：

「本國政府之意思，對於不願臣服於暴虐的侵略國之一切人民，均願給予適當而切實之援助，以求獲得或重新獲得自由，本國政府既已參加此自衛至上之戰爭，那末對於任何被征服被壓迫的人而能自願予吾人以助力，以期獲得一切愛好和平遵從法律之國家的共同勝利者，本國政府自所歡迎。」

「聯合國，無論其爲單獨一國抑全體，均有一共同之目標，有許多爲被壓迫之民衆之代表或發言人之團體，絕無例外，均當自覺不能不盡其所以效力於此種目標。」

這篇澄清的申明，本應能阻止各種黨派的競爭，此類黨派均爲了地盤與權力而努力，都希望於聯合國勝利後，自與邦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地域中，取得優先的勢力，成立政府，或成爲該地之統治者。但不幸赫爾這種清楚簡明的分析并阻止不了這種競爭，各黨派仍爲了戰後的主權而爭執，這種情形表明了，只有當商討和平的最後條件的時候來到時，用一種可怕的壓力，始能使他們自覺，這種鉤心鬪角的競爭，并不單是朝鮮各團體間有之，即印度各團體，以及其他爲軸心國所占領下的地方，能代表其民衆的流亡團體，也同樣有這種情形，這實是一種不可樂觀的現象，尤其值此勝敗仍未分明的時候。

大西洋憲章的一般性質，并不使人滿足，尤其是對於朝鮮更不能滿足，朝鮮抱有極高之祈望，因爲威爾遜總統在上次大戰中，用以修飾其演詞的一些好聽的原則和不確定之諾言，已打動了他們。

這些痛苦，失望的人民再繼續爲了一些并不能立刻就來，立刻就去的東西——獨立與自治——而奮鬥，而渴望，

這雖是不公平的事。然而也有令人不快的事實，便是那數十年日本人的壓迫，缺少普通的教育與訓練，以及朝鮮人民黨派主義之不適於立刻獨立。那些個有的在行政上有訓練的朝鮮人又幾乎都是些小吉斯林，他們缺乏愛國心與自尊心，甘心在日本主子之下接受屈辱的地位。

一俟戰爭停止後，必須建立自由的朝鮮，——應從日本人的軍事、政治、社會、經濟等等統治下解放出來，聯合國應毫不躊躇地答應她。獨立也應允許，不過時間要較後一點，要等到朝鮮人民收受了任何自治人民所必須的教育與訓練之後。戰後如立刻予以獨立，其結果是送與他們內亂的一種曖昧的禮物。

孫逸仙先生曾為中國人民計劃一個「訓政」時期，朝鮮人民也同樣需要此種「訓政」，或者可以把她置於國聯共管之下，置於國聯的繼承後身之下，或者也可想像地置於她自己所選擇的慈善的保護國之下。

獨立與自治非但必須要獲得，并要謹慎地守護着它，朝鮮人民現在尚不適於守護這種不可估量的禮物。

第七章 菲律賓

今日之美國人尙能回憶，當我們正式允許菲島獨立時，歐洲各帝國主義對於我們曾有硬直而不容氣的指摘，說我們是在讓白種人走向衰敗之路，這是很令人發笑的。我們曾在菲律賓所施行的那種理想的政策，在他們的意見以爲也許會在遠東太平洋以及南亞的英、法、荷等國那些當庶的殖民地中引起政治上的糾紛與擾動，甚至還會顛覆了印度。

現在這些一度發過牢騷的帝國，已完全自其南亞與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中被逐出。可是他們之被逐卻不是因爲其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要求，而是被一個亞洲強國用野蠻的力量與壓倒的軍力所逐出的。這亞洲強國之所以能強大，也不是因爲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想，而是因爲他絕對拒絕這種理想，并學得了西方軍事與工業的祕密。美國也同樣被驅出於菲律賓，其被逐出，却發生於我們預備離開之前，并也在菲島人民準備要我們離開之前。

如今白種人的強國必須打回其所失掉之殖民地去，這次回去要做的，并不是重建舊殖民制度，而必須要給予那些一度臣服的人民以自由，自治，當我們準備使菲律賓獲得自由時，這些強國却都害怕這些人民提出同樣的要求。

日本聲稱是爲了要使東亞脫離白種人統治而戰，實際上日本所發動的此次戰爭也確可造成這種解放，但也只有當日本戰敗後，東亞人民始能於日本壓迫下重獲自由。所奇怪的却是日本所攻擊的，乃是足以促使舊殖民制度崩潰的民主政治。某些自由，無論是獨立也好，或自治也好，均因日本侵略政策所促進，至少快了三十年，只有菲律賓是例外，除非我們與菲律賓人都是毫無主意的人，這次戰爭只有使菲島之獨立延遲了幾年。

熱帶人民處於各種壓迫下已有數百年了，要解放這數千萬人的偉大的問題會搖動我們的理想，我們要教育他們

使其獲得、保有、而不濫用自由，這種唯一的教育問題現正遭受了挫敗。爲了要使這些人民能自給而又不致使歐美的經濟發生無可補救的損失，這種必須做的調整的功夫更會使世界上經濟金融的領導者氣沮。

允許東亞人民得到四大自由，似乎很簡單而容易，這只是頭腦簡單的樂觀主義者才會這麼想。他們以爲只要把日本人驅逐出去，解除她的武裝，然後經過其人民自各種互相敵對的黨派中，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選舉一個適於統治他們的政黨與人物。這樣就可以了。這是否足夠了呢？

菲律賓的情形比較上可說是最不複雜了。在那羣島中，以前那統治的國家爲了以此矜其國勢，爲了經濟上的需要，爲了政治上的便利，本無意放棄統治權，所以也就沒有那些令人不快的經濟或政治的團體。美國人管領後，從一九三五年後即準備放棄統治權而樂意讓非人完全獨立，并定一九四六年實行，將一切改進的計劃到處佈置着，使其政治和經濟有必需的配合。

但是這次戰爭卻把這種佈置根本推翻了。我們那些在議會開會時討論種種議案的運動者，於此必發出一種令人鄙夷的呼聲道：「不要聲張」因爲他們是贊成使菲律賓立刻得到獨立的；即使數百萬菲律賓島民會因失去蔗糖在美國那可以自由進口的市場而致貧窮，他也不管了。反一面那些海陸軍專家當討論到我國在菲律賓的戰略據點是否會因此削弱，或討論到卡撒堆(Cavite)哥芮日陀(Corregidor) 是否是保全我們在東方利益的堡壘時，他們也同樣會叫你不要聲張。

當我們真正予菲律賓以獨立時，究竟能否以自己的力量防禦外來的侵略，我們不要先和人家訂許多條約來保證其中立地位；我們不要給他們一種武力的保障；這些討論似乎過去已太多了，并且也太幼稚了。但是一定要向菲律賓人保證「辦事」，又何等厚顏而無聊？

自由是菲律賓人必須有的，倘若他們已經估計過戰後任何和平設計的持久性，而仍認爲必須的話，絕對的獨立，也必須要給他們。不要說我們已經答應過他們了，即以他們在日寇入侵時那一份助我們作戰的勇敢，也應該得

到這些報酬。自由不應當做我們的恩惠給他們，而應當作一種權利給他們。

我們在菲律賓已有過不少的實地試驗了，這些實地試驗就是將來對於另一些落後的人民需要訓練使其能重獲自由的權利時，也是大有幫助的。我們化費在準備菲律賓人民真正獨立的時間已有四十年之久，歷史上再也沒有像這樣對於理想主義的價值，有這麼大的下注了。

我們會訓練他們以自治的技術，我們會教會他們一種共同的語言，以代替他們二十種以上不同的方言，我們對他們講教誨以尊重人權，自由與民治的崇高理想。自本世紀初年以來，我們幫助他們，使其國庫收入倍增，教他們懂得公共衛生，普及教育，良好公路與完善之通貨的價值。這些我們已在仁牙因敗退時與在巴塔納半島上勇敢擊斃的困阻時，已得到我們的報酬了。我們對於菲律賓人以及對於援助他們的方法的信任已經得到極好的證明，那些殖民強國，當日本人攻擊時，並沒有像我們得自菲律賓人一樣得到馬來亞，印度尼細亞，緬甸土著人民的幫助，這是他們應該注意的。

在這恐怖的時期中，菲律賓并學得了一種教訓。他們雖遭受了侵犯、蹂躪與摧毀，而仍樂於負起其在將來應負的一部份責任，以保持他們那一部份世界不致再受國際強盜的危害。

若不考慮其鄰國及鄰國人民，實不能斷定菲島政府將來會怎樣，因為有許多重要類似之點得顧及，同時也有重要不同之點得考慮。因為東西南部和南方一些小島嶼都具有各種不同的外來文化的矛盾。

經過西班牙三百多年的統治，菲島人民很自然的成爲天主教徒，但是其南方之島嶼如蘇祿民答那峨等地大多數仍篤信回教。附近的爪哇，馬來亞居民雖亦多回教信徒，但在東印度羣島仍舊不吝蘭滑教徒不可抹滅的標幟。然而在印度之其他部份卻多的是佛教徒和印度教的信徒。泰國，緬甸以及印度支那的一部份，仍保有他們自己的文化，而這種文化都深受印度的信仰和文化之影響。

自從杜威將軍於一八九八年在馬尼刺灣消滅了西班牙艦隊，美國即把這七千個菲律賓羣占領了，這一一四、〇

○○方公里的東方熱帶地方即歸我們所有了——其面積約相等於美國亞利桑那州。要比密歇干州大一倍，換言之，其面積大小等於新英格蘭再加上紐約與新澤西二州。

以前的交通很困難，各島間航線也僅靠不充分的幾艘汽船帆船，既沒有鐵路，也沒有公路。人民在血統上一直都是混淆而雜亂，除了占優勢的三種血統——馬來種、蒙古種、黑人種以外還有西班牙血統以及多數混合着中國人的血統，這些中國人到這裏來，居在這裏，在這裏結婚已有數百年了。

自美國管有此地以來，也與日本人統治朝鮮以來一樣，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但是這裏却没有那些在本國反而幫助其征服者作戰的朝鮮戰士，日本人也並沒有像我們那樣專為準備其人民自治而教育菲島人一樣地教育朝鮮人。這樣一比較，便可打破了日本人那種以解放東亞人民，脫離白種人統治自命的狂囂。在朝鮮、在滿洲、在臺灣、此時不產生亞圭那多（一八七〇—菲律賓人民領袖）甘地，尼赫魯一流人物，還更有什麼機會呢？

當我們將日本人，這自由的解放者，趕出這七千個小島以外，菲島人民亦不能立刻接受獨立。其主要的城市大嶺都已被毀、焚燒、掠奪而為之一空，積穀之無存也是一定的，除了大量無保證之日本軍票外，將無一錢可剩，除非美國借給它，其國庫已將空無所有。而且懷有報復心的日本人，當其撤退時，還一定要掠劫、破壞。各島間的交通將無一艘商船可用，而也不會立刻就有大的太平洋郵船，貨船將菲島熱帶產品運給那些準備進口的國家去。事實上菲島在幾個月內，也許在幾年內將沒有什麼可輸出，美國人的大鍊糖廠也將被破壞，它如榨椰子油工廠，麻織工業亦均將被破壞殆盡。

多數集中於達華峨（Davao）以及民答那峨島上的麻織工業，其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為日本人所有，擁有二萬日籍僑民，差不多的人都不效忠於美國以及菲島政府，且都熱心於日本用以侵略的第五縱隊，在戰前，菲島人民痛恨這般人，所以這些人再要繼續住留菲島是不可能的了，也許他們會步滿洲、朝鮮等地日本人的後塵，永遠遷返其本國去了。

菲律賓人民一旦獲得解放，或將比那些在納粹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滄帶地域人民較佳，因即使菲島遭受重大的毀壞，但是在菲島沒有冬季，沒有寒天，也沒有燃料，居所等等問題，稻米長得很快，一年可收割幾次，香蕉以及其他熱帶產品伸手可得，所謂衣服，男人一條短褲，女人一副圍裙已足，實在多數的農民，以及大多數的村居之民，他們也不過就這麼一點衣着需要而已。

這些勇敢的人民的前途并不十分光明，日軍尚未入侵時，菲島政府雖預定在指定一九四六年獨立以前，從事許多公共福利事業，然而除了口惠以外，實際上並沒有甚麼成就，人口過剩的地方，其地租之高出人意外，將這些地方的人口移到未開發地域的移民計劃，也會遭遇到嚴重的困難，除非肯出極昂高的價格，大地主從不願分讓其土地。

對於那些受地主欺壓的農民，已完成了一個完備的計劃，以政府廉價的貨款借給他們，但是這計劃的結果却相反。雖有農業學校，但是不普遍，大多數知識階級人民認為在田裏工作的人只配是苦力階級做的，這些知識人士多喜歡做一個律師，政治家，醫生或文學家。

菲島，除非美國再以多年的長期間允許其糖、椰子、椰子油、煙草等無稅輸入，將無法恢復繁榮。但是生產這些物品的美國國內的生產者也許會重新反對與菲島的自由貿易。

十年來大不景氣時期之後，當歐美市場對於熱帶殖民地產物之需要驚人地衰落時，東南亞州各地政府均注意於工業之發展。菲律賓對於此問題尤其特別注意，因為這正值其面對即將獨立之前夕，加以其時菲島原料又已不能自由輸入美國市場了。菲島政府於是開始鼓勵人民以牲畜耕田，改變食物生產，實行工業化，但是在這些方面均無甚進步。或者這於菲島人也不無好處，因為如果工業建立了，現在還不是給日本人利用嗎？否則亦將被毀於那些被侵略帶來的轟炸焚燒中了。

要想恢復戰前菲律賓所有的政府制度，也很困難。地方自治遠於一九〇一年就被介紹進來，六年以後就召集了

選舉的立法會議。後更擴充選舉權於所有識字的公民，於今已有二十一年之久；於是所有政府機關均開始倉卒而不可爲訓地「菲律賓化」，這種突然的改變，致使數百富有經驗的美國人，以及有許多地方占有重要行政的機關，均應交一些無訓練的人去管。一九三四年，即獨立法案通過的那一年，這裏僅有一個熟手的美國人管理的重要機關了。

在日軍侵犯時，菲島政府爲一個總統，一個副總統所統治，其上下兩院均爲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的，除開國防、外交、移民、關稅、造幣、通貨仍歸美國掌管外，一切事務統歸菲政府管理。共和政體之安全、憲法、或者是菲律賓人民對美國的義務一旦發生危險時，美國總統在這些上面都有否決權與干涉權。

雖然菲律賓的憲法一般地模倣美國，但在太平時仍另有一種很顯著的趨勢，就是權力集中於總統奎松一人手裏，其明顯的程度較美國戰時更甚，三十年來，菲島沒有什麼重要的反對黨與少數黨，其現在之政府已成爲一種自身延續的政體了。

泰丁麥克杜費克法案，除建立了菲島的共和政體，以及保證一九四六年菲島之獨立以外，并且特別聲明對於菲島的問題應遲於一九四四年以前重加檢討，雖然在一九四一年的下半年，戰爭已成一種不可避免之事，但是，菲島人民以及我們自己的國會，均未覺得將要發生什麼事件，甚至也未想到這戰爭對於菲島人民之未來將有什麼影響。

在寫本書時，覺得戰爭未必能在一九四四年結束，更決不會在一九四四年以前結束，我們對於菲島屆時發生的問題能重新作一明達之檢討。此次戰爭在可能範圍內會在一九四六年以前得到勝利的結束，而這一年就是允許菲島獨立的那一年。

目前在政治上，戰略上，或經濟上看來，這是很顯明的，菲律賓人民還未能即予以獨立，至少要等直到此次戰事結束了幾年之後。爲了過去的紀錄，泰丁麥克杜費克法案實應予以修改——最好是由菲總統奎松以及隨其駐在美

國的非政府官員提出來。重組非政府，舉行過期的選舉，再建法律與秩序，訓練新警察與警衛隊，補修被毀的鐵路，以及克服那為戰爭所遺剩下來的傳染病，這不過都是些基本的要求——可也都不是幾個月內可完成的。重建如以往一般的政府，這就得在恢復之後再化幾年工夫，而且還必須先使菲島可不靠以其產品之能自由輸往美國而得到繁榮。

遠於一九三一年，菲島人民因享有特殊的形勢與保護，而提高了其一般之生活水準，約較其他亞洲大陸各鄰國人民高出三倍，戰爭所賜予中國、印度支那、泰國、緬甸可能以及其他新解放區域者將是極端的貧乏，或者甚至於飢荒。因此菲島人民實須要，並應該得到我們的保護，以免陷於相同的情形，以免與數百萬亞洲患難同胞，作無謂之競爭，蓋此數百萬人民，其生活水準至少在幾年內，將比菲島人民於逐出西班牙惡政之後所遭受的一切，還更低賤。

戰前，美國每年要買八十五萬噸菲律賓糖，從一九二六年以來美國商入差不多要占取菲島全部出口之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六之間——這對美國都是免稅進口的，當我們讓菲島人民絕對的獨立，設有意維持其原有之生活水準，這至少也須十年工夫才能建立一個自足自給的經濟條件。

理想主義也許會促使我們，一俟日軍登船離去即予他們以獨立，現實主義却會告訴我們，我們仍應留守此島負管理之責，我們於此當再申說一遍，至少還須十年，因為遠在侵略者來打擊摧毀之前，我們已化了四十年的工夫來完成我們的工作了。但是我們假使要這麼做，我們卻不歡迎再有什麼指摘，以及政治上詭譎的演說，一如過去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前我們所忍受的一樣。過去因為偽託反美的誤解而風行的投票測驗民意的那種政治手段，將會在大平之時得到另外一種結果。

記着，巴塔安是一個榜樣，美國於戰後對待菲島也必須溫和些，但是這必須也要有一個堅強的意志。共同的危急，共同的痛苦，以及共同的努力，已使我們自己與菲島人民雙方俱忘記了過去的爭執，然而隨着和平來臨，他們

將會引起一些形式上的變化。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首先應不被一些來自菲島，朝鮮，或來自遠東其他各地的特殊辯護者所欺騙。并且我們還須特別注意那直接或間接代表日本的特殊辯護者，而不被其愚惑。

當威爾遜總統時，哈禮遜先生（譯者按：法蘭西斯·柏克·哈禮遜在一九一三—二一年為菲總督）為菲島總督，我們曾予菲島人民以近乎完全的獨立，但是，他們却可笑地濫用了。一九一六年通過的準茲法案，已使菲島政府幾乎完全非律賓化，當其時與二九二二年間，伍德將軍為總督時，則正義之政治已瀕破產，商業亦染上了政治色彩，并掠奪了國家銀行，政府企圖侵入其商業園地，結果徒引起世人之反感，并造成了納稅者數百萬菲幣之損失，公共機關充滿了無能且無訓練的人員，換言之，國會之議案實不能將其公共事業的道德觀念移植於東方人之頭腦中。

「銀行的不名譽」變得非常嚴重，菲律賓的鈔票與匯票均為英國殖民地之各銀行以及日本帝國各地銀行所拒受。一九二二年在菲人不良之管理下的國家銀行，已不能履行其任務，而迫於向上海各銀行，以及任何地方能長期拖欠不會逼債的銀行借款，此種損失極為驚人。按菲律賓法律，一切市政府省政府的公債準備金，均必須存入菲律賓國家銀行，後來甚至一切信託準備金也同樣要存入國家銀行。美國原持有用以改變菲島幣制之四一、五〇〇、〇〇〇美金，亦終被剽撥至馬尼刺用以維持此種危急的局面。非但政府的存款受到損害，菲島的紙幣貶值，而且許多分行經理也都受到刑事上的處分。

也許有人以為恢復比廿年來更可笑的局面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并為以這一九一六—二二年的大失敗只會開罪那會助我們英勇作戰的那敏感的民族。

我們不能懷疑菲律賓人民的英勇，自我們將菲島從西班牙手中攫取過來後，他們曾與美國派出的軍隊作戰了二年之久，并有兇蠻的戰績。即使在菲島沒有我們美國軍隊去幫助他們，他們也無疑地能與日本侵略軍作戰，假使我們對菲島問題有一個實際的頭腦，我們一定會記得他們作戰實是爲了他們的家鄉已被襲擊，他們的都市已被炸壞焚

毀，他們的海岸已被侵入的緣故。他們痛恨并害怕日本人，因為他們知道自從一九三七年仲夏之後，日本人是怎樣對待中國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因此也感覺到日本人一定也會有同樣的虐待加諸他們自己。菲島人民是很勇敢的，并且也歡迎與我們的軍隊聯盟，但是他們并不是主要地爲了幫助美國。

菲律賓人很久就有這種論調，以爲假使他們自己愛這麼做，即使做錯了，也還是他們的權利，實際上奎松總統也并未否認向來認爲他所說的那幾句話，即謂「處於美國人管理下的天堂政府，還不如處於菲律賓人管理下的地獄政府爲佳」。他們以爲我們在大都市如支加哥紐約等大城的某些行政管理簡直腐敗得不堪，并以爲只要我們一旦遭受坦馬尼派人，輝隆氏與一切黨棍的搗亂，就一日不必批評他們。

政治的腐敗并不是應加以衡量的唯一的危機，當一九一六—二一年菲人負責之政府最盛時期，其公共衛生事業之失敗實與國家銀行之被侵奪同樣地震動人。一九一四年全島因天花致死的僅二百七十六人，但是一九一九年，其衛生事業已全爲菲人所管理時，竟增加至四萬九千人，因霍亂而死的亦自一九一五年的八百二十人，至一九一九年一歲而增加至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五人，一九二三年當其衛生事業已予以適當改組後，其死於天花者僅五人，死於霍亂者僅七十二人。

除非等到我們所宣布過我們要做的事已完成了，我們是不能全部自菲律賓撤退的。——如掃除文盲、教育人民自治，以及建立安全與繁榮工作。

菲律賓羣島乃沿亞洲東海岸而伸長，其與亞洲大陸之距離約等於我們加拿大的邊境至墨西哥灣，我們初自西班牙手中取過來時，人口不及七百萬，而當日軍侵入時，其人口已增至一千六百萬，一般估計它能維持五千萬人口。當我們工作只完成一半時，實不能讓頑固的理想主義來引誘我們放棄此羣島。

奎松對於菲律賓處置戰後問題的態度，已於一次特別訪問中完全表示出來，曾於紐約時報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刊出，奎松先生說：

「有時候，我對於大西洋憲章的命名深表遺憾。許多人均誤會，以為大西洋憲章僅適用於在大西洋沿岸的人民。」

「然而此并非事實，真正講起來，大西洋憲章實是遍及全球的憲章，適用於世界各國以及各地人民。」

「這是一個對歐洲、美洲、非洲、澳洲的憲章——讓我們看清楚這點——並且也是為求亞洲以及遠東人民解放的憲章。」

奎松說：勝利完成後，將會得到真正的試驗。

「因此我們將會面臨改善那我們已答應我們自己的事的工作。」

「我們將會被要求扭負起戰後的犧牲，它能於憲章中獲得自由的原則，而將它置於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們從事這種偉大的工作，去創造一個無恐怖，無匱乏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面，我們能自由地發言，自由地夢想，自由地信仰，這個世界裏面，惡人將不復能破壞和平。」

「當我們一念及此大西洋憲章之簽訂，這是我們所當提供於我們自己的目標，這目標使美國人與我菲島人在菲羣島上具有同樣的意義。」

「這是西半球以及東半球老百姓們所要說的話——我想這實在也是每個懂人類尊嚴的人心中想說的話。這是和平與正義的希望，它使我們這次戰爭的流血與痛苦很為值得。」

第八章 法國在東方

法國人，在其富強之日，習慣上把在印度支那所有的大片殖民地比之法國在「太平洋上的陽台」。這一句奇怪的話，就是形容這對於法國具有無限價值的寶庫，但如一旦缺乏注意，此陽台之支撐一腐朽，那麼這整個機構就會首先被強力推倒。

今日的法國，在太平洋上，既無陽台，亦無窗口，印度支那是在日本人手中，上海、廣東、漢口、天津的法國租界也同樣在日本掌握之下，其在太平洋上各羣島，名義上雖仍為戴高樂的部下所統治，實際上却都在美國海陸空軍控制之下了。

法國在中國的租界將不能再奉還法國，這是一定的。它們是很有好處的，但非法國之功。例如，過去上海的法租界是賭博，寶座的資本營，而當中國厲行禁絕煙毒時，却公然販賣鴉片，巡捕們的詐騙很厲害，大家都知道的許多法租界的官員，幾年之內，就可刮一筆很可觀的財物回去，這些財物却并非靠薪水積蓄而得的。

無論新雜琪或戴高樂部下均慣於以法蘭西人特有的語調聲明，戰後的法蘭西帝國，必須完全收復這些土地。但是爲什麼呢！是不是因爲法國受過痛苦呢？這是再笨也沒有的藉口，試以法屬印度支那的情形來講，這些老百姓他們也同樣受過痛苦，而且受的是貪婪的法國虐政的痛苦，如將他們的壓迫者日本人趕出以後，仍交還法國統治，這簡直是有罪過的愚策。

「殖民地」一詞，在美國讀者看來，其含意就是一塊略小的領土。但是法國的印度支那殖民地，實際上要比法蘭西大得多，其情形如下：印度支那的面積二八六、四二二方公哩，法蘭西面積二一二、六五九方公哩；印度支那人口約爲二四、〇〇〇、〇〇〇或比其本身人口之一半還要多。

印度支那是一臂一臂地攫取得來的，自一八六〇年，始對東甫寨與安南二土著王國施以壓迫，但直至一九〇九年其真正的統一尙未完成。當一九三九年法德將要開戰時，猶僅以交趾支那殖民地成立一印度支那聯邦，而以一法國總督統治之外尙有四個保護國，即東甫寨，安南、老撾、東京，以及租借自中國的廣州灣，所有這些地方之行政管理均集權於總督一人手裏。在理論上，老撾是有一個土王公統治的，東甫寨也有一個國王，但是這些尊貴的人也如東京與安南之土酋一樣，實際上是受法國官吏所指揮，而僅對法國總督負責。

雖然這裏也保有一個偽裝的『不直接的統治』，保有中國清朝的官制或地方官吏，以執行法律，但是其整個區域實際上却被法國人所統治，控制着法國與法國投資的利益；至于土人，在實際的行政上，僅處於極不重要而極卑下的地位。

印度支那從沒有真正種族上的團結，或者是國家思想。王公向北平之中國皇帝朝貢，已有不少年數，而現在中國政府却從沒有希望過要恢復任何這種古老的宗主權。安南人在所有土著人氏中是最活躍的，其人數亦較其他一切部族合併起來還多，其文化與中國發生極大的關係，而東甫寨人的文化却又很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在內地主要還有些原始的部族，如莫人與寮人，他們從來就未曾與外邊人接觸過。

在第一次大戰時，法國曾將數千安南人武裝起來，試用于歐洲及其他各地，雖然這些人民數百年來亦慣於小規模的部落與國家間之爭鬥，但是他們即使在十個土人中置有一個法國軍官，還仍不能肩起重的大砲機槍，合於一九一四—一六年歐戰的標準而成為很好的士兵。隔了些時，他們就只主要地負責輸運，清掃戰場，及埋葬死屍等工作。因此即使克服了其地，而有足夠的軍火供給土著軍隊以新式配備，但印度支那也許仍不能供給聯合國的兵源。

湄公河與紅河流域的肥沃的紅色沖積土壤，供給大多數人口以豐富的稻米，此種收穫使印度支那有主要的糧食與大宗的出口，結果其產米區人口極為稠密，但其山嶽地帶與高原，人口則仍稀少，且仍為叢林所遮蔽。印度支那富有錳礦，并有相當數量的煤礦與鉍礦，起初他們也曾開發過這些崎嶇的山林地帶，但是因其出產并不能增加其世

界貿易，此殖民地大宗的出口，除了米以外，就是紙，玉蜀黍，茶，皮革與乾魚，其大部分進口貨則不外棉織品與絲織品，火油與機器等物。

法國的廠商，總想設計把這個地方榨乾，使進口稅提高，以阻止非法國貨物之輸入；但即使如此，日本的棉織品，仍能在日本人武裝占領該地以前，大量輸入以代替來自法國的棉織品。其時印度支那仍悠然保持其農業殖民地之狀態，輸出原料，輸入為法國製成品，其數量則視此生活水準低陋的數百萬土著人民是否能承購而定。

一九三一年後，日本雖然已開始其侵略的事業，并公然有南進之趨勢，但法國仍不在此富庶而有價值的領土上增強其防禦，根本也不想建立什麼駐防殖民地的精幹而忠實的軍隊。法國不願其近鄰美國在菲律賓的榜樣是怎樣，也不想減少其地文育之高百分比，而對那些爲了自治和獨立的未成熟的運動，却一味用其重掌鎮壓。

法屬印度支那，顯然是全東亞以及南方的海洋中，白種人帝國主義的最壞的榜樣。法國的政策貪婪而自私，就算不像英國人在其帝國領土內，以及許多美國人在菲律賓所做的一樣，將白種人和色種人的社會階級分得很清楚，但也抵消不了這種不好現象。

菲律賓人，當侵略者來到，即與美軍及陸戰隊并肩作戰，因爲他們覺得這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未來與真正的獨立而戰，但是法屬印度支那的土著人民，他們除了會聽見過那些日本兵在中國淪陷區中怎樣虐待中國人的殘暴的形狀以外，實沒有理由會對抗日本人。

即使英美自願忘記其在大西洋憲章中所允諾的話，法國也終不能恢復其在印度支那之舊有秩序。假使聯合國將東南亞以及東印度的土著人民當作在最後階段中助我打敗日本的有力的兵源，那一定會十二分的失望，菲律賓駐華盛頓代表，依利亞德先生 (J. M. Elivalde) 曾於其聲明中，真實而顯明地總述此種情形：

「我常聽見說，此次戰爭中，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支助軸心，而其餘五分之四之人則加入聯合國陣線，這是真的嗎？我想我們不如講，此次戰爭乃五分之一的人與另五分之一的人對敵，其餘五分之三對於戰爭並沒有真正的

興趣。在亞洲有很多殖民地的百姓，他們今日仍站在陣線之外。假使他們對於將來并不希望有比過去他們所曉得的帝國主義的烙印更好的東西，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站在聯合國陣線外袖手旁觀，我可算是能了解這道理的一人。

不幸地，英國官方會發表公告，保證恢復法國在印度支那之主權，更不幸的，就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美國政府也發表同樣保證之公告。聯合國得到勝利之後，假使允許繼承維琪的政府派遣一支占領法屬印度支那的新軍隊，而許以重行剗削該地二千四百萬人民，這實有違背大西洋憲章的意義與精神。

然而即使法國人民有這種眼光，這種願望，準備給予印度支那以自治，但戰爭將賜與法國以紊亂、窮困，他再也沒有能力像四十多年來我們施於于菲律賓那樣的來推行任何教育運動了。

顯然的，這裏的情形很像朝鮮，最好設一種國際的權力以一相當長的期間的訓政來保護印度支那，而引導其無知的人民走向發展某些事業，如經濟與政治的穩定之類。在這種委員會或保護機構中，法國自將提出要求派一較大的代表團，但是，假使我們真的在行政管理中讓他佔有優勢的多數，那麼難免又會回到貪婪、腐敗的路上去，再蹈白種人在遠東遺留下的污點的覆轍。過去法國人之管理印度支那，只有二種真正的利益，一是為法國，另一就是他們自己的荷包。

印度支那以及緬甸的將來，對於中國有很大的利害。在日本人尚未奪取法屬地域之前，當中國既已失去重要之海口，而滇緬路又尚未築成之時，中國西南視印度支那之海防為其門戶，而海防至昆明之鐵路線亦為中國之生命線。中國對未來之海防仍看為其南中國海之出口，仰光為其向西方印度洋之出口，因此中國應有資格在為管理這兩塊地方而設置的任何行政機構中占有重要之發言權。

華盛頓與倫敦究竟怎樣輪旋他們關於恢復法國在印度支那的主權的諾言，現在還不大清楚，充其量，他們將會吞吞吐吐地聲明他們的保證不過是保證英美並無攫取法國領土為己有成擴充地盤的意圖而已。

甚望保守的倫敦經濟月刊 Economist 一向被視為英國財政界之喉舌，——也會于星嘉坡投降之幾個星期

後，發表一篇動人的詳論，標題為殖民地的憲章，指出英國各處殖民地之土著人民，他們已有了政治上的自覺了，他們也許已知道從英國勝利中他們所希望的是些什麼，二星期前經濟月刊并提及這個題目，茲摘錄一段：

「日本一旦被擊敗，也將不能恢復原有之制度……其所需要者，乃是全新的原則——或者寧可是一種一致適用的原則，爲了這種原則，我們已不知費了多少口舌——對於這些殖民地——馬來亞，印度支那，荷屬印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創造一個獨立的國家，使其在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與其舊母國有密切之聯繫，而懂得怎樣站穩他們自己的脚跟」。

假使印度支那的土人有任何祈望，與倫敦雜誌所稱的舊母國進行連繫，這實是難于置信的，在法國殖民制度之下，其所存在之經濟關係只是有利於法國，社會方面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至於文化方面就沒有安南人東南羣人所想恢復想繼續的東西。

早於一九四〇年春天，當法國在歐洲有崩潰之虞而其上海租界上的行政管理亦顯然有憔悴腐敗情形的時候，我曾去法屬印度支那做一次遊覽的旅行，使我大吃一驚的就是我發覺了在這麼大的殖民地中僅有二萬五千名法國人，其中并包括一切海陸軍及老百姓，其海軍之表現極其脆弱，陸軍也僅是維持地方治安，至於防空設備更連爲對於海空機場等地最低限度之保護的程度也沒有。

終於五月間法國在歐洲崩潰了，日本也立刻跟着南進，法國屬有的由海防到昆明的鐵路，就首先停止經營任何貨運，其中多少有一部分是中國的軍需供應，在日本人壓迫下，連開入雲南的載貨汽車也限于一天只能有二十輛，於是日本人就堅持要在沿那橫跨印度支那的鐵路線上派遣「監視者」了。

那東京會想藉以規避責任的所謂「邊疆衝突」給法國帶來了極大的不幸。控制西南廣西省南寧一帶地方的日軍司令安藤將軍，即移師至印度支那邊境，首先攻擊法軍。曾有一個日本的空軍人員轟炸了海防，東京即表示「太對不起」前，解釋這飛行員純爲「個人的熱情」所激動。這一次小衝突遂使日本人得以控制海防，控制遠及中國邊疆

的鐵路線，以及法屬東印度北面之五個機場，供其陸軍飛機任荷使用。

一九四一年夏，日本因與維琪貝當政府訂立一不名譽之協定，這一協定允許日本人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給日空軍一個良好基地，其地僅距星加坡四百里，同時又給日海軍與暹羅隊在西貢和金蘭灣兩個根據地。自那時起直到十一月七號間，日本就忙於利用這法國的領土，準備對菲律賓，星加坡，與荷屬東印度作其最後的一逞了。

維琪政府除了服從日本命令外，固然不能做什麼事情，但是在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至日軍實際占領的一段期間，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應尚有很多的事可做。只要看荷蘭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已經淪陷了，但是在東印度之荷蘭人，却并不沉於酣睡，坐待日軍登陸而不發一彈。

如今那些陷于此破碎的太平洋陽台中的法國人，他們正有一個悲慘的時期，他們現在所以處於這種絕望的地步，並非僅僅被日本人所統治，而且也被戰勝國家所包圍，因此，他們除了林莽所蔽的雲南以外，不能逃到任何戰鬥法國兵力所及的地方去了。

他們貪婪得來的錢現在也值錢了——印度支那的貨幣與日圓有連帶關係，一旦崩潰來臨，甚至比法朗更不值錢。他們遠東的商船也被服征者奪了去，在戰爭結束前，這些船不是被用壞也就被破毀了。

如今印度支那所出產的橡皮，錫，米與糖，却都資助了日本，用於對那些將來法國本土解放所要依以勝利的國家作戰，并且那些在被征服的殖民地中的法國人，被迫製造與生產這種有助於德國的盟邦之原料與貨物，許多懶惰，腐敗的法國小官吏，如今均韶媚地服從日本人。

然而印度支那正如法國淪陷區一樣仍有愛國的法國人，西貢河南鐵路常常被炸藥炸毀，致使日本軍隊與軍火車受到很大的損害，許多日本的軍火堆棧常常于夜間被法國人彈擊而爆炸，這些法國人痛恨侵略者，均甘冒怠工的危險，但是印度支那的法國人究竟很少，其土人又胆怯而無情，沒有什麼能鼓勵他們，去幫助法國人恢復他們自己原

有的暴虐而混亂的政體。

聯合國的軍隊將會於他日在印度支那的港口登陸，或者會由緬甸、中國、馬來亞與泰國進兵印度支那，當這一天來到，假使這些土人相信這種勝利之來臨是欲恢復法國的統治，那麼聯合國的軍隊將會自遣二千四百萬土人中得到一種仇恨與懷疑的歡迎。聯合國的軍隊進入印度支那，他們非但應以日本暴虐的解放者之身份出現，且不能以戰爭勝利者的姿態出現，除了使其居民自舊有之束縛下解放出來以外，應別無動機。

我們應告訴印度支那人民，現在就該告訴了，聯合國勝利對於他們之意義究竟如何？我們必須要明白答應這種最後解放的，而使他們不再對戰爭袖手旁觀，不再使他們對於自己覺得沒有希望，不再以為什麼事發生都與他們沒有關係。

第九章 泰國人的泰國

這是一個爲英法所競逐而讓暹羅倖存爲一獨立國的地方，英法兩國對此間於馬來亞與印度支那間之天然緩衝地，均視爲對其在東南亞之帝國勢力具有特殊之價值，因此，暹羅人得倖免於如馬來半島人東埔寨人安南人等一樣的命运。他們之所以能倖存，并不是靠他們的力量與智力，却是因爲歐人間的敵對情形所造成。

英法在此的成就，就是造成一個軍事上與政治上的真空地帶。日本窺得此種情形，早於十年前即準備乘虛而入，如今法國的西貢，英國的星加坡果都在日本人手中了。

暹羅喜誇耀其古代的王朝，而實在呢！却及不上那些遍佈此廣大地域中的二十個弱小的王國，候那，回教國來得古遠，在這些地方中以馬來亞爲最鼎盛，暹羅人對其王朝并不忠心，那些親法法西斯黨徒，大臣的宮庭革命，把那現在歐洲讀書的幼君當作傀儡看待，泰人對之也沒有什麼抗議。

當一九三二年絕對的君主政治被廢除後，於是即有一紙精密的憲法製成，用以保護立憲的君主政治，很有些像英國的情形。但是此紙面的憲法並沒有使之有實行的機會。在理論上，國王及其攝政者都假定執行行政的權利，以及決定政策，與其有連帶關係者，有一國會，其一半議員是由國王指定，另一半則爲民選，但實際上，國會不過變成一種野心政客，軍隊領袖的工具而已，並且在他們自己的圈圍裏，還彼此互相爭執。終於軍隊黨團占了優勢。暹羅人民不是文盲與無智識，便是對於他們首都整谷究在做些什麼事也都漠不關心，而置之不理的。

在宮庭革命之十年中，英、法對在那暹羅人領袖方面之國家主義思想的生長，很少予以留意。他們的興趣均已集中於希特勒掌權與德國擴張的那一幕。在此東南亞這一殖民地中，有政治性的覺悟與國家主義的黨團起來這一事，英法兩國雖也感到驚異，但對泰國廢除特權之事，仍不甚關心。

一九三九年暹羅之法西斯領袖，受日本人之鼓勵，抄襲日本人「亞洲人之亞洲」的標語，改變原有的國名稱爲「泰國」，或「自由之土」，并宣佈採取其「泰國人之泰國」的天賦之排外主義。此乃其執政政黨聰明之舉，它有數百萬無智識且迄今尙未開化的農民爲其後盾，而此標語又適可解釋爲排斥農民所疾視的中國移民之口惠。

泰國并不是很小的國家。其面積大於二十萬方哩，約相等於歐陸的法國，比奧德兩國合併之面積約小一萬四千方哩，人口約有一千四百萬，但并不是全爲暹羅人。

泰國之戶口統計不甚正確，但居留該國之中國人，一般所知，約超過二百五十萬，有說近於四百萬者。在泰國之中國人，大多數爲勞工或苦力，一如其數百萬移民移居其他地方者一樣，也有成爲該國之商人，經紀人，放債人者。一般之士著均懶惰而不節儉，因此勤而善積蓄之中國人終於控制該國商業之大部份，當然泰國人民是非常痛恨這種情形的。

當軍人收客的團體當權之日，他們曾一一對中國人施行掠奪加以迫害，除了德奧對猶太人外，如今再也沒有什麼種族上的團體遭受這麼惡劣的待遇了。限制中國人財產甚厲，沒收的法案也已通過了，事實上和德國虐待猶太人成了真正無獨有偶的一對。曾有一關員公然宣稱：泰國對待中國人應該如希特勒對待以色列子孫一樣。

有許多中國人所控制的商業均收歸國有，或以內閣一紙命令收爲政府獨占，並經國會蓋章簽允，中國先陷於內亂，復以其生命與日本搏鬥，自不能保護此遭受虐待的數百萬僑民。

這裏有一種完全親善日本的情形，東京欣然開始栽培與盤谷的友善，軍事代表，海軍代表，文化代表，商業代表團，不斷來往於兩國首都之間，日人鼓勵泰國之排外主義，並巧妙地開導他們怎樣排斥中國人與白人。日本會替泰國建造輕型軍艦，藉以誘惑盤谷的敗類，這些敗類本是些無知識而喜玩弄政治把戲的人，因此便給日本人以從中國人，美國人，歐洲人手中強奪去的各種讓予與獨占權。日本公使館的職員，如陸海軍武官等均一倍一倍增地增加。

在其他特殊的讓予中，日本得有煉油獨佔權，在整谷郊外築有大規模的煉油廠，有二百多個專家自日本來此經營此廠。那時荷蘭人英國人與美國人都在暗中竊笑，因為他們控制着婆羅洲與蘇門答臘油田，而以各種藉口拒絕借給日人以大量石油原料，這大煉油廠終於停頓下來。

但是現在狡猾的日本人都反過來了。東印度那些屬於白人的巨大的煉油廠，在油田與港口未投降前，早因焦土政策之實行而被破壞殆盡，但是日本仍具有其在整谷之大煉油廠，一俟其得到此優良之油源，即可開始煉油了。

因為有了高辛烷的汽油，泰國政府建立了一支小規模的空軍，而其所購之飛機汽油量，且遠超過其所需，並貯屯此種高貴之燃料，以備不時之需，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本進入泰國時，這些汽油已巧妙地準備好在等待他們了，無疑的，這些汽油都用以注滿那些轟炸星加坡的日機油箱。

日本並曾遣送軍事工程師，助泰國設置空軍基地——日本的轟炸機於是也便利利用該項基地入侵星加坡，檳榔嶼與仰光——日本除訓練暹羅空軍人員外，並以飛機五十架售於整谷政府，其時正值美國政府藉口我們自己的空軍要用，在馬尼刺停止裝運其售於暹羅之十架美製飛機，日本馬上就送他十幾架，這批貨原來是美國售於泰國一百架飛機最後的一批。無疑的，那另外九十架已作為轟炸英國人荷蘭人之用，說不定有幾架還用以侵襲菲律賓哩！

以回想過去的情形來看，這是很明顯的，日本人的政策確是極端的狡猾，他們的戰略家確是很有遠見而聰明，而其時民主國家却盲目而疏忽，且這樣的自信，甚之連對於日本逐步南進的方法也缺少警覺。這種擴展，日本並沒有遇到什麼阻力，而却受到泰國執政黨實際上的幫助。

日本人先占領海南島，繼而占領西沙羣島，於是南下而將這些小島造成一個潛水艇及海軍飛機的基地，他們又得利用印度支那北部之空軍基地，鐵路與公路。他們在泰國也從事重要的佈置，而巧妙地不妨害該國的主權。然後以一個敏捷之襲擊進一步削弱印度支那之法國人。自希特勒軍隊占領法國後，即鼓勵泰國人公然向法國人挑釁，指導其戰略，供給大量的貸款，以助其維持戰爭之費用。

這一幕枝節的戰爭雖也是一個流血的慘劇，但是除了東亞以外，都很少引起人注意，因為到了一九四〇年時，歐洲已發生了更重要的事件，勢將以相當公正的態度要求所謂「矯正古代的錯誤」包括前東埔寨所犧牲的地方與湄公河中割讓的島嶼，均要有一個新的對界。在歷史上看來，泰國人這種要求是正當的，但法國却拒絕它，於是引起了一幕以新式大砲、轟炸機、坦克的戰爭。結果泰國人得到了勝利，其停戰協定終於在日本的巡洋艦上簽訂，其最後的和約亦在東京舉行，這在數百萬的亞洲人看來，不愧是東亞的仲裁者與保護者了。

這次戰爭不僅使日本在泰國的勢力增長，並且還削弱了法國人，那些法國人只使用其有貯蓄的武器，而不能再事補充，因為歐洲的法國人已不能再輸給他們什麼了。日本人這種占領法屬印度支那簡單的計劃，無須流一滴血，竟於一九四一年仲夏完成了使命。

不等到占領這些地方以前，英美與荷蘭各國均採取積極報復的行動，凍結了日本人的資金，並停止對日帝國一切的貿易，日本的貿易於是只能限於對朝鮮，滿洲，中國淪陷區，法屬印度支那與泰國等地了，日本不能從世界任何一處得到其重要的進口物資，也不能以其所產的蠶絲及其他出口物資售於世界上任何一地。更不可能補充其油料的供給。

近衛公爵第三次內閣的垮台，海陸軍亦均改組，最高統帥部即提出對於襲擊珍珠港的詳細計劃，一面外務省則繼續進行欺騙的談判，最後並派來樞密卿去「爲和平而工作」，當在這個時期，日本的航空母艦，潛水艇即秘密航行，集中於夏威夷與菲律賓周圍一帶等候殺人。同時大量的護航艦隊向南進駛襲擊菲律賓，登陸泰國，並攻擊馬來半島上每一個港口，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那爲多數美國人所漠視的地方——已在準備予民主國家以迎頭痛擊，而竟有如此成功之結果，不到九十天的工夫，已把白人趕出東亞與印度尼西亞羣島以外了。

迄至一九三二年宮庭革命以前，泰國之出口有米及麻粟等輸往在東方稱爲「西方的國家」去。歐美等地均有該國的國外債務，國王被一些來自西方的顧問所包圍，但從不接受他們的有力的勸告。

這整個情形於革命後都改變過來，尤其於日本的勢力變為重要以後，政府即替農民建立了應得制度，及零售處，農村合作社與儲蓄銀行，同時開始經營製造業，以及其他工業，并制定新移民律，以防止中國移民流入，且以各種沒收的方法破壞中國人所發展的樹膠業，錫工業。中國人他們開發這種迄今尚未發達之資源是很好的能手，在馬來亞與爪哇，他們還經驗知道怎樣開礦，怎樣植樹。在政府管制下碾米工業成爲一種重要的工業，除了米與麻粟之出口外，其乾椰子肉、椰子油、錫、樹膠、煙草、紙張與棉花等國外貿易亦在增長中。

一九三三年進口的日本貨在數量上極不重要，在一九三四年與一九四〇年間進口的日本棉貨增至三倍，至一九四〇年末一切來自日本的進口貨却超過來自其他各國之進口貨。

在當時，有一個趾高氣揚，好鬥喜巧的人做了首相，將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集於他自己一人手中，以這種關係，他終於加一個海陸空軍部總司令的頭銜，他的名字叫欒披汶，并且一面他還參與日本手中祕密，他偽裝成只是一個日本對亞洲大陸政策的客觀的批評者。

他曾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告訴我：「我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發展，很有興趣注意。」不到一個月，就在十二月五號那天，盤谷與東京發表聯合宣言，承認友好條約會祕密的締結簽訂，而其條約原文却不予公佈，但其宣言中聲稱保證於此後五年中，兩國政府共同磋商其共同利益的問題，并須尊重彼此領土之完整。

當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在太平洋作戰時，即聲稱泰國軍隊抵抗侵犯一小時，并於十二月八日晨七時投降，這種抵抗不過爲了面子而有的一種詭計而已。泰國軍隊侵犯緬甸，泰國飛機協助轟炸仰光，終於泰國也向美英宣戰了。

一年還沒有過去，盤谷的執政者都爲他們的交涉而大傷腦筋，大部份人民對於日本軍隊壓迫的情形均有沉痛的反感。

日本人解釋，在共榮圈下泰國人如菲律賓人一樣不適於完全之自治，據那些自暹東到美國來的官員及其避難的傳說，日軍在馬尼刺聲稱：菲律賓人，在其未能於日本所計劃的新帝國中被允自治以前，必須割棄美國民主政治有毒的觀念，并稱：泰國人是如此無知，如此的不可靠，如此的迷信，不能聽其管理本身的事。但即因其不忠不信，他們才要有一個有能力的教師。

泰國現急待從軍事的管理解放出來，因為這種軍事管理，其殘酷傲慢的程度一如朝鮮四十年來所遭受的情形一樣，返國的教士們聲稱：泰國的愛國志士，教授，學生，作家，演說家可被日本人民警察任意拘捕，一經下獄，即不知下落，即與其家屬友人，辯護律師通消息也不容許。

日本的「監視者」現在直接指揮所有一切社會宗教組織的活動與集會，言語自由僅是一種幻想，泰國的新聞也遭受壓迫，甚至連農工種植什麼都要聽日軍長官的命令，並且日軍得以其自定的價格，首先採購一切糧食。更利害的就是購買一切東西都用那一錢不值的日軍用票，日軍及泰國軍人亦即以該項軍票支給薪俸。

當美國的「飛虎」與英國的飛機仍能自其在緬甸的基地飛達該國之時，盤谷以及其他泰國的城市損壞很重，並帶來了很大的死亡，土著人民也知道在他們沒有自現在所痛恨的日本鬼子手中最後得到解放以前，他們必將遭受比這種更厲害的蹂躪。

泰國的和平使者感到一種嚴重的問題，因該國政府既有意與我們的敵人合作，但其大多數人民却不能也替那些奪取人民權利而與日本合作的執政者的政策負責，而且事實上大多數的人民又是如此地沒有智識，並不知道，也不注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泰國人民對於任何自治的民主政體，既沒有訓練，也未受有教育，在戰後若再要將其幼主扶上王座，那也是本愚蠢了。雖然他們也很有國家主義的精神，痛恨將他們的國家併入那以泰國，印度支那，馬來亞等地合湊而成的國家。而且泰國人也常常被其鄰國人民所唾罵。當「泰國人的泰國」這句口號被盤谷採用時，半島的南鄰馬來亞即忒

意嘲笑，因為在馬來話中「Thai」一字的意義是一種不便刊載的綽號，馬來亞人并惡意的宣稱：泰國人替他們自己取這樣一個名字很為適當。泰國一名似乎又提供了另一個例證，就是具有一塊很大很肥沃的土地！而為一種落伍的人民所居住，他們須要在某種國際勢力與保護下，接受長時期的訓政與保護，直等到他們被教育成爲能給予珍惜給他的自由爲止的一個國家。

未來的泰國是一個如何適當處置東亞少數民族的大試驗場地。該國數百萬中國人的前途究竟怎樣處置，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過去中國人是不准變成一個真正忠實的泰國人，因爲他們被泰國土民所歧視虐待。將來假使他們得到這種機會，能准他們變成一個忠實的國民而不必定如以前那樣效忠於中國，那麼這種少數民族的困難問題也就急待解決了。

東南亞洲的人民有些相似之處，且有共同文化的背景。很可能於一時代中併合成一個真正重要的國家集團，但是假使他們沒有賢明的領導，那麼中國邊疆以南整個的地方在東方的發展可相等於巴爾幹，這種情形也極爲可能。

第十章 荷蘭人怎樣

當人類遺忘了戰爭的逝去，那頹廢的城市已重新建設起來的時候，我們若以悠長的歷史眼光來看，或許可以看出日本在東亞侵略之主要成就，就是促進一種對於西方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功罪是非及其方法的精確考核。

戰後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國內情勢與國際地位，一定會因長期的對日抗戰而大有所獲。那三萬萬八千八百萬印度人的問題也會加速解決。其次以數字而言，七千萬荷屬東印度人民，他們也將因和平的來臨而有新的地位。

荷蘭人是勇敢而剛強的民族，在這次戰爭中他們有輝煌的成績，表現其本身甚適於分工合作之精神。在淪陷之荷屬，以及其殘餘之海陸空軍仍能自由行動之所在地，俱保有良好之士氣。不願潛水艇與飛機之襲擊而遭受驚人之損失，他們那數量不小的商船仍照常執行其光榮之任務。荷蘭人確是非常勇敢。

但是，當準備和平來到的時候，他們的剛強却同樣會使聯合國發生麻煩。因為荷蘭人是決定要維持其在荷屬東印度之主權的。然而假使那大多數的印度尼西亞人相信了大西洋憲章及其所允諾的話，而於此證明其未受到公平待遇時，那麼他們一定會企圖終止荷蘭人之統治，而覺得他們已被人欺騙了。

使這種情形更增加其困難的，就是那些荷屬東印度的土著人民尚沒有資格成爲局部自治，或真正自治，或獨立之國家，即使荷蘭已答應他們選擇這三種方式的生活，也是沒有用的。

他們那國民黨領袖——大多數是爪哇人，而且是在日人南下後匆遽地集合而成的黨人——的不妥協的態度，認爲這種由八百萬人民的國家來統治并開發這七千萬人民的地方是一件極端不公平的事，而況這些統治者自己的母國，又是遠在半個地球以外。他們指出，荷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面積僅有一三四八一方哩，而東印度水陸面積則幾與美國相等，其陸地面積也有七三五〇〇〇方哩，較加利福尼亞州要大過五倍。

爲反對荷蘭人之繼續統治作更進一步強調他們的議論，這般爪哇國民黨表示荷蘭並不強大，不足以保證其東印度帝國之真正安全，他們可以日本奪取該羣島之迅速來證實這種情形。

印度尼西亞人指出，他們的羣島是互赤道南北兩邊伸長，而由東至西長達三千六百哩，由南至北也有一千八百哩，當在海權至上時期，該羣島可爲分開太平洋與印度洋之界線，而在今日空權至上時期，它們又可作爲兩洋間的接脚石。

還有些主張政教分離的論調，以爲這些島上雖有三百萬基督教徒，一百萬佛教徒，其餘大多數人民是回教徒，正因此應由一個基督教國家來統治，這種論調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因爲荷蘭人從未干涉東印度的宗教信仰，而且也沒有理由可以作爲政治上的論點。

荷蘭人民同意於大西洋憲章，亦因其曾早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參加簽字於聯合國宣言，此憲章中有一句對於印度尼西亞人很有意義：「兩國願尊重各民族自由選擇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

荷蘭的領袖毫不顧及這種論調，仍會作簡單明瞭的表示，他們沒有放棄其帝國任何一部份之主權的意思，不論其在遠東，或在加勒比，或在南美洲都如此。威廉敏那王后曾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在華盛頓國會議席中發表演說，論及東印度時，其態度殊爲率直。

「在我有生之日，對於荷屬印度人民之民主與進步之促進，乃我們一貫之政策。」

「在荷蘭這管家婦處理之下，許多百姓與種族，均已系統地併合成一個和諧的社會，在此社會中，一切份子，包括具有不同宗教，語言，藝術，習慣，法律的印度尼西亞人，中國人，阿剌伯人，西方人，他們在家鄉都覺得很平等。」

「至於人民的特殊性質與需要，我們亦經常予以謹慎的考慮。」

「現在面對着的，就我們自己所發覺的看，文化已高度發展，人口亦隨之而增加，我們決不設法去根除他，反

之要促進他們，使更適合生存在這危機四伏的現代世界中。

「東方與西方之人民間在相互尊敬與容忍方面之自願的合作，使政府在基於平等之原則上有成爲一完全的合股公司的趨勢，這種情形已證明有可能，而且有成績。

「增加其自治能力，配合著土人迅速擴展的文化與教育而不使脫節，這些自本世紀開始以來均已切實推行；尤其是自一九三五年憲法修訂以後。

「此種穩健而進步的發展，已因我去年的聲明而得到新的重點與動力，那就是戰後將召集一個會議使我們這王國各地方都可派代表出席，那些海外的領土在王國整個體制中的地位以及那些地方的憲法，都應是這會議的議題。

「日本的侵略暫時阻礙了他們這種有希望的前途，然在荷屬印度仍常常在進行函討這個問題。

「會議的準備目前仍積極在進行，但是依照健全民主的原則，一旦人民重獲自由，若無人民的合作，是不能作最後的決定的。」

演講之後，爲了免人誤會其意義起見，王后特申明如下：

「我們不要原來不屬於我們的東西。

「我們要把我們在大西洋的邊緣，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交界的地方形成一獨立國家，並在加勒比海替美國造成一個友好的鄰國，因那種情形而產生的責任，我們很願担負起來。」

在放廉敏那未訪美之前，她派駐華盛頓的大使亞歷山大·勞頓博士曾於六月二十二日在北卡羅來納斯的阿斯維爾城的市政府會議中演說，茲引其所講的一段話如下：

「我願對於荷屬東印度講一些話。世界上給我們這王國那一部份地方一個形容詞，「使人難以置信的富有」，這實在是一個榮譽的號——假使承認這事實，那就是此種東印度的財富幾乎完全是靠了荷蘭人管家，荷蘭人的經營，荷蘭的資本以及荷蘭的文化而來的。以我看來，這實在是給我們在亞洲的遺產的一個名符其實的銜頭。」

「對的，荷屬東印度實在不是一個殖民地，而是帝國主要的一部份。」

東印度的土著很少對於荷蘭人有什麼怨恨，他們承認他們相處得還好，除了那美國人自西班牙人手中取過來的菲律賓以外，比較其他殖民地的情形，也還算有合理的待遇。

倫敦的荷蘭流亡政府曾宣告，戰後東印度將在帝國中有一絕對平等的地位，與荷蘭本土相等，使不會引起爪哇的騷動。印度尼西亞人埋怨他們目的是在嚴重的經濟侵略，對於白種人以及混血種有一套法律，而對於土人則另有一套法律，他們也承認荷蘭人給予他們的美滿的發展，收獲的進步，衛生以及初步的教育等等。他們知道他們原有土著的官吏，依然是他們國家的領袖，他們認為他們沒有社會能力的很少，那歸於「白人」階級的混血種則無論社交上職務上也都如此。

但是——他們乃固執地回到他們這種所說大略的情形——他們不想要他們是屬於海外任何一種民族，他們要想知道他們是屬於他們自己，而有權力為他們自己「共同的命運」而工作。

他們要達到「共同的命運」是很難的事，第一困難的就是在這些島民中共有二百多種方言。遍地草莽的婆羅洲，其半裸的野人，較之巴塔維亞之爪哇人，其分別不啻日夜之異。巴厘人也是同樣情形。萬之荷蘭雖有此富裕羣島之大多數島嶼，婆羅洲，過去及現在，仍分成三部份——荷屬婆羅洲，英屬北婆羅洲以及薩刺瓦克，其地方政府為一白人統治者，即勃魯克三世。的摩爾島則不完全是荷蘭人，其一半是葡萄牙人。新畿內亞也有一半為荷蘭的領土，其另一半屬於澳大利亞，或在澳大利亞委任統治之下。

荷蘭人曾試將其他各島也予以爪哇化，已具相當的成功。然而西里伯及新畿內亞的土人與爪哇人根本就不同，一如意大利人丹麥人根本不同一樣。當這些島上的國民黨要求為其自己「共同的命運」而工作的權利時，他們却忘了相信荷蘭人，現在各島間所有和諧團結的情形，正是荷蘭人所創造的。

該羣島七千萬人大半是文盲，且完全缺乏政治的訓練，其所具之教育及現代化的程度遠不足使印度尼西亞人超

任並完成這種當前巨大的任務。

顯然沒有理由可踢開荷蘭人，也沒有理由告訴印度尼西亞人戰後大西洋憲章所允諾的並不適用於他們。假若要在東印度建立一個國家，那麼在傳統上與經濟上荷蘭人是最適於担任此項任務的，但是他們會同意這樣做嗎？或者，他們就是担任了此項任務，相信他們確能把這種工作做得很好，很公正，但是當此七千萬人民被教育，訓練完竣後，他們是否仍希望成爲荷蘭帝國完整而平等的一部份呢？

大西洋憲章的一部分，允許一切國家，無論爲戰勝或被征服者，同樣有一對世界上原料及貿易享受平等之待遇，這樣會阻止殖民地經濟的佔有。過去物質的引誘，以及財富之享有，實爲殖民地擴充主要的推動力，但是，如果大西洋憲章是真正的實行了，那麼殖民地之佔有再也不能保證獨占的利潤了。

荷蘭人在印度已有三百年之久。他們到這裏來，先是爲了貿易——特別是販賣香料，隨其商業之發展，政治的入侵也自然地跟着來了。其人民溫和可愛，大多數爲小規模之農民，或居在鄉村中，他們的利益決不會擴充至離家數哩以外之地，也沒有什麼需要，有之當地也够供給了。

自一八八〇年至前十年大不景氣時期間，荷蘭在東印度實行真正的門戶開放政策，別國人民與荷蘭人處於同樣法規下投資或經營商業，結果造成國外資本之大量輸入，尤以英美兩國的公同爲最，它們自油田，錫礦，種植樹膠等取得很大的利潤。國家收入飛騰，因爲公共衛生的優良，使土著人民的生育率的增加也有驚人的速度，而其死亡率則爲之減低。爪哇的人口，在三十年中增加了一倍，單爪哇一島，即有四千萬居民。

大的財產已建立了，尤其是用以生產橡膠，坤寧與枕絨毛等財產，這種財產所生產的東西並不爲土人所有，而該項財產的存在都使他們有工可做，同時并減少其對糧食的生產而提高其生活費用。直至不景氣時期後，對於工業的發展，因沒有什麼鼓勵。外國人投資的利潤也都移流國外，以付給那些在英美的股東們，其人民，尤其是居在都市中的人，以及外國大公司所僱用的人，對於舶來品的需要與愛好更形增加，於是進口，關稅與工業都變爲

其母國的利藪，而其本地財富的外溢却一年比一年增加了。

這種情形並不是作爲荷蘭人在此島中所做的罪狀而列舉於此，他們這種情形天然是一種殖民地制度下應有的情形，是所謂西方帝國主義下的產物。殖民地當然變成了供給原料，供給廉價勞工之地和統治國生產品的市場。

和平到來之時，中國人以及所有東西殖民地的人民均將要求別國停止這種經濟侵略與政治的侵略，他們需要工業化，製造他們所用的東西，製造比其在英美所造者更便宜的東西，他們將開始利用他們自己的人力，並將試建工業以便能加工於他們自己所產的原料，他們將把經濟奴隸時期予以結束，在那時期中，他們僅爲原料的生產者，以供別處製造。

甚至在日本尚未開始南進東印度之前，大西洋憲章的宣佈已曾使這些僻遠之地方發生巨大的騷動，羅邱宣言的保證是否能保持其字義而終不致損及西方國家，並減低白人國家的生活水準，尙是一個問題，而且也沒有一個相近的解決辦法，但是這種諾言必須要保持，即使因保持它而使我們物質享受的理想下降，而使亞洲人與印度尼西亞人的享受增加，也在所不惜。在橫濱與蘇彝士之間約有十萬萬亞洲人，他們要廢止海外列強的束縛，他們要求平等，他們要求四大自由，他們也需要自其本身之勞力與生產而得到的利益。

假使他們被拒絕，假使他們覺得他們已被欺騙，已被遺棄，假使黃種人與棕種人聯合對抗白人，則世界文明將遭遇一個新的危機，設與此次戰爭的危機相較，則此項戰爭還要算是安全些哩！

在東印度，履行這種大西洋憲章的諾言的任務必須託付聰明的荷蘭人民去做，即使他們的立場，他們的政府當局一定要有重大的變化，他們的利益也要嚴重的降低，但是，這艘和印度尼西亞人，使入於一個訓政時期而廢止有關他們最後命運的自由的決定的工作，仍是荷蘭人的任務。除了有使這七千萬人民領袖蓄怒，失望與發生叛亂思想的危機外，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第十一章 馬來亞的巨擘

酋長和蘇丹們都離開了。九個名稱鏗鏘得好像馬來廟宇裏的編磬的——例如雪蘭莪，吉珍丹——王國和土邦被日本佔領了。

英國的金融大王，工礦鉅子以及在外交上戰略上落伍的那些蠢才也都已去了。日本除了據有土邦之外，現在還佔領了夜郎自大的檳榔嶼，麻六甲以至於「堅不可拔的」新加坡。酋長和蘇丹至少算救住了他們的珠寶，有的還保住他們的妻女。但是真正統治馬來亞的英國人却無法挽回他們的驕傲，或者甚至於他們的自尊，雖然據說他們大半還救住了他們的襯衫——我的意思是那已成廢料的襯衫。

承認判斷的錯誤與讚頌一個偉大民族勇敢和堅忍的欠正確，無疑是有益的事。我現在就這樣做。判斷的錯誤是在法國崩潰和敦刻爾克撤退以後，我絕望地相信，大不列顛受不住持久的空中閃擊，勝負已經決定，大英帝國的光輝已經臨到末日。這種結論使我不勝憂傷，因為我一向將大英帝國列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一種文明力量。

這種判斷的錯誤是由於我從未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在不列顛居住或工作過，我們知道的英格蘭和蘇格蘭，不過是一個旅客所能知道的。我的判斷是以在遠東居住，工作，玩弄外交號稱「不列顛殖民家」的那種人物為根據。將住在大自治領——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內的不列顛人的勇敢，能幹，活潑的小孩與今日奉派到這世界邊遠處來處理帝國事務的不列顛人作一比較，真够使人沮喪。

香港够壞了，而新加坡更壞，眼見那般在中國和日本已經證明對他們的行業愚笨拙劣的高級英國外交官們投任像北非和土耳其那樣在戰時緊要的區域的機要職位，也真令人氣餒。我常想：「假若這些人就是英國必得派遣出去代表帝國利益的最佳人物，那末上蒼也不能幫助大英帝國。」

可是我錯了。張伯倫和他的大多數羣衆銷聲匿跡，不列顛忍受了可怕的一九四〇年的夏季和秋季，證明不列顛羣島的堅韌和勇敢依然存在，這個民族並沒有因一世紀半以上的移出他們最剛強勇敢的子孫或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殺戮而衰微和柔弱。

但以新加坡和馬來亞而論，却略有變動。奉派到那裏計劃應付日本的加增的威脅的幾位新人物，對於當地掌握統治權已久的貪慾，昏聩而自滿的黨派的勢力莫可如何。結果日本以遠較預算爲少的生命和時間的代價征服了全部馬來半島，新加坡最後也在六萬五千戰士仍然拿着武器的時候投降了。

放這些看，爲了世界民主的緣故，英國殖民者是在新加坡和其他遠處未始不是一件幸事。大英帝國失掉許多散佈各地的堡壘，雖可惋惜，但假如新加坡型人物留在本土，掌握帝國事務，很可能在日本進攻珍珠港以前，希特勒早就獲得歐戰的勝利了。

這批「自願」出國的不列顛人和大多數派到帝國遙遠部份充當官吏或英國資本控制的大公司的代表的人士，多年以來就有著顯著的區別。上層人物似乎早已腐化了。奉派的人士總較「自願」的人士差勁些。總之，可以說被任命者所出生的那一階層，無論就勇氣和智識而言，都要算較差的一階層。

英國在敦刻爾克以後很偉大地立即振作起來，按說不應該失掉馬來半島，但在新加坡與馬來亞的負責人士真該被踢出去。有些地方，最顯著的是檳榔嶼，他們不等驅逐，就溜走了。戰事結束以後，要是情況仍像日本那樣難堪的踢出他們以前的樣子，他們是永遠不能回去了的。這般特殊型態的人物，沾染了強烈的東方人講「面子」的癖性，恐怕也根本不想回去了。

這種批評並不是對從日本開始猛攻時就從事戰鬥——退却戰——的將士而發的。著名的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軍團，印度人民自願軍全軍和澳大利亞步兵的戰士戰鬥得極其英勇，然而「高級人士」行動遠不如此。在檳榔嶼，他們讓港口充滿未經破壞的船舶，供日本人在兩岸使用，他們讓錫鑛鑛廠完整無缺，數千根煉過的錫條放在

碼頭上。成千上萬的民政官吏與商人暗地裏從檳榔嶼逃走了，只給他們的僱工或僕役一天「假期」和幾塊額外薪金，供他們在主人秘密離去的時期內花銷。

在新加坡，第一次空襲之夜，直到最後一枚日本炸彈投下後一刻鐘，他們才熄滅全城燈火，雖然他們早已知道珍珠港，香港和馬尼刺會遭襲擊。

不想回去與馬來亞土人相見的，是那般不願對他們出大橡膠和錫礦的利潤繳納超過百分之八限度以上捐稅——認爲所得稅沒有必要，却以無節度的狂喫狂飲，剝削羣衆迎接戰爭，而不願賜允邀請澳洲軍士到他們家庭，不願允許澳洲官長到他們的社會的人士。

還有些人，假若能從戰場生還，也將不願回到新加坡。那就是花了幾千萬鎊將新加坡築成「堅不可破」的海軍基地，而將所有大砲砲口朝海的那般專家。他們對於防衛由北方大陸對新加坡基地的進攻，毫未作實際準備。他們對於挪威，希臘和克里地的慘痛教訓視若罔覩，差不多完全沒有作高射砲防衛的佈置。

此外，還該加上軍中工程師。他們說他們已將連接新加坡島與大陸的長堤埋好了炸藥，一旦敵軍佔領北岸即行「全部破壞」。這個「全部破壞」毫無結果，以致日本人二十四小時之內就修好了堤道，卡車、砲車、步兵源源渡過。

還有一種不願回去的人是軍中婆羅門僧侶，他們堅持進攻部隊絕不能夠穿越大陸叢林，坦克絕不能夠度過熱帶薄沼，只用炸毀公路，鐵路和橋樑，以及斫倒樹木阻塞大路的簡單策略，新加坡就能免除北方的攻擊。

英國在馬來亞的領土包括五萬二千方哩的區域，較亞拉巴麻州略大，而較加利福尼亞州圓幅的三分之一爲小。一八一九年，斯丹福·拉弗爾，後來的拉弗爾爵士，爲大不列顛在新加坡獲得最先的立脚點，他帶了半打船隻到來，並由柔佛蘇丹租得本島的一部份。五年以後，僅二一七方哩大的全島完全被東印度公司買去，也定在一八二四年，英國與荷蘭解決了他們在世界這一部份的競爭，荷蘭放棄在麻六甲由葡萄牙人處得來的一切權利，並且承認

馬來半島爲「英國勢力範圍」，英國則承認荷蘭對東印度有統治之權，就是我們今日所知道的情況。

有半世紀，除了所謂海峽殖民地（包括新加坡），由吉打酋長買來的檳榔嶼，連接大陸的威士利省和麻六甲以外，英國未曾致力擴充她在馬來半島上的地位。

然而，一八七四年，激於馬來半島盜的不断劫掠，英國商人在內地的不時遭遇的困難，以及暹羅土邦統治者間的政治風潮，英國開始了長時期的政治擴張，大半是佔領暹羅的領土，一直繼續到一九〇九年。

一八九四年，雪蘭嶼，檳榔嶼，森美蘭與霹靂四土邦的馬來統治者，在馬來聯邦的名稱下，組織了一個聯合英荷保護國，另外有五個不屬馬來聯邦的土邦，柔佛，吉玲丹，吉打，丁加奴，玻璃市，聯邦中英荷派駐「官」，屬邦中則僅設顧問。事實上九個土王都受條約的約束，聽從海峽殖民地總督的忠告。總督也是高級委員和英王代表。這種鬆弛的統治方式是由能幹勤勞的馬來民政局執行，其中職員三分之二是英國人，三分之一是馬來人。

這種古怪的領域集團與統治方式，及其合計五百萬多一點的人口，在被日本佔領之前，被認爲世界上同樣面積中最富庶的區域。

海峽殖民地充滿了進出口的船舶和鑄錫廠。聯邦已有高度現代化發展的鐵路和公路，礦產，農業，排水溝和橡膠文化。柔佛因爲最接近新加坡的原故，分享了上述進步，但其他四個聯邦保持比較原始，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都比較的不重要。

荷蘭，英國和美國的金錢流入馬來半島，支持佔全世界產量一半以上的錫和橡膠的生產。但是馬來土人不喜歡礦穴，田野，或橡樹林的有規律的工作，於是具有相當大量數目的勞工輸入，以適應外國資本的輸入。外來的勞工主要地來自中國和印度，而因爲馬來亞富庶日增，土人不願生產本人所需以外的糧食，結果馬來亞主要米糧整整三分之二是從泰國輸入的。

雖然英國人老早就採用了「馬來亞人的馬來亞」的口號，外國勞工的輸入，在一九三九年，造成一半以上的人

口是中國人，印度人和東印度人，僅有百分之四十七左右是馬來人。馬來成爲了無窮富庶的原料——主要的是錫和橡樹——的貯藏地，其豐富爲全世界之冠，個人財富也以此爲最高。然而事實上一般土人窮困異常，財富集中於英國人，歐美主有的公司，土邦統治者。有一個大數目集中於中國和印度商人，中級人士和借貸者，這個數目並在日漸增加中。

雖然絕大多數的馬來亞土人事實上依然是赤腳短裙，困居茅屋的農夫，在馬來亞却幾乎沒有政治的不滿足。王公們很富有，而且財富日增，自居於英國統治集團份子的身份，認爲他們很安全。「保護國」意思是保護，他們認爲他們可以得到。英國的統治並不苛刻，不許軍端們課徵人民過重的賦稅，不許干涉地方關卡和宗教。

馬來各邦沒有統一或民族主義的要求。英國的統治產生了秩序和穩定，現代的運輸，普遍的教育，效率很高的公共衛生設備，共同而穩固的幣制；平息了海賊和盜匪。

因爲土人大半是全然滿足的，馬來亞很少第五縱隊活動。中國人是心懷不滿的階層，但是他們的不滿主要是由於社會上的不平等，並且，因爲他們是效忠於重慶的，他們不會幫助日本人。甚至於生長於新加坡從未到過本國的中國人，也寧願自認是中國公民，而不願做英國人民，他們會屢次要求參加軍事服役，皆遭英國當局拒絕，這事使他們的驕傲大受戕害。直到新加坡局勢無可救藥時，英國人才武裝了很久以來急於協力防禦他們雖然不會視爲本土而居息於斯的土地的中國人民。

馬來亞錫礦的爭奪已有好幾個世紀，可以追溯到一六四一年荷蘭在麻六甲戰爭之前。一二五〇年左右，新加坡島上出現過一所大城，一三六五年爲日本入侵者所毀。一八一九年，斯丹福·拉弗爾與他的部下，在港口附近山崗上披斬荆棘之時，發現了這城的廢址。

在一九三九年，戰爭開始的前一年，新加坡是世界最大海港之一，每年進出口的船舶在六千艘以上，總計一千六百萬噸。戰略上，尤其是在飛機成爲戰爭武器以前，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它控制着太平洋印度洋最直接的

消路 and 澳大利亞新西蘭蘇彝士間最短的航程。

戰後，馬來亞與東南亞大部必將遭遇嚴重的經濟恐慌。錫礦已受焦土政策破壞。新加坡和檳榔嶼并不能壟斷錫礦石的熔煉，僅只得薩州利用玻利維亞礦石的新工廠，就能解決大部份美國的需要，美國的人造橡膠的生產與巴西及本半球其他地方的橡膠的發展，將嚴重地減低馬來亞因橡樹地帶而得到的收入。

馬來亞既然沒有自治或獨立的要求，大不列顛在認為適當時必將恢復其穩定與政府，而因自由的怒潮從印度和菲律賓傳播過來，舊日的土人統治者是不可能恢復他們虛假的統治地位的了。並且，英國人既然可恥地被亞洲軍隊打敗及趕走過，他們對半島亞洲人民的統治，是永遠不會真正穩固的了。

東南亞人民認為美國是武力，未來安全與社會及經濟正義之源，似乎較視英國尤為過之。這個概念對於英國人或許是不愉快的，而對普通美國人或許是不歡迎而且驚訝的。

當前戰略的動向是，英國的人力，船舶，飛機，將與蘇聯的分担擊敗德國的工作重要任務，即使美國將直接大量參加歐戰，同時，美國和中國的人力，美國的船舶飛機將在對日戰役中居領導地位。假使在戰爭終了時證實這種情形是真的，英國在東亞的地位將更低落，而美國的地位將大為增強，不管他們或者我們是否喜歡這種結果。

第十二章 反英的緬甸

大多數美國人始終認爲緬甸是印度的一部分，恐怕大半是受了吉布林早期描寫這個昔日王國的詩歌的影響。其實吉布林對緬甸與其地理的知識是大可懷疑的，例如在他的「曼德勒」中，他就大發怪論——「曙光出現，如同「中國以外穿過海峽」的轟雷。

事實上，緬甸問題與印度問題是迥然不同的。兩國間惟一相同之點是反英的偏向。在緬甸方面，這種傾向因爲深厚的反印憎恨尤爲複雜。造成反英情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國的由來已久的將緬甸併屬於印度的根本錯誤的政策。直到一九三七年才正式宣佈分治。

一直到前幾年，緬甸是世界最難到達的地區之一，除了從海道以外。到泰國的公路與鐵路是沒有的，只有驛馬小道，翻山越嶺，進入印度。後來中國建築了緬甸公路，於是由仰光經過曼德勒直達中國邊界的鐵路成爲了商業的大動脈——將供應中國的汽油與戰爭供應品運進內地，錫、鎢、桐油與其他中國產品由仰光港口輸送出海。

緬甸面積二六一六〇方哩，就是比得克薩斯州小不到一千方哩，人口一千九百萬，其中三分之二是已經開化而多半未受教育的住在低地、河谷與三角洲地帶的人民。其餘五百萬人是禪部與青山——一種西藏緬甸血緣的混血兒——的侗族。他們有許多種類的法律，而他們對中央政府的知識却是有限的。

一百多年以前，緬甸是爲強盛王朝統治着的好戰國家，當日的緬甸很想成爲一個「侵略國家」，但第一次的征伐與開疆的貪慾就惹起了與英國的三次戰爭，從一八二四年一直拖到一八八六年。這些戰爭起源於緬甸的準備入侵印度東北部，而最後的結果是君主政體的被取消，緬甸被併入印度成爲附屬的一省。

這個融合兩種不同民族的打算是極大的錯誤。印度人民大半是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緬甸人是蒙古而不是印度血

緣，並且大多是異常虔敬的佛教徒。在英國統治之下，印度人大量移居緬甸，他們成爲昌盛的商人、銀行家與放債者，在這個世紀之初，緬甸抵押給印度人的農莊和米田佔很大一個數目，以致於形成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一九三一年以後，爲了取消贖回這種抵押品權利，引起過嚴重的反印暴動。

緬甸於一九三七年與印度分離，自治政府之建立很爲緬甸人民所歡迎，他們很久就期望在帝國內得到獨立或自治領的地位。

名義上緬甸仍然是皇家殖民地，和海峽殖民地與香港一樣，但是事實上緬甸人獲得很大程度的行政責任。皇軍所派的英國總督一般是具有極大的保留權的，包括所有關於軍事、外交、幣制等事務的管轄權，並且規定，在緊急時期他可以專斷獨行。雖然，緬甸人選舉他們自己的議會，一個上議院，一個下議院與一個對首相負責的內閣。總督對這些機構保有監察權。所有成年的英國臣民都有受一定而不合理財產限制的選舉權。因之印度人也可以投票，——這種辦法在緬甸人民方面產生了極大的惡感，其情形正如總督不時干涉本地人希望用他們的方法，爲他們自己的利益處理的事件。

緬甸分爲七區，每區由總督任命一行政長官治理，區再分爲許多縣，每縣有一副行政長官，具有最後上訴權。每鄉選舉其鄉長，他的任務是宣釋政府法令以及收集鄉村賦稅。

紙面上這計劃看上去好像穩固而寬大，實施起來却一場糊塗。緬甸人以爲他們具有較寬的管理他們自己事務的自由，而責難他們所稱爲的「不列顛干涉」。英國人則認爲本地人缺乏管理政府的教育與計劃，監察權不能再放鬆了。這種情形引起了爭端、壓制的規定與惱怒的譴責。在日本入侵時，這種不愉快的情況產生了廣泛的英國國防與供應法規的破壞，和大有助於敵人的第五縱隊的活動。

工業化在緬甸還沒有很大的進展。有處置緬甸油出日漸增加的產品煉油廠，有碾米廠，有爲處理伊洛瓦底江上源各大河流上的叢林高山上的麻栗樹的巨量出口的鋸木廠。

除了緬甸的重大戰略價值，其佔領切斷了中國由陸路輸入主要戰事供給品的道路，產生了對極度反英的印度的孟加拉省的威脅，在糧食供應上，緬甸對日軍也有極大的價值。在被侵以前，緬甸平均每年輸送二百萬噸的米到印度，另外三十七萬五千噸到錫蘭。這些米糧的供應，不但對日本非常重要，它的失去使英國對印度和錫蘭的給養問題趨於極端困難。

除米之外，日本現在由緬甸得到了錫，鏷，鉛，棉花，油與木材。鋅和銅也有貯藏。全國每年產金一千三百萬英兩，銀五百五十多萬英兩。

一九三九年緬甸礦田出產了五萬九千英噸的鋅，這數目大約足夠日本全部的需用，就業經公佈的上年統計來說，日本只輸出四萬八千噸的鋅。爲了一些不知道的理由，臘戌附近的鮑德溫大礦廠、鑄煉器、煉油廠，在英國人撤退時，都沒有被燬掉。一九三九年臘戌境內南圖鑄煉廠生產了七萬七千多公噸的鉛。一九三九年全年日本鉛的消耗量總計十二萬噸，所以，她就進入全面戰爭的消耗量而論，緬甸的產量滿足她的需要一半而有餘，緬甸錫的產量在一九三九年達到六千五百公噸，現在也歸於敵人了。

緬甸的鋅、鉛與錫的礦田沒有破壞，它的油井的情形正相反，實行了「焦土」政策。但是預期一九四三年初日本就可以使油田完全進入生產。這些油田一九四〇年生產了三萬三千五百萬加侖品質優良的汽油。

控制緬甸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控制不僅切斷中國除空中外一切與盟邦的聯繫，而且保障日本在馬來亞、泰國和印度支那的地位。此外，還使孟加拉灣對於聯合國毫無價值，因爲緬甸不但供給日本離印度不及五百哩的飛機場，而且她之佔有安德曼羣島使所有道經加爾各答的船隻處在她的轟炸機的威力之下。結果對印度和中國的戰爭物資的供應不得不大部份取道老遠的印度西海岸的孟買港。

以戰爭物資的供應與製造而論，印度最重要的工業區是孟加拉、奧里薩、及貝哈爾鐵礦區域，現在也在日本佔有的緬甸基地的轟炸航程之內。當日本轟炸仰光與其他緬甸中心時，百分之九十的緬甸土人逃走了。假若印度遭受

轟炸後產生同樣結果，就算炸彈沒有命中摧燬生產着不斷增加的戰爭物資的工廠，印度東部工業區對聯合國也將成爲無用。

緬甸與印度之間的山嶺障礙是被認爲不能通過的，唯一一次從印度派遣往授業寡殊懸的緬甸守軍的英國援軍只是飛機運去的一營軍隊，但是後來經過辯論的結果，數萬緬甸人，印度人和英國人，有計劃的由一百到二百哩的叢林密佈的山嶺小道安全地過到了印度，有些被圍困的軍隊也從這條路逃了出來。這種大量難行的旅行很使在印度的美國參謀人員喫驚，並證明這條山路可以爲入侵印度的日本軍隊所利用。日本利用大陸叢林道經完成「不可能的」馬來亞佔領，表明印度對緬甸一面不是像一度想像的那樣「全」。

緬甸的物質和政治的復興將是一件巨大的事業。日本入侵所作的破壞將需要鉅量的金錢和工作，而且這種破壞可能在驅逐征服者所必需的戰役中加倍嚴重。緬甸一如高麗和其他東亞大陸明晰民族主義的國家，將接受一個時期的政治保護和教育，以及嚴密計劃的經濟復興。緬甸人一定不情願這事完全在英國人的領導下進行，這又是一件似乎只能爲一個國際權威或代表所完成的事業，中國對緬甸前途必將特別注意，爲了她需要假道緬甸到達印度洋，她一定要派遣她應該獲得數目的代表參加任何在當地從事澄清混亂，樹立秩序的工作的委員會或機構。美國是大西洋憲章最有力的保證者，被期望肩負大部份的工作和責任——以及財政的担負。

緬甸是遠東另一個看我們在戰後至少是個可以信任的公斷人和裁判者的區域。又是幾百萬深色皮膚，深色眼睛的人民用希望的和沈思的凝視期待着我们！假若我們令他們失望，我們真對不起他們。已經不是我們是否果斷接受放在前面的辛勞工作的問題了。問題是我們是否厚顏和窄狹自私，拒絕和謀劃規避我們在亞洲的命運。

第十三章 印度

雖然談論甘地的理想主義與神祕主義的無數文章使整個印度問題在美國成爲模糊不明的狀態，他在戰爭期間的言行所表現的十分透澈的事實是，他是一個頭腦頑固的現實主義者與異常敏感的政客。去掉他的「氣氛」，像他的纏腰布，他的儉約，他的羊乳與他的紡機，甘地顯然是一個政治領袖，他相信軸心必將獲得勝利，他玩弄過政治把戲，所以假若軸心勝利，他可以邀乞他們的恩澤，甚至於印度的獨立，以爲他曾致力攪擾和阻礙聯合國戰爭努力的報酬。

他的把戲是不會失敗的，因爲英國已經答應，只要戰爭結束時印度大眾能够制定他們自己的憲法，就給予印度實際的自由。假若軸心勝利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五十，或者甚至還低，甘地還是覺得他抓住一個任何機敏的賭徒都會贊可的機會。全印大會現正要求實踐聯合國若獲勝利給予印度自由的諾言，假若聯合國失敗了，甘地和他的信徒可以對軸心說：「我們沒有幫助英國人，美國人和中國人——我們阻撓過他們。給我們報酬。」

略一研究日本軍事進展的時間表，就可知道上面對甘地的政策和地位的概述的正確。正當敦刻爾克以後，英國遭受空中閃擊的夏季期間，甘地鄭重宣佈：「我們不從英國的毀滅裏尋求我們的獨立。那不是非暴力的方法。」尼赫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也宣稱：「乘英國從事生死鬥爭的時候在國內發動不服從運動是有損印度光榮的舉動。」遲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前不到一個月，甘地還公開表明過：戰爭期間的羣衆運動是「不可思議」的，那只是利用英國的窘困，結果不過引起暴亂與內戰而已。

之後，日本勝利的南進到臨，殖民地不列顛證明出來甚至連自衛的力量都沒有。香港、馬來亞、新加坡、仰光與緬甸很快的連續爲日本人所攻陷。馬來亞和緬甸得到了慘痛的教訓，政治上的弱點可以使軍隊和軍備成爲無用。

僅仗軍火不能得到勝利；在土人不但協助作戰，反而甚至組織敵意的遊擊隊的國家裏，勝利的防禦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卑維布魯克勳爵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在加拿大發表的廣播講演中說：「新加坡不是失於優良的設備。相反的，軍火的優勢是在我們這邊的。」

日本南進的勝利，卑維布魯克所承認的及衆所周知的馬來亞與緬甸崩潰的事實，使甘地有了藉口。

x

x

x

實際上印度不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不在本書討論的主題的地理範圍之內。但是由於印度與兩個受日本攻擊的國家緬甸和中國接壤，以及由於聯合國語言的誠意可以用英國在印度的舉動和美國明白或沈默地贊成此等舉動來作判斷，印度是不能與東亞問題分開的。就地理與日本創作的「亞洲人的亞洲」的宣傳戰而論，印度歸入太平洋戰區比歸於歐洲蘇聯戰區的確自然得多了。日本對民主政治的打擊意即帝國主義在印度終結，和在中國或在香港的情形沒有兩樣，而且，印度必須分享亞洲其他部份因這次戰爭結果所產生的增益與孑弱。

印度的前途很爲聯合國所關懷。全球戰爭已使美國軍隊在埃及西部與印度軍隊並肩作戰，美國部隊和空軍駐紮在印度，準備打擊日本侵入的任何企圖。以印度爲基地的美國空軍，不但輸送戰事供應品到中國，而且利用印度基地襲擊緬甸境內的日本人，與轟炸孟加拉灣內的日本運輸艦和海軍軍艦。

華盛頓對於向倫敦公開提出如何處理印度問題的建議，曾經謹慎從事。真的，問題本身每星期都在變動，並且將以驚人速度繼續改變。這原本是英國的問題——與印度的問題。但是假若印度公開加入聯合國，則聯合國將對印度最後的獨立共同負責。我們既光明堂皇地允許一切民族獲得四大自由，就已被認爲保證她的「最後」獨立了。然而，在我們協力戰勝之前，我們不能干預英印的爭端，除非雙方事先暗地讓我們知道歡迎我們調停。

近二十年，全印國民大會黨的歷史表現了很多矛盾。黨中檔卷裝正式記載着對日本侵略滿洲，意大利侵略阿比

西尼亞及法西斯黨徒在西班牙境內的侵犯行爲的抗議。對中國的同情表現於向人民徵募大批現款，大量輸出藥品與外科器械，爲了日本侵略中國而抵制日貨，在張伯倫政府在美國懸譽狼藉很久以前就反對歐洲的綏靖政策。

國民大會黨的實力也經歷過戲劇性的變遷。經過一度迅速增加以後，隨着一九三四年人民不服從運動的失敗，黨員數目降到五十萬人。之後，又興旺起來，一九三七年黨員數計三百萬人，一九三九年達到五百萬人以上。

在很多地方，國民大會黨輕易地被解散了，由於誤信它僅代表印度教徒，因而不能代表全體印度人民。然而事實上，此黨活潑有力，獲有廣泛的擁護。黨中份子不僅包括印度教徒，也包括有欽克教徒，回教徒，無錫份子，婆羅門教徒，地主和農民，不識字者和學者，商人和同盟工人；土王以及英印的人民。

這種信仰的歧異使印度問題複雜萬端。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全印回教聯盟的主席，於一九四二年夏末甘地與尼赫魯被捕以後，公開宣佈假若英國答應了國民大會黨的要求，「回教印度認爲完全是出賣回教利益，違背回教印度的信條。印度境內的對英惡戰將使近東全部燃燒起來。」

假若英國的政策引起了國民大會黨擁戴者的背叛，印度將任日本長驅直入。假若英國的政策平伏了國民大會黨黨徒，則回教徒可能採取行動，而使埃及，土耳其及其他很多異常緊要的區域輕易地墮入歐洲的軸心國的魔掌。

實際上，國民大會不能代表全部印度教徒，真納和回教聯盟更不能代表全部九千萬回教徒，一九三七年，在十一省舉行立法院議員選舉時，爲回教保留了四百八十席，而他們只得到了一百十四席，合計七百三十萬回民票數中，只有三十二萬一千票是推選回教聯盟保選人的，佔總數百分之四·六。在回教人口佔大多數的信德與西北邊省，一個聯盟代表都沒有當選。聯盟公開的提倡巴基斯坦，即印回分治，但是佔全部回民五分之一的希噠（Sind）派反對巴基斯坦，擁護國民大會黨；人數更多的叫做噠米噠圖烏勒馬（Jamiat-ul-Ulema）的回教教派也是一樣。英國對五百六十三個土邦與其王公也有明確的條約義務，印度境內這種半自主的區域的人口合計在八千萬人以上，他們對於像自主，獨立或效忠某一印度政治黨派這種事情，從未有過統一的政策或要求。

不論不同的美國人對於印度連續不斷的政治危機抱着偏見或是同情，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世界上對殖民地治理最為成功的事實是不得不承認的，我們自己在菲律賓的成績異常優越，但在開始時我們只有七百萬多一點人口，日本人趕走我們時，也不過一千六百萬人。以面積論，差別也是很大的。印度一八一九〇〇方哩，菲律賓僅一一四四〇〇方哩。

印度人口每年增加約五百萬人。據英國統計，一九三一年與一九四一年之間，人口增加了約五千萬人。舉辦最後一次戶口調查時是三八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整整百分之九十是鄉人與農人，而且雖然對灌溉與溝渠計劃會極度努力，英國人仍只能將可耕的地區由一九三一年的二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畝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畝，一九三七以後，歐洲戰事截斷了此事之發展。

所謂印度的「殘酷壓迫」，是由六萬五千英國人民及一支在戰前從未超過五萬人的英國軍隊所執行的。中央、各省及地方政府僱用着一百五十多萬人，在一九四一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前，印度軍隊有一百多萬人，這般人都是自願的。所以民政政府的僱員與武裝的印度人合計起來有二百五十多萬人，而各階層的英國人共計只有十一萬五千人。只看這些數字，就可以證明那般喧嚷的煽動家對英國的非難的愚蠢了，他們爲了莫明其妙的理由，每變對英國人在全世界所作爲的一切事情散發歪曲的批評與誤解。

斯丹福·克利浦斯爵士一九四二年春天攜帶妥協的建議來到印度，七月裏，他指責甘地「不準備等待已得允諾的戰後自由，此事必將危及印度自由與聯合國的整個目標。」斯丹福爵士聲稱：「英國，美國，中國與印度兵士都參加了這次戰爭，爲世界自由而勇敢戰鬥，他們不能爲印度或任何其他國家內進行陰謀的政黨所犧牲。」

在對美國的廣播中，克利浦斯讀實甘地「在這個最困厄的時辰運用極度的壓力以獲得其黨的政權。他可能因其人民不服從運動而得到些微的擁護，但是，爲了印度的緣故，也是爲了聯合國的目標，我們的責任是堅決保持印度爲我們對日戰鬥的安全與平靜的根據地。……我們不能讓一個夢想家阻撓聯合國在東方的勝利前進，不管他過去

在自由黨門中如何著名。

倫敦既未命令，提議，也未發動拘捕甘地和其他國民大會黨領袖。發佈命令的是印度中央政府。印度中央政府由一個總督與一個行政會議所組成。行政會議議員十五人，其中四人是英國人，十一人是印度人，代表各宗教與地區及各種色彩的政治思想，倫敦的確可以撤消拘捕的命令，但是新德里作的決定。

行政會議內的四個英國人是陸軍部長阿啓博爾；魏菲爾爵士；內政部長里金納；馬格菲爾爵士；戰時運輸部長愛德華·本達爾爵士；財政部長耶里米·內絲門爵士。

行政會議的十一個印度人與他們的職位是：治安部長J·P·施里伐斯他伐爵士；商務部長N·R·薩克爾；僑務部長M·A·安納；供應部長H·P·摩底爵士；勞工部長B·R·安比客爾博士；情報部長C·P·拉馬斯瓦米爵士；教育土地衛生部長覺金德拉·辛爵士；郵政航空部長穆哈默德·烏斯登爵士；國防部長菲洛茲汗·龍爵士；司法部長司德·算端·阿哈默德爵士；不管部長A·拉馬斯瓦米·默達里雅爵士。

總督和英國內閣確實握有最後否決權與應付緊急事件的特權，可是近二十年來很少使用過。關於財政事件，印度對其關稅，稅收與貿易有完全管理之權，一九二一年以來就沒有受過總督或倫敦的干涉。然而對有關國防措施，軍事行動等類事件及可能惹起印度教徒與回教徒或其他份子間的印度內爭的一切政策，英國保留了最後決定權。

國民大會黨拒絕克里浦斯的建議是以自由民主的印度願意參加其他自由國家進行反侵略戰爭為條件——但是它要求國防措施的完全管理權。克里浦斯認為：在戰時，這種責任的轉讓是不可想像的。

國民大會的回答是：只有自由的印度才能奮起抗戰——換句話說：「現在給我們自由，不然我們不但不能幫助你們驅逐日本，而且要盡力罷工，拒繳捐稅，阻撓交通及此類情事，破壞你們的抗敵努力。我們不把日本看作我們的敵人，除非你們先給我們自由與處理我們本土防衛的權利。」

這種誇誕的辯詞完全用的全印大會所創的語法，迷惑欺騙了許多人，尤其是美國人。事實上是政客以屬於正在

爲生存作戰的其他民族的屠注，玩弄一種自私而狡捷的詭計。甘地與金印大會黨毫不關心中國被空中供糧是否完全因日本侵入而切斷，或寧美爾是否在華僑緊要區遭過失敗。

武力統治與揮打鎮壓的印度的確好像已經抵押給敵人了。在印度的壓制政策的繼續性了萬萬亞洲人民對整個聯合國的同誠與信任，但是聯合國，和金印大會黨一樣，是被連用巨量的賄注賭博的，印度是原料，成品與潛在人力的大貯藏所。必須使之成爲與澳洲同樣堅強的對日最後反攻的根據地。必須掌握住，以免中國除了取道俄國之外完全切斷外來援助。日本人必須攔住，否則不僅聯合國波斯灣海運陷於不安全，而且假使德國擊破中東，日本如從印度與軸心軍隊會師。

缺乏人民的好感，印度的繼續得治理好。如何得到這種好感而不得罪少數有份子是這半大陸上一個陳舊的問題。當前，印度找不到爲延續現存的統治而作戰犧牲的動力，他們十分痛恨現存統治，他們不願僅只爲了戰爭終了後自由的諾言就自動參加保衛工作。

今日之憎恨與過去之錯誤不能永遠隱匿英國會給印度帶來了長時期的和平，培養了統一的意識，給予了大量實質的和教育的誦惠，導入了現代交通，差不多消滅了饑荒，與對階級，寡婦焚身殉夫，婦女鬻居內室作過持久而勝利的戰鬥等等事實。可是印度人民與無數其他亞洲人民的傾向是，忘却這些事實，僅只聽見今日用以對付非法行爲的鞭子或連射手鎗的聲響。

美國如此大部分的輿論同情甘地與共黨徒，而忽視較大緊要的爭點，實可驚異，總而言之，我們讚揚菲律賓人與我們合力由仁牙因灣作戰到柯里巖多爾的巴丹的勇敢和忠誠。菲人已得到允許於一九四六年獨立，印度人民則允許於戰後立即獨立，菲人未曾聲明除非我們立刻讓他們獨立，他們不願作戰，並將在他們的島上阻撓我們防衛的努力。假使他們這樣做了，美國人對這種背叛行爲的憤怒一定是白熱的。那末爲什麼這樣多的美國人過於寬宥甘地所把持的這種印度黨派的搗亂態度呢？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亞怎樣

自從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完全由工黨人物組成的寇丁政府在坎培拉獲得政權以來，澳大利亞就以一種在美國很少知道的速率製造着歷史。

這個廣大的大洲聯邦，不願倫敦和它自己的保守份子的反對，爲它本身創造了與美國同列的新地位，這在戰爭告終時必將產生驚人的重要的後果。此外，澳大利亞曾經致力獨立自主地參加世界外交，構成它自己的對蘇聯的政策與對大不列顛以及帝國其他部份的嶄新和驚人的關係。並且，不願倫敦對印度的謹慎的政策，澳大利亞對亞洲受統治的民族公開表示同情。

這些成就主要歸功於兩個人，首相約翰·寇丁和外交部長及最高法官赫伯特·維爾·伊瓦特。工黨的卓越的對外政策，遲到一九三六年才開始模糊地發展，但在珍珠港被襲以後，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弱點真象大白的時期之中，在寇丁和伊瓦特的領導下，極其迅速地達到成熟。

奇怪的，美國報紙沒有將這些發展公諸美國民衆，反而將關於澳大利亞的新聞和評論大半集中於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及美國遠征軍的出現澳洲，或者根本不值得注意的事件，像達爾文，摩勒斯比港，帝汶島等地的空襲。

在戰爭開始九個月期間，澳大利亞差不多未被注意的突然出現爲一完整而勇敢的國家，公開地與美國發生密切關係，犧牲與倫敦的關係，對倫敦對這些發展的反對置之不顧。坎培拉、雪梨、墨爾本等地也有暗地和公開反對這些新政策的，尤其是澳大利亞保守黨的帝國頭腦的領袖們。

寇丁首相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十九天發表的一個聲明中，用了前此任何不列顛子國不曾夢想到的詞句，他對邱吉

爾和羅斯福總統二人提出「要求」，宣稱澳大利亞拒絕「接受太平洋戰爭是整個戰爭中附屬部份的論斷」。他表示澳大利亞視全球戰爭為不可分割的，他要求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區域整個戰略中發言。

寇丁曾任勞工同盟的職員，之後擔任一家勞工同盟刊物的主筆，從一九三五年起他是澳大利亞工黨名義上的領袖。伊瓦特似乎將平穩地以聯邦高等法院法官度其一生，但是他對澳洲前途的廣博知識使他在一九四〇年採取了以前不曾料及的步驟，辭去高等法院，加入政治活動，以工黨候選人資格在議會中佔據一席。這兩位無名的主筆和小有聲譽的法官儼然成爲風雲人物，毫不躊躇的以贏得他們的過大半的選舉人贊許的姿態製造着國際歷史。

保守黨在R. G. 孟芝任首相及他的保守黨繼承人A. W. 法頓在職的二月期間，對外和武備政策是基於盲目信任英國的海軍力量 and 假定新加坡的不會陷落。保守黨正確認清太平洋上日漸加增的危機的朕兆的唯一證據是一九四〇年在華盛頓與東京及一九四一年在中國設置使館。在孟芝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好像僅以在整個帝國國防計劃中担任一小部份責任爲滿足，雖然在他任命駐華公使時，他宣稱這個行動的意義是澳大利亞認爲她是太平洋上的「一個主人」。

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前兩年，寇丁和他的黨的領袖們開始表示疑慮，一旦英德新有戰爭，帝國會集中其大部陸海軍力量於保衛大不列顛羣島，地中海，蘇彝士道路，中東和印度。在這次提出警告以前，澳洲似乎比加拿大與南非更不注意實際的自治領自治權。事實上，澳大利亞議會甚至連早在一九三二年英議會通過的西敏寺法案都沒有批准。

寇丁與保守黨政府的第一次嚴重摩擦，是在討論擴充澳洲海軍議案時，他以反對黨領袖的資格大胆攻擊聯邦的依賴英國海上的力量。他指出：如果沒有英國的協助，一支弱小的澳洲海軍是毫無用處的，因空軍的極端重要。他說：試問假使英國在歐洲戰場被迫採取守勢而澳洲被進攻時，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又說：若無戰艦并佐以龐大的空中艦隊，新加坡將成爲無用。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的一次議會的辯論裏，寇丁提出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英國政府敢於下令調遣精銳艦隊到東方來援助澳洲嗎？我們依賴英國政治家們的才能，相信帝國將派遣軍隊來協助我們，而不作任何準備，這種國防政策是過於危險的一種冒險。」

保守黨政府不但同意倫敦的集中英國軍隊及美國租借的物資於地中海區域的政策，而且使澳洲依附於整個帝國國防政策。只要倫敦會商決定何處最感需要，澳洲軍隊就被遣送去了。這事的結果是在希臘和克里地損失大量人力和武器，槍砲和飛機，假若用這些懸蓋蘊藏的冒險所受損失當中有一部份派到了馬來亞，日本的南進或許可以被阻止，而澳洲也免去了入侵的危險。

結果澳大利亞在非洲戰役中戰死或被俘一萬二千多人，在馬來亞境內及新加坡陷落時戰死或被俘一萬八千人。日本在太平洋發動攻勢時，有一大支澳洲軍隊駐紮在北非，他們暗地宣佈要回到澳洲保護本土，不管英國最高統帥都是否喜歡這個行動。英國人只得假裝歡喜，這支軍隊於三月底到達澳洲。

一九四一年十月，恰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前兩個月，寇丁政府就職，內閣秘密會議通過了根據太平洋戰爭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所制定的整個軍事與外交政策。然而這些決定此後只在首相及外長於議會所作幾次報告中片斷地提到過。

主要的是決定不撤消以前為帝國國防利益所作的承諾，而在將來集中新的力量於澳洲本土的防衛，與幫忙供給駐馬來亞及新加坡的軍隊。這個決定與一個正式而秘密的要求相關聯，就是英國應加強新加坡的防務，關於此大海軍基地的一切決定應給予澳洲充分的友伴的地位。這一舉動結果中有一件是派遣羅遜的逐敵號和威爾斯親王號到馬來亞海面來。在那個時候，澳洲未曾有過行動，以減少她在北非的軍隊，或中止為供給英國各戰線的澳洲製造的飛機軍火的輸出。

十一月下旬，伊瓦特博士在議會中說：坎倍拉已經明白告訴倫敦，澳大利亞永遠不會贊同任何緩縮的舉動，或

英帝國或與日本訂立的任何不利於中國的協約。他又對倫敦發表了一個聲明，澳洲相信若與日本進行談判，「領導權發動權必須保留給民主國家代表的美國」，伊瓦特博士這時又曾宣布：澳大利亞外交的主要原則贊成與蘇聯聯盟，及英帝國，美國，蘇聯各國間的「堅固不破的同盟」。

然而澳大利亞當時暴動中最富革命性的是秘密通知英國，澳洲覺得以隸屬於任何因處理有關太平洋區域任何部份的政治事件的外交使團或軍事會議中「與聯合王國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

寫作這次戰爭歷史定稿的時候，很可能由現在尚為秘密的文件，證實邱吉爾的宣言：「假如美國與日本發生戰事，英國決於「一小時之後宣戰」，與澳大利亞的壓力不無關係。

伊瓦特博士曾經洩露，當日本特使來福三郎提出他的十一月二十日的建議，撤退日本駐法屬越南的軍隊，而保留對中國或蘇聯軍事行動的完全自由時，澳洲堅決反對。坎倍拉不贊成妥協。並且說，不贊成日本的南進而激許其對中國或蘇聯的新侵略是不正當的。這個時期，澳大利亞曾秘密建議英蘇締結協約，假使日本進攻任何一國，另一國有義務自動地向侵略者宣戰。這個建議為什麼未被採納，是被莫斯科或倫敦還是被兩者所拒絕，至今還沒有解說。

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澳洲製造了國防與大英帝國的歷史。那天聯邦對日本，芬蘭，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宣戰。並且將宣戰書直接呈遞英王，不讓英國內閣大臣以任何方式參與此事，這種單獨鄭重表示其自立地位，在帝國歷史上尚屬創例，事後坎倍拉向議會解釋，這是「為了明白表示皇權的完整，同時表明國王是完全依他駐聯邦的大臣的建議而行動的」，聯合王國除了驚訝和臆測之外，對此事毫無辦法。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保守黨在勢的時候，僅僅宣佈因為英國已宣佈戰爭狀態之存在，澳洲自願對德作戰。

一九四〇年聖誕節，邱吉爾首相正在美國，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美國國會聯合會議中發表演說。他坦白承認太平洋區域的戰事損失很大，並將繼續遭受損失，為了集中全部力量，利用全部資源於不列顛羣島周圍，里比亞及「

最爲緊要的太平洋戰場」的戰鬥。

寇丁首相當「兼了兩次電話到白官與邱吉爾和羅斯福總統交談。之後，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發表了一篇動人的公開演說中，他宣稱：

「我們不能接受太平洋戰事是整個戰事中附屬部份的論斷。澳洲政府認爲太平洋戰爭是主要的戰爭，美國與澳洲對作戰計劃原有充分的發言權。澳洲對於美國沒有對於聯合王國的因傳統血緣關係而產生的苦楚。我們知道澳洲要離開，而英國堅持不放。澳洲的政策必須趨向獲得蘇俄的援助，及與美國合辦 奧英，中，荷各國軍隊並肩作戰的太平洋戰略。」

邱吉爾回到英國之後，開始了在倫敦成立帝國戰時內閣及太平洋作戰會議可能性的長期辯論。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要求太平洋作戰會議設在華盛頓。一月底，邱吉爾在下院說，加拿大與南非無意派遣代表參加帝國戰時內閣，所以他們授權各自自治領派遣代表參加英國戰時內閣。他們出席旁聽辯論和上訴，但沒有表決權。澳洲勉強接受了戰時內閣的安排，和在倫敦成立太平洋作戰會議，由英，澳，荷，紐各國代表參加的妥協。

二月下旬，伊瓦特博士在坎倍拉議會中的報告申說：「最關緊要的是我們希望我國能有機會以盟邦資格與美國和山岡在同一議席以同等地位舉行磋商。」

新加坡於二月十五日投降，同日，寇丁政府提出一個秘密建議，將麥克阿瑟將軍由非島秘密接出來，授以西南太平洋最高統帥職位，統帥部設在澳洲，因爲澳洲是假定的對日猛烈反攻的跳板。華盛頓立即同意，但是直到二月二十二日才宣佈英國接受這個計劃。民衆則直到三月十七日麥克阿瑟將軍來到了澳洲以後才讓知道。

其時，爪哇與仰光三月十日同時陷落，倫敦最所關懷的是印度與中東的安全。

秘密同意調任麥克阿瑟將軍到澳洲來的第二天，羅斯福總統對全國廣播了一次爐邊閑話。他的講詞中提到：

「四十年來，我們的戰略始終是：假若日本向非島實行全面攻擊，我們就採取拖延戰略——我們知道對日戰事

必須靠消耗日本實力才能獲勝。我們深知利用我們豐富的資源，我們必能摧毀日本，最後征服它……我們知道，爲了實現我們的目的，除非島以外，必需另外開闢許多戰場，進行各種戰事，過去兩月中發生的事件並未能使我們修正這個基本戰略。」

總統承認太平洋是主要戰場之一，澳大利亞很是感激，但他主張對日戰爭必須緩緩進行與暗示將延長守勢戰略的時間，使澳人頗爲失望。

復怪的，美國好多報紙沒有刊出總統爐邊閑話的比較暗晦的各節，以致不正當的樂觀迅速播傳全國，迫切希望立即總反攻。

麥克阿瑟將軍一到澳洲，聯邦立即重新提出指責倫敦太平洋作戰會議的欠健全，雖它的會員已因中國大使顧維鈞博士的參加而擴大了。澳洲抱怨（十分正確的），當他們希望與華盛頓磋商十分緊要事件的時候，他們必須經過半打酌居間人。先要提交澳洲戰時內閣，轉到倫敦帝國戰時內閣，再到倫敦太平洋作戰會議，再到倫敦聯合國參謀部。然後由倫敦轉交羅斯福總統，他又轉交華盛頓的參謀本部。寇丁堅持，這種笨重的與無謂的手續只要在華盛頓成立一個真正的太平洋作戰會議就解除了。

麥克阿瑟到達澳洲之前一個星期，寇丁首相對美國作了一次廣播，中間宣佈他正擬派遣伊瓦特博士到美國來「徵詢羅斯福總統的意見與忠告」。這個舉動，使倫敦大爲震動，雖然寇丁對英國一九四〇年長期空戰的勝利表示敬意，並申述澳大利亞明瞭英國有經常供應蘇聯的義務。「她不能同時全力對付太平洋」，以求減輕這個宣告的力量，伊瓦特於三月二十日到達達爾府，恰恰十天之後，羅斯福總統宣佈成立太平洋作戰會議，包括美國，澳大利亞，中國，紐西蘭，加拿大，英國及荷蘭。

澳洲終於設計使自己（與紐西蘭）以與英美同等的地位參加參謀與政策的討論與決定了。就是說，她在戰爭行動裏，以一個國家的資格，得到了完全的單位。

澳大利亞明瞭她的大洲現在處於與英國在敦刻爾克以後的相同的危險地位，不同的是英國當時孤立無援，澳大利亞則有美國海陸空軍的日漸增加的援助。雖然如此，入侵是任何時期都可以來臨的。

然而，不願這個危險，澳洲政府和人民要求及早在他們的領土開闢「第二戰區」，他們希望澳大利亞軍隊將是驅逐日本回其本土的大軍中的先鋒。他們明白僅只壓倒的空軍就完成這個困難的功業，東印度與菲律賓各島嶼必須在戰略上僅僅視為「不會沉沒的航空母艦」，澳人相信，利用那些島嶼為航空母艦，不須忍受等特殊建造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的麻煩程序，就可以順利地發動攻勢。

澳大利亞戰後的前途目前是難以推測的。聯邦只有七百五十萬左右的居民，而領區幾乎等於美國大陸，不包括阿拉斯加的領域。澳洲的熱帶部分與廣大的內陸沙漠地帶永遠不能養活大量人口，但估計本洲較為溫暖地帶能夠維持白種人滿利標準的人口二萬五千萬名。

澳大利亞很公開地限制移民，甚至白種人，而且準備仍舊努力維持她的「白澳政策」。移民的限制以及個人與聯合佔有空曠島嶼的廣大區域妨礙了人口的增加。

雖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居民屬於不列顛羣島的血統，聯邦對於英國似乎較之其他任何自治領更少情感上的依附，希臘，克里地，馬來亞與新加坡的災難，合起來創造了一種對祖國的苛刻批評的態度。

在我們成為對付軸心國家的同盟之前，澳大利亞對美國的愛好與敬佩是深摯而真誠的，並且很值得注意的傾向於與我們發生更密切的文化的，經濟的與合作的關係。不幸的，大量美國遠征軍的出現澳洲很輕易地破壞了這種情感上的協調。兩件軍人強姦案件足以抵銷半打親善訪問團的成就而有餘。澳人是敏感，正直，驕傲的民族，如何避免無心地得罪大多數澳洲人民，我們的最高統帥部需要特別擔擾。

戰爭，尤其是最後勝利，可能加增已很顯著的聯邦的「獨來獨往」的精神。但是僅有七百五十萬人民的澳大利亞不能保障本身的安全，更不能在担保太平洋未來安定中担任領導的角色。

杜淡沙巴有一種有力的運動提出全體人民，和平的義務之不可避免了。甚至政府也正在宣講：澳洲在戰爭勝利以後，不要僅因本身的安逸與歡樂，就規避它國家的責任。一九四二年仲夏官方授意的廣播說道：

「一定有人要喊，我們政府的神聖責任是保障我們的生活水準，我們的安樂，我們的投資，國外的人類的道德破產不關我們的事……已經一再說過，假若我們與別的國家不肯認清不論是和平，較好的生活水準，或者我們所希望較好世界內的任何事物，不是單單國家努力可以達到的，而是只能由密切的國際合作達到的，那麼，上一年的
一切災難一定會重新臨到我們。」

澳大利亞已經英勇地為民主的目標奮鬥了三年多，她的犧牲與貢獻超過了她的人力與她的財力的比例，她的確獲得了在聯合國最後勝利以後決定她自己命運的權利。

第十五章 紐西蘭展望

雖然聯合國勝利以後，印度的地位無問題的將要發生很大的變化，澳大利亞和不列顛帝國的關係可能產生劇烈變動，紐西蘭不但將安於現狀，不會追尋新的地位，並且甚至於會堅決反對鬆弛帝國的關係。

紐西蘭是英格蘭的，一如塞塞克斯或薩立，同時是蘇格蘭的，一如高地。甚至摧毀紐西蘭的軍事挫敗，像新加坡之陷落對於駐在那裏的精良的澳洲派遣軍的情形，也不能激起紐西蘭人民對英國策略的敵意批評。

紐西蘭在出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整部出產給英國及靠英國海軍保障其安全的情況下曾經繁榮而滿足。今日是美國海軍保護本自治領不受日本攻擊的事實，紐西蘭人看來也無甚區別。他相信戰事結束時，一切必將回復「往昔歡愉的日子」，事實上，他對帝國事務的保守主義與他在社會與經濟立法與試驗中的急進主義適成驚人的對比。

紐西蘭人民期望的唯一改變是設計「使自治領成爲更好的地方，在社會上與經濟上，讓在軍中服役的孩子們在戰爭過去以後回來安居樂業。」這將是一件異常繁重的工作，因爲本國的人力已經消耗殆盡，捐稅已經不能再高，而且生產的能力或財富的增加很難得有剩餘以作施行新公共福利計劃的費用。

紐西蘭人口一百六十萬，兵役年齡的男子約計三十五萬人。但在開戰三年以後，這個小國動員了其一半以上的男子，即四十多萬人，服役於武裝部隊中的各個部門，因戰死，受傷，失蹤或被俘損失了約一萬五千名將士。現在凡屬二十歲到六十歲之間的體格健全的男子，不問其家庭情況如何，都應徵入伍了。

說紐西蘭懼怕日本入侵是錯誤的，實際上這個國家冷靜地等待着敵人的來臨，防守的措施辦的完密而澈底。疏散似乎將遭攻擊的城市與沿海區域的計劃業經周詳擬就，增加的醫院設備也充分準備好了。整部海岸都密佈了裝刺

的鐵絲網，並且差不多前後每碼都挖有防空壕。各城市中所所有公園，操場與空地都設有堅深的防空壕。

雖然紐西蘭有一個工黨，僱估許多勞工多年爭得的權利的緊急戰時命令很冷靜地接受了。第一次的這種命令，公佈於日本進襲馬來亞之後不久，詳細規定何者為基本工業，與勞資雙方遵守有關生產的法律的義務。不得政府人力局的許可，基本工業的僱工不得終結他的合同或調換新職業，未經許可，任何人不得解僱。

在美國，關於一週四十小時工作，凍結價格與工資水準，及其他增加生產遏止通貨膨脹的辦法此類的問題，有過許多政治上與宣傳上的爭論，但在紐西蘭，一週工時長度的問題是從未發生過衝突的論題，戰前工人與工黨衷心維護不易得到的五日四十小時的工作週，在戰爭期內已自動放棄了。工資與工作的合約已修改過，規定六天五十小時的工作週，而只五十小時之後才適用法律增加工時給薪一倍半的規定。增加工時每人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於是在任何工業中，一週工時以五十四小時為最高度，各工人限制只能領四小時的一倍半薪給。星期日或假日的工作不予特別的報酬。

物價與工資管制辦法施行的順利而成功，從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開始時起，生活費用增加不到百分之十。

紐西蘭面積略大於紐約州的兩倍，全部人口稍少於滿哈坦島，却以自主國家的姿態進步不辍。紐西蘭在數目上與洛杉磯或底特律的人數略等，但是這些美國城市必須每城武裝四十萬人，每城戰費約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才能比作紐西蘭對世界戰爭的貢獻。

這個孤立的小自治領——其鄰邦澳大利亞也隔塔斯曼海一千三百多哩——很久以來就實施著強迫的工會制度，廢禁罷工，一切勞工爭執事件，強迫訴諸仲裁法庭，而其判決工會與雇主公會雙方必須接受。

在美國仍屬初創的老年補助金，在紐西蘭已經實行了很多年。不經請求的適用於所有年齡六十以上的婦女與六十五以上的男子，而且完全是不需攤助的。又為被疾病所苦的老年人設有免費的國立醫院。

老年補助金逐漸在增加，現在正徵集養基金，預計從現在起，約二十年後，每個合格的個人每週可得三十先令

或每年七十八鎊。就是，紐西蘭每對老年夫婦每週可得三鎊，並且是在到達規定年齡時自動發給的，也不必考核其生活能力。一九三九年補助金總數每年十二鎊十先令，一九四二年增為一年二十鎊，今後仍將逐漸增加，一直達到七十八鎊的最高數額。

紐西蘭鎊在紐西蘭的購買力平均較高於美金五元在美國的購買力，雖然因為戰事及固定匯率關係，紐鎊的購買價格，和澳大利亞鎊一樣，規定為美金三元三角二分。

寡婦很久以來就給予約一週一鎊的補助金，每個十六歲以下的兒童每週另加十先令。

另一高度成功的紐西蘭新政是政府主辦的壽險和火險，根據記載，兩者都佔世界各地中最低的比率。火險對政府是有贏利的，但壽險保險費很低，縱有利潤也是很小的。

紐西蘭沒有免費的國立生產設備，產婦與嬰兒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產婦與兒童福利會給予母子免費的醫藥看護與指導，直到兒童二歲時為止，也是免費的，由國家補助。又為五歲到十二歲的兒童設有免費牙醫院，紐西蘭學校多半設有高效率的免費醫藥服務部，包括虛弱與新愈兒童的健康營。這是由受政府協助與政府營運的自願組織所主辦的。

在紐西蘭，只有百分之十的醫院是私人組織。在政府主辦的百分之九十的醫院中，看病與治療從一九四〇年初起一向就是免費的。每週收入不到五鎊的家庭，十六歲以下的生病兒童，現在每人每週可得四先令的疾病津貼。社會安全基金給予年六十歲以上因病不能工作者每人相當老年補助金數目的「疾病津貼」，又給予失業者同樣數額的款項以為「生活費」。

對於佔總額百分之十的私立醫院也給予一部份協助，每個病人每週可得二鎊多點的津貼。紐西蘭因醫院目的分為四十二區。百分之五十的醫院經費是由地方捐稅得來，另外百分之五十由自治領政府附與，但全部管理權操於繳納地方賦稅的各區選舉的地方董事會。

一九四一年年底，免費的普通醫藥服務施行於大眾。這個立法允許病人挑選他們自己的醫生，但規定日間門診或出診的費用爲七先令六辨士——照目前折合率，約等於美金一元二角五分。

這個普通醫藥服務法案是很奇怪的，規定假若病人付款給醫生，則應收據由國家付還。假若他付不出，則簽字證明會受治療，醫生再向國家收款。法律允許醫生收取較高診費，假若他們要這樣做，但是病人沒有支付超過定價數目的義務，醫生也不能向法院起訴追索。多付診費完全是聽便的，全看病人的富裕或謝忱或義務之感。

這個普通醫藥服務實施上有些重要的例外。對於傳染性的花柳病的治療費，違反牙醫學拔牙的醫生，領有工人賠償金或損傷金者的診治，以及證據表明病人曾得慈善團體或社會安全疾病條例之疾病津貼的，國家都不付款。

星期日、假日、或下午九時到上午七時之間的求診，對醫生較有好處，因為他們按每人十二先令六便士的診例收費。施行手續，醫生間的求診，與某些專門治療，不得適用這個規定。

議會現正考慮制定類似的立法，給予全體紐西蘭人民免費的國家付款的牙齒治療，以代替現在施行的僅只五歲到十二歲間的兒童的免費牙病臨診教授。

自治領正謀對付房屋問題，並已着手租賃與建屋之設計。業已造成一萬多幢現代房屋以爲租賃之用。結構大半是木樁的，以有汽車間的房子租金最高，最爲吸引人。基地與建築的費用每幢在一千二百鎊與一千七百鎊之間，這些房子租給工人，租金每週一鎊到一鎊十五先令。照目前的折合率標準，每七天等於美金三元三角二分到五元八角一分。這些房子不許變賣。政府計算各房平均壽命爲六十年，在攤銷表中，六十年不間斷居住之後，可以滋生利潤。

戰時需要使房屋建築極端減少，但是有一個委員會現正計劃於和平到來材料與勞工又可利用時大量擴充。

紐西蘭工人很容易自有房屋，自願墾殖的農人或移民也可得到充裕的補助。遇有此種事件，政府可以借貸總百分之九十的建築與土地費用，只要認定在二十到三十六年時期中至少攤還百分之六十。政府貸款所收利息僅只年息

百分之四又八分之一。實施這種制度的結果，紐西蘭私人所有的房屋的百分比率大於世界其他任何國家，私人抵押貸款降到最低數目，次抵押貸款是幾乎不可能得到的。

紐西蘭的公共信託局，早在一八七二年就已創立，最令自治領的律師頭痛，就像房屋資助政策之對於放債者與醫藥服務法案之對於醫生。公共信託局由政府主辦，管理一切獄犯與智力欠缺者甚至於包括遺囑檢證的商業事件，收費很低，而業務真能做到收費廉而效率高，所以整百分之八十的這類商業事件都為這個政府機關包辦了。

所有這些津貼不是給予紐西蘭人民而不要他們出一個錢的，早在所得稅率高到實際等於沒收的程度以前，賦稅已經是可怕的了。賦稅往往達到每一鎊所獲須繳十七個半先令——等於美金每元繳納八角七分。一切非賺得的收入，超過等於美金一萬二千元數目，則繳納美金整百分之九十。在紐西蘭參加對德議戰爭的初二年間，每一贍養家庭生計者繳納了約一百六十一鎊的捐稅，從事戰時工作或戰事合同的個人與公司繳納百分之六十的戰時利得的特稅——其比額到達一切其他正常與非常稅收的頂點。

在戰事頭兩年半，紐西蘭的戰時預算總計一萬另四百萬餘鎊，而在整個一九一四到一八年戰爭中，此自治領只花了二千三百萬鎊的戰費。並且在戰勝以後，必須繼續征收重稅，以供為生還老兵計劃的各種津貼之用。一九四二年的戰費計算要較一九四一年的大三倍，預計將略超過一萬三千三百萬鎊。

議會已經通過立法協助戰場生還的軍人，有眷成為農夫的，預備了學校和試驗站。他們經過訓練以後，可以向政府借貸三千鎊以下的款項以購買與建造農莊產業。此外，購買牲畜與農具，又可借款一三五〇鎊。這般人不需要私人資本。農莊貸款征收百分之四又八分之一的利息，牲畜貸款利息未有規定，但在百分之五以下。退伍軍人購置或建造房屋可得百分之百的資助。他們又可以得到一千五百鎊以下的貸款。商業貸款以同樣數目與利率貸給能證明有獨立經營的意向與能力的軍人或水手。

這些社會與經濟的革新好像表明紐西蘭沒有空閑或能力執行她在這次大戰中的責任，實則不然。早在日本進政

太平洋民主國家之前，本自治領已經有了三十多萬武裝人員，其後兵役年齡從十八歲到四十六歲擴充到五十歲以內男子一律入伍。不適於兵役的各人徵集從事戰時根本工作。

新的兵役法首次包括了婦女。動員從事戰時服務的第一階層包括所有身體合格的二十歲與二十一歲的婦女；現在所有留在國內的身體健全的男子，不論年齡與職業，在工餘與星期日與戰時限制下仍然舉行的少數假日，都須加入本土防護團的自願隊。

紐西蘭對戰爭人力的貢獻範圍也是極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本自治領死難六萬多人，花銷戰費二千三百萬鎊。紐西蘭在這次戰爭的損失數字，一時還無法統計。

紐西蘭正在作戰。如其鄰邦澳大利亞，紐西蘭今日是美國的盟邦。她的海港與碼頭庇護，供應並修整着戰艦與運輸輪，她的農莊幫助給養駐在澳洲的美國軍隊，她的船舶和她的戰士，一如南太平洋區域的澳英荷各國的船舶和戰士，聽受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支配——而她仍然關心本國事務。

五十年以來，紐西蘭因為它當時的前進的立法，漸以「社會主義的實驗室」著稱。今日此自治領人民堅持他們是世界實施前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與政府制度異常成功的唯一國家，他們說他們決意保持前半個世紀內他們所創造的，並且深信將來之世界組織必將非常像今日的紐西蘭的情況。

但是凡屬有關其國際政治地位的處所，紐西蘭希望沒有改變，而且可能是整個遠太平洋區域中，在聯合國戰勝之後不會經歷暴烈變動的唯一地方。

第十六章 水上堡壘

太平洋島嶼，除了菲律賓羣島與東印度羣島分開論述的之外，給予戰後處置一個難題。過去夏威夷以西和以南的島嶼大都很少重要，但是自從日本表明了這種前哨陣地握在蓄意侵略者手中的危險，和自從飛機橫渡太平洋，以爲常以來，這些島嶼有了新的價值和重要。這些島嶼，數以千計，單獨地或成羣地，不是爲美國、英國、法國或日本所主有，就是以委任統治方式爲後三國或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所領有。這種委任統治地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現在很難得下界說，因爲委任統治地是假定在國際聯盟之下實施的，而國聯雖然沒有完全消滅，現在除了少數小的活動與機構之外，實際上是停止行使職權的機關了。

這些島嶼上的土人，主要的屬於披里尼西亞種，與夏威夷人或紐西蘭的毛利人沒有血緣關係。西南部馬來人很多，各處散佈着仍然沈溺於獵首和食人風俗的部落。沒有一島或羣島曾經要求過獨立或自治，政府和文化完全是由外面傳進去的。大略地說，這些島嶼東西延伸約五千哩，處於地球的凸出地帶，有如一根廣達三千哩的極大的帶子——赤道兩側各一千五百哩。

商業上，這些島嶼從未被重視過。其中大半是火山源，雖然間或有鐵礦的儲藏，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出產巨量的錫和鎳。輸出品數量很小，主要是乾椰子肉、糖酒、磷酸鹽，若干數量的糖、麥根粉、咖啡、甘蔗、香蘭果、鳳梨、鳳梨母及乾魚。因爲在商業上很不重要，所以只有島際船舶往來行駛，許多島嶼而且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與外界沒有交通。

商業中心在橫渡太平洋船舶添辦清水與糧食的幾處良港上發展起來，間或還有重要的電報站。美國很早就設在薩摩亞設置了一個小型海軍站，英國人在斐濟羣島的蘇瓦有一個小站。

太平洋小島的價值尙待日本去證明。由橫濱南行約五百哩，日本稱之爲她的「水上堡壘」的第一羣島是小笠原羣島，其南是位於美屬關島北側的由十四個小島組成的拉德倫或馬利亞納羣島，關島的南面是五四九島的加羅林羣島，其東是馬紹爾羣島——又是六十多個島嶼。

馬利亞納羣島、加羅林羣島及馬紹爾羣島都由日本受國際聯盟的委託代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原屬德國。這區域合計只有約九五〇方哩，一九三五年人口總計九八五〇〇人。日本接受國際聯盟的委託時，曾承諾不在這些島嶼上設防，不過這個諾言早被置之度外，國聯的詢問置若罔聞，中立調查者不許走進各島，最後，連日內瓦的詢問也拒絕答覆了。

從小笠原羣島南端到加羅林羣島中部南北距離是一千二百多哩，「水上堡壘」的鏈條，從加羅林羣島向正東（恰在赤道之北）延展二千六百多哩就到馬紹爾羣島的拉達克的東端。加羅林羣島西南，與菲律賓羣島的民答那峨以東，是另一羣日本代管島——帛琉羣島，因而將日本防線又向東印度羣島方向擴張了一千二百哩。

正當美國與英國遵守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簽字的九國公約的條約義務，限制設防關島，增援柯里幾多爾，或加爾香港，日本則忙於破壞她對委任統治各島的約束。凡是良港，她就建築小站以供應她的海軍的燃料和糧食，與停放她的海軍飛機。凡是良好平坦的地帶，她就建築陸軍飛機機場。她受託代管的各島實際上成爲了水上堡壘。巴丹半島與柯里幾多爾守軍之所以沒有得到增援的，就是爲了日本在上述各島實力堅強的緣故。而日本之所以能夠安全地擴充她的交通線直到赤道以南，其故也在此。在各島上，她駐有偵察機和轟炸機，潛艇與快速的巡洋艦十分安全地在各島後面與西方往來巡哨，準備着一俟偵察機報告敵人臨近即駛出迎擊。各島間的幽深的水道是很少的，而且滿佈着水雷。若派遣一支艦隊與運輸艦企圖擊破水上堡壘的鏈鎖，無異於作自殺的賭博，進攻者處於極度劣勢。

雖然美國不承認在戰爭終了時有擴充領土野心，這些島嶼明顯的要從日本拿掉，並且似乎同樣明顯的，它們

一定歸於美國。假如我們領有日本今日統治的各島，我們就能保證乘船和乘飛機往菲律賓的安全，而從菲律賓到中國的距離，只有四百六十哩。顯然的，假若菲律賓願意立即獨立，我們必須爭取地利，保護他們不受任何危及他們安全的威脅，而我們并不能與我們的友邦中國斷絕海上或空中的聯繫，也是異常要緊的。

美國對於立即歸併這些島嶼唯一差強人意的推辭，可能是將它們交給某種有力量保障它們不受攻擊或侵略的國際機構統治。不久的將來，它們將因作為空運巨機的口岸而趨重要，所以，不論我們是否完全主有各島，將來航線的一切着陸和燃料的便利應在相等條件下給予各國的商機，一如巴拿馬運河平時開放給全世界船舶的情形。

夏威夷、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關島、菲律賓將成為未來世界最大商業航空線上的據點。不管對夏威夷以西各島如何處置，最基本的原則是不可交給弱者手中。

往東亞途中的航空站，其重要較次於馬紹爾與加羅林羣島的，應該是西南朝紐西蘭與澳大利亞伸展的一串島嶼及一羣島嶼。其中有些屬於美國，有些屬於英國，有些屬於法國，有些委託給戰後與美國間的文化與經濟關係將更趨密切重要的兩個英國大自治領代管。

國際管制這條大航空線也必定有助於交通的迅速增進。在珍珠港事件以前，這個區域有個可笑的情狀存在。飛機號巨機被迫其西南終點於紐西蘭的奧克蘭，澳大利亞不許在澳洲降落，因為美國政府不肯給予澳洲飛行員應用夏威夷為計劃中的由悉尼到英屬哥倫比亞的溫古華航線的着陸點的權利。

甚至於在戰爭顯然無法避免的危急情況之下，雙方還是維持這種限制，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後，結果奧克蘭成爲一個緊要的咽喉地帶，很多乘坐飛機號降落奧克蘭的旅客被迫在那裏等候幾個星期，然後才能渡過一千二百哩的塔斯曼海到達澳洲。

因公往中國的美國人——軍事人員、外交家、高級海軍官員、攜有重要戰時生產合同的人員——莫明其妙的就擱在奧克蘭。紐西蘭與澳洲之間沒有專門行駛的客運輪船，而奧克蘭與悉尼間裝載旅客與郵件的小型飛機每半月至

多來回航行三次。珍珠港事件以前一個多月，七十多個美國人、英國人、澳國人、中國人，和東印度羣島的荷蘭人，就爲了飛鳥號巨機不能接觸澳洲港口的原故，無限期的耽擱於奧克蘭。

美國之拒絕允許澳大利亞航線在夏威夷降落是毫無理由的，因爲即使允許，也不過是紙上談兵。澳國異常缺乏飛機，航線計劃非到戰事終結以後是無法開始施行的。

法國對於她在太平洋各島被置於某種方式的國際管理，共求福利一舉，或將極端反對并竭力反駁，然而法屬各島却是所有上述各領地中，除了日本統治地以外，管理的最紊亂與最腐敗的，一如法屬印度支那是白種人在亞洲大陸披不名譽的殖民地。

法國佔有新赫布里底羣島的一部，新喀里多尼亞（用作罪犯殖民地），羅亞爾特羣島，馬貴斯，圖部愛或澳大利羣島，及社會羣島，後者包括著名的大溪地。大溪地的首城拉匹提是全部這些分散的法國領地的政治上的首府，拉匹提的半戲劇而不名譽的政權爭奪，成爲對於白種人在遙遠地帶有時行爲失檢的諷刺文章的好材料。

除了中國的收回台灣的正當要求的不必爭執的事實以外，這個大島自然會成爲由夏威夷向西橫渡太平洋往亞洲大陸的一長串島嶼踏腳石的西端終點。台灣早被日本人發展成爲了一個巨大的航空站，而離中國海岸又只有一百多哩。

台灣依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轉給日本，但是事實上的轉讓只是在一般日本軍艦上的一紙公文。中國戰敗了，但台灣對北京的代表和日本人都不許登陸。台灣人民宣佈成立一共和國，日本取得台灣真是用武力征服的，經過五個月的戰鬥才得樹立統治權。在日本人佔領的全部時期內，也時常發生叛亂。

台灣面積一三八〇七方哩，與馬薩諸塞州、康涅狄格州、羅得島州合計面積大致相等。在日本接手統治時，中國人口約計二百六十萬，現在已增加到五百萬以上了。一八九五年，本島的主要輸出品是米、糖、茶和樟腦，一九三八年（能獲得官方數字的最後一年），這些項目仍佔台灣輸出品之百分之七十五。

台灣的貿易進展清晰地表現了日本對於歸併或征服土地的方策，下述數字很有價值，因為十年來在滿洲與一九三七年以後在中國佔領區同一種手段正進行着，日本吞併本島以前，全部輸出品之百分之六十五運往中國，但在一九三八年內，只佔百分之二·七了。在一八九五年，台灣全部進口中百分之三七·四來自中國，一九三八年減到百分之〇·五。從前美國供應全部輸入品的百分之五·三，英國百分之七·三。一九三八年由美國輸入者是百分之〇·三，英國的部份降到零。一九三八年日本供應全部台灣輸入之八九·四，而日本、高麗、滿洲獲得全部輸出品之百分之九七·八。

若非將台灣包括於關稅系統內，本島經濟生活的重要轉變不會完成。樟腦、鹽、烟艸及鴉片定為日本政府專利品，對於一切進出口洋貨採用差別待遇的稅則，控制全部本島貿易的日本輪船公司對外國行商征收較日本行商加倍的運費。日本盡力分散台灣人與中國的聯繫，禁止人民入境及移民出境，後來答應放緩這個規定，也不過是允許定期從大陸輸入一萬中國的苦力。

台灣可作日本人不願意移居國外的最好的例子，雖然他們想以人口過剩為藉口證明他們擴充領土政策的正當。在日本統治的四十七年間，本島土著人口大約增加了一倍——從二百六十萬到五百多萬——而台灣的日本人口一九三八年達到極峯也不過三十萬九千人，佔全部百分之五·五弱。

控訴日本為殖民帝國是很令人厭倦的，因為說的次數太多了，她在台灣也遵循一貫的政策。學校里只許教日文，警律甚至干預到土著的宗教、婚姻與葬儀。多年來，島上佈滿了密探與諜報人員，然而人民異常憤恨，蓄意背叛，以致在一九三八年，必需每五百八十名台灣人設置一個日本警察，同年，在日本國內，百分比是一〇五二日本人民一個警察。

台灣與高麗，菲律賓及荷屬東印度不同，將來不會發生自治或獨立的問題，因為極大部份的人口在血緣上與語言上都是中國人，台灣不應該包括於對大部份太平洋島嶼所作的任何國際措施之內，而應該立即成為整個中國的一

部份。和在高麗及滿洲一樣，日本在此地的經濟權利必須全部取消，假使住在那裏的日本人民不被接送回國，他們必將遭受他們虐待壓迫近半世紀的人民的迫害與暗殺。絕對沒有地方政府能夠給予他們充分的保障。

不論最後成就是怎樣的，一種和平，必須做到用武力來維持和平——不是靠潛在的武力，而是靠真正武力——這種真正的武力必須操諸一週危急或威脅出現則毫不猶豫予以施用者的掌中。

美國人民也會承認，在這次戰爭終結時，他們生存的環境與他們國家的地理位置將迫使他們享有武力，——在戰事告終時，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武力——並且，在遠太平洋使用此武力較之在大西洋彼岸更爲重要。

他們決不會以舊日帝國主義的過時與可恥的方式運用這個武力的，即使各戰勝國願意儘量取消他們各個的主權以產生掌握全球永久武力的偉大國際機構，給予這個國際機構大部份威望或實力的，還是美國。在所有決定中担任主要角色的必定是華盛頓。這是必要之舉，因爲武力產生責任，假若規避責任，武力就會減小，而最後趨於消失。

對於執行凡爾賽條約或補救其強制性，曾經有過充足的潛力，但是有關各國不願掌握此權，不論是個別的或集團的。假若我國與其他戰勝的聯合國規避責任，不設法運用他們的力量維持和平，將國大自由的諾言兌現給全世界人民，那麼，當前的大難將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所從事的鬥爭同樣無意思，無結果。

在這次戰爭開始以前，最遙遠的太平洋島嶼離舊金山就只要五日的飛行。戰事結束時，飛機的進步可能使最遙遠的地方進入四十小時航程之內。戰事結束時，各島應該解除武裝，交給某種國際警察與行政機構統轄，現在設防爲水上堡壘的各島應使之成爲橫渡世界最大洋的商業的踏脚石。

第十七章 儲留備用的松岡

日本一方面竭力作戰，以求勝利，一方面也預作打算，倘或戰敗，如何盡其所能以求倖免。在美國境內，她的特務人員誘導着愛好和平人士參加贊成軟性和平的運動；在日本本土，帝國最能幹的外交家與談判家給保留在幕後，以待日本戰敗之時把他們以「自由思想」代表的姿態推到台前，謀取和平解決，允許日本人至少保留他們所竊取的領土的一部分。

儲留備用的外交家中最能幹的——對美國最危險，因為他在美國居住時間很久，知道美國怎樣思維與感覺——是松岡洋右，近衛親王第三次內閣中的日本外相，一九四一年夏天希特勒進攻蘇維埃以後不久才辭職的。

松岡一度親美，但在外相任內一反根本態度成爲日本「反白種人」集團的領袖之一，並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引導他的國家加入德義軸心。一九四一年春天，松岡曾作過一次長途旅行，在柏林和羅馬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抵掌長談，又在回國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星期。在這次訪問期內，他商訂了他的國家與蘇聯間的中立條約，回到東京時，被目爲凱旋的英雄，大受歡迎。然而，不過幾個星期，他就失寵告退了，因爲希特勒在德意松岡與史達林締結密約之後，突然進攻蘇聯，使這位日本外相大爲「丟臉」。

以西方人眼光看，松岡既經引導日本加入軸心，似乎使他不可能在最後和平談判時担任重要角色了。但是日本人是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這樣思想和推理。日本人無疑會推舉松岡爲他們理想的和平談判的代言人，他們認爲既然希特勒曾經「背叛」過他，他知道了他的方策的錯誤，於是又成爲熱忱的親美分子了。

我在遠東的十五年間，我將松岡列爲我們認爲我的最親密的五個日本人之中的第二位。我對他的才能和他的敏捷頭腦很是欣賞，認爲在旁的日本人之上。我親眼得見他的飛黃騰達，先是比較隱蝕的南滿鐵路，東京的帝國

主義擴張的最大的金融武器的幾個副總裁之一，在日內瓦經過長時間檢討讀責帝國在滿洲的侵略時，他領導日本代表團退出國聯。之後他有一時期的退隱，這似乎是日本的政治生涯整體的一部分。

松岡以南滿鐵路總裁初露頭角，漸與日本陸軍侵略主義者集團沆瀣一氣。在顯赫一時的這個龐大鐵路機構的首長之後，松岡又有過一時期的退休，直到以外相及有力的首相候選人再度出現，現在他又在退隱之中，但是他的東山再起是必然的，美國必須密切注意，他現在是激烈反美反英的，而他的異乎尋常的才幹使他成爲異乎尋常的危險。

松岡洋右的信念千變萬化，但是他本人有兩點却是一成不變——他始終是親日的與親松岡的。他辱罵過軍人，而又奴隸般的聽候他們的吩咐，歌頌他們的功業。他曾在他的事業與公共生活裏當選爲保守的資本主義的首領，而同時順着在日本可稱爲急進的方式培養他個人的信念，扯談他個人的事業。他曾經是同樣熱心的理智的和平的信徒與膚淺的戰爭的辯客。

日本垂涎東西伯利亞已經二十多年，這個佔有的情緒是基於極其重要的戰略、經濟與政治的謀慮，日本人看來，海參威之繼設爲日本以外國家領有，實形成「指着帝國心臟的手槍」。無數的海陸軍將領內閣閣員就這樣不響的告誡日本人民，日本覬覦西伯利亞的油礦、漁業、森林、農莊，以及廣闊的礦藏。以外，日本恐懼蘇維埃接近現在勉強隸屬而久懷怨恨的高麗人與滿洲人。

日本曾經兩次嘗試奪取西伯利亞，第一次，全世界都知道的，發生於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她的軍隊佔領了很大的區域。後來因爲華盛頓的壓力與連續與俄國遊擊軍隊激戰失利才撤退了。另一次嘗試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旬松岡（當時的南滿鐵路總裁）所計劃的。

松岡選擇我爲他一九三八年秋天秘密活動的居間人，在他的慫恿之下，我轉送給白宮一套獲得東西伯利亞與他所稱爲「日美共同社會」的驚人提議。他的提議想把美國拖進亞洲大陸的危險的帝國主義擴張，並誘導羅斯福總統

促使美國政府作世界史上最大的土地購置。

之後他成爲公認的侵略外交政策的贊助者，反美，甚至於「反白種人」。但在一九三八年松岡惋惜並非難日本軍人的政策，甚至說他準備從中國大部撤退日本軍隊，只要羅斯福總統接受他的大胆的提案。

松岡左右無疑將再出現於日本政治舞台，每個日本政客都是如此。他可能再任外相，甚至於成爲首相，而且日本必將設法使他在和平議席上得到一席，假如能有磋商的和平的話。他希望在一九三八年當選首相，他說假如我們的總統接受了他的獲得東西伯利亞的計劃，他是可以得到這個位置的。的確，白宮對他的建議的冷淡與後列在直野心成爲泡影，可能是他從親美的態度變成日本國內最恨美國的敵視的態度的主要原因。

松岡之所以選擇我爲居間人，把他的秘密提議轉交羅斯福總統的，是因爲我們已經是十年的好朋友了。我在他任南滿鐵路副總裁時就認識了他，在他領導日本代表團退出國際聯盟之後的暫時退隱時期，我時常與他接談，後來他担任這鐵路的總裁時，我也不時會見他。在上流最後時期中，一個晚上，邊喝着白蘭地與黑咖啡，僅對我承認，我曾經救過他的性命而自己不知道。我完全不相信。

「你記不記得一九三二年二月裏一個晚上，那時我們正與中國人在上海作戰？」他問：「我打電話給你，問我們能否一同吃晚飯，我好把我的結束上海戰事的計劃大略告訴你，並希望你拿去與美國海軍將領與總領事討論。現在還記得嗎？」

我記得很清楚。在電話裏我同意了飯約，並問松岡我到那裏找他，在茂華旅社的應接室還是在他私人的起居室。他的回答出我意外，「我想頂好我來找你，到你的房間裏來。你肯不肯請一個餓鬼吃飯？」

很有理由令我懷疑這個約會的成功。我的中國廚子非常痛恨日本，他用小指頭在我好久以前購買的價值八十元的日本海味罐頭每廳上挖一個窟窿，於是內面的東西都壞掉了。然而松岡來了，晚餐也還不錯，他的和平意見頗有趣味而不著邊際，毫無結論。

「嘩，就是吃飯的那天晚上，爲了我主張和平，幾個日本浪人要暗殺我，」他一年以後密告我說，「我只好利用俄歐用的電梯偷偷的離開旅館。你大約記得，我事實上是躲在你的房間內的時候，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那就是通知我奸徒都捉到了。那晚上你請我吃飯，也救了我的命。」

松岡洋右這人是一個偉大夢幻的不穩固的夢想家，但是他的忠忱（除了對松岡）是不堅定的。對於某一點他可是一個嚴謹的現實主義者，其後他的衝動與偏見又使他盲目於現實。矮胖身材，年齡已有六十二却生着一副兒童的圓臉，蓄着鬍子，裝腔作勢，儼然軍人，而又憨態善笑，以致不倫不類。他很難靜聽別人談話，而又頗喜高論，常常因其高亢聲調如珠妙語而忘其所以。他承認，因爲他童年大半在美國度過，他喜歡用英文思索，但是「幾杯下肚」以後，就一反常態，只能用日文思索！。

這位日本未來的外相一八九三年在俄勒岡的波特蘭上岸的時候，年才十四歲，差不多是身無分文。他力求上進，由波特蘭學校至加里福尼亞州奧克蘭的高級學校，後來他進了俄勒岡大學的法學院，二十歲時得到法學學士學位。大志、節儉、勤奮，他覺得任何卑微的職業都可幫忙他上進。他當過茶館侍者，做過公共汽車茶房，在日本人主有的茶園充過長工，有一時期他甚至做家庭僕役。

有些不頂曉得他的人士相信他的反美主義是由於他早年間所遭受的藐視——由於種族偏見的藐視。這是不正確的，他的反美主義是從羅斯福總統拒絕他請我轉交的美日聯合的祕密提議的期間起始的，在他的計劃被白宮拒絕以前，松岡時常對我說。

「俄勒岡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假若我年老退休時，我們的天皇認爲我有功國家，沒有什麼事情比受任我國駐波特蘭總領事予以榮譽的退休，更使我快活了。」

以長久擔任南滿鐵路總裁位置論，松岡是個特殊型態的人物。這條鐵路多年來就是日本準備侵略滿洲的活動的代表。雖然他很有機會成爲日本頂著名的千萬富翁之一，他却從未想到儲聚錢財。

一個傍晚，他在大連告訴我：「假若內部人們曉得了我的信念，我早就被趕走。我現在握著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授予的最高職位。可是我既不相信方式比較激烈的帝國主義，也不信仰資本主義。我不是富翁，却是個相當富有的人，不過我的兒子們曉得我死的時候他們承繼不着什麼。他們每人已經受過我所能供給的最好的教育，就是這件事也大傷我的社會良心，因為爲什麼我的兒子，僅僅爲了他們是我的兒子，比一個農夫或工人的兒子要受好一些的教育呢？畢業之後，我每個孩子給了一千五百日元，告訴他們必須自食其力。我死後，假若我的太太還活著，她將由一筆信託基金得到適度的收入，而其他我的財產將遺贈給國家。」

對於中國，松岡的態度，在他以主張侵略外交政策的軍閥爲後台出任外相以前，一直是親善與友好的，不過沾染着垂顧與上國的感覺。而使中國人不勝憤慨的與四十年來使兩國間不能發生真正友誼的，也就是這個態度。

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可怕的長期中日戰爭開始前的一年，一天中午我由上海乘船到達大連。我一到旅館就發現有張松岡寫的短箋等著我，這張便箋至今我還留著。

「親愛的阿本德：

本城吃不到可口的洋餐，日本廚子都是可怕的。在海濱舍間我有滿洲最好的中國廚子，請於七時來吃中國餐如何？坐上只有五六位想認識你的朋友。如屬可行，五時左右來好了，在這般傢伙來之前，我們可以安靜談一會。松岡洋右。」

五點鐘一過，我就到了他那裏。他的房子在半山之間，俯視着優美的海灘，向南是黃褐色的險峻的島嶼，矗立在直懸瀾蔚藍的水中。山光水色，很有點兒像意大利西部熱內亞以南的海岸。

手抱著威士忌酒，腳蹬着陽台欄干，松岡與我對坐，談笑、暢飲，有時靜默地吸煙，燦爛的落日漸由灰暗而消失，晚星出現。

「我們的可恨的戰犬又咬著中國的咽喉了。」在不平常的長時間靜默以後，松岡說：「那群可憐的中國人——

他們需要的是我們的友誼，不是我們的仇恨，也不是我們的武力。一天我們把刺刀比着他們的咽喉，他們就永不會親近我們。」

「黃河又在泛濫了。」他接着說，一隻手向南一揮，「又證實它中國之患的名稱。渡過這個蛋白色的海，不到兩小時，就是山東省與其三千五百多萬的受壓迫與貧困的人民——就是，日本人口的一半，可是怎樣幫助他們呢？他們正努力用成捆的乾柴與獨輪車裝載的土石阻止可怕的洪水。這一切不過是個象徵，日本的使命是幫忙這些不幸的人民。我們必須帶着美國挖泥機進去，代替柴捆與獨輪車，控制這條極惡的河流，使三千多萬農民的田地，收成與生命得到安全。」

日本「進入」山東了，並且帶着報復。日本的飛機炸毀了山東的城鎮，日本的軍隊殺戮了數以萬計的山東農民，洗劫了他們的農村，奸污了他們的妻女，其凶另一省內，日本軍隊掘斷了松岡感喟的那條河流的堤防，不到兩年，廣大農村地帶全部淹沒，黃河改道，比美國沿大西洋岸的各州還大的區域要被沙泥荒蕪好幾十年。

某種有力的感召——可能是野心——使親善的松岡變成日本軍人集團的口舌，現在他附和他們的狂犬，中國必須「奴服」，中國政府必須「摧毀」。他已經忘了他自己六年以前的信仰嗎？「他們需要的是我們的友誼……一天我們把刺刀比着他們的咽喉，他們就永不親近我們。」

這個怪誕善變的人物懷抱着一個關於日美關係的異想天開的計劃。但是，假若他的計劃或者實現了，他一定使上兩年的歷史大為改觀了。他出任日本外相時，對其工作是有優良的背境的。

在俄勒岡與加里福尼亞度過了最有影響的九年以後，他二十二歲時回到日本，研讀了兩年日本和中國的經籍著述與國際公法之後，進入外交界，服務十八年。他任過駐上海總領事，當過後藤新平伯爵任外相時的私人秘書，又做過原高橋首相的秘書。一九一九年他是日本出席巴黎和會的重要代表之一。

第二年，一九二〇，松岡離開外交界，但不久出任南滿鐵路處長，之後升任副總裁，最後擔任此龐大機構之總

說。一九三一年，國聯討論李頓調查團的滿洲報告書時，他去日內瓦爲日本聲辯，他的煽動的卽席講詞雖駭然却不曾說服各國代表，四十多國投票反對日本，他於是宣佈帝國正式退出國聯，之後假道美國回國，沿途發表誇傲而憤怒的講演。

當松岡於一九三八年春向羅斯福總統提出他的驚人的提案時，他還是南滿鐵路的總裁，一但當時他暗地對我說，他在一九三九年初辭職。他果然這樣做了。假若他對美國的提議被完全誠意地接受了，他說，他必定是日本下任首相，當時情況十分明顯，近衛親王的內閣不久將辭職，松岡告訴我，假若他本人不是下任首相，則平沼男爵必將担任此職。松岡當時在樞密院中地位很高，他對西伯利亞的提議或者得到甚至天皇本人的同意，也未可知。

果然如其預言，政府於一九三九年初辭職，平沼組織了一個短命的內閣，同年秋天因歐戰開始前不久的希特勒史達林協約而垮台。平沼是與德國聯盟的忠實擁護者，當希特勒與史達林握手言歡，而被視爲日本的死敵時，平沼在「丟臉」的狀態中下野，其狼狽情形只有後來松岡自己的倒台可與比擬。但在日本這類人物不會永遠在野的，平沼男爵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辭職的近衛親王內閣內復職，又爲東條當政時的重要閣員。松岡必定會以同樣方式重任高級職務的。

一九三九年秋天，松岡被推薦繼平沼出任首相，但他當時不想担任這個職務。在阿部將軍組織其短命內閣時，任命松岡爲日本駐華盛頓大使之說甚囂塵上，他也不願出任這個位置。他厭惡失敗，以他的「共同社會」的提議全被貶視而論，而覺得任何東京大使都無成功之可能。

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我開始籌劃一次由上海往「滿洲國」及華北的旅行，爲紐約泰晤士報採訪新聞。和每次一樣，在去大連或瀋陽之前，我拜訪了松岡駐上海的私人代表，探詢他的長官，當時的南滿鐵路總裁，是否在「滿洲國」。我與松岡取得接觸始終主要是爲了新聞上的重要。我得悉他當時在日本，但大約將於十一月六日飛返大連。

十一月七日我由上海動身往大連，於九日近午時到達這個海港城市。那天下午，我與松岡在他的辦公室裏盤桓了一個鐘點，我們無所不談，從張伯倫的幕尼赫協定到隔當時不久的日本軍隊的攻佔廣州。十日上午，我們兩人乘火車離開大連北行，前往瀋陽，旅程中大部時間我是在松岡私人房間裏。

他用他的平常的坦白談論遠東局勢的各方面，然而我總覺得他有一些保留或心神不定。並不缺乏誠懇，我還是覺得整盤他半個腦子的某種觀念沒有讓我曉得。

我們約於中午在瀋陽下車。零度下的風疾掃着月台，帶來濃厚的戈壁沙漠的塵埃，日光成爲了深褐色。用日語與候迎的一羣顯貴賂爲交談以後，松岡約我當晚在太和旅館與他共餐。

這次晚餐甚爲成功，不過我知道某種緊要之事仍未吐露。其他客人有南滿鐵路三個副總裁及四個別的日本人，他們的姓氏和官階我已記不起來了。松岡沒有提頭談話，時常心不在焉的敲擊手指或滾動麵包，忽而笨拙地加入談論他分明事先未曾留心的問題。

我們快到午夜才散，松岡向我告辭。他說他將乘午班火車去朝鮮，我們恐怕要到我下次旅行「滿洲國」時才罷再見面了。我提議他到上海去調查一下英美人士當時所感受的對日本軍事行爲與禁例的許多憤懣之情，他一笑扯開。我勉強與他告別，深深感覺爲了某種原因我未能與他密切接談，探悉松岡腦中盤旋的究竟何事。

回到房間，我作好了睡覺的準備之後，小心地將二重窗推開一條窄縫。風已經息了，空氣中已無沙塵，滿天星斗似乎分外明亮，溫度下降，有如安靜的海中的測錘。相信塵浪已經平靜，我把窗戶完全推開，跳上床去——而電話亂響起來。

「喂！」我怒叫：一點也不體貌，因爲我冷得發抖，又深信在如此午夜，話機一定只會傳來打電話者的道歉，而且總是這一套：「喂，喂，號碼錯了」。誰知不然，這回是松岡的和藹友誼的喉嚨。

「我想再見見你，」他說：「有要緊的事。你可否在明天早晨九點鐘到本旅館應待室找這裏來，並且至少十點

半鐘以前不作別的約會？」

那天夜裏我遲遲不能入眠，因為我的腦子裏充滿了猜測。松岡將告訴我一個從「滿洲國」進入華北佔領區的龐大鐵路擴充計劃嗎？或許是他不肯始終聽受吩咐日本陸軍強迫他去職吧？餐席上他曾帶笑說，陸軍顯然比他更懂得架置鐵道，他們曾強迫他建造十條向北的新戰略路線，指向西伯利亞邊界，尤其使他大惑不解的，每條路線一通車時就要賺錢。是醞釀已久的沿「滿洲國」西伯利亞邊境的大規模戰鬥將要爆發嗎？但是這些猜測，在範圍上與主題上，都與松岡要我轉達白宮的計劃大相逕庭。

第二天早上，他開頭就說，他談到或聽說過後來成爲一九二二—二三年華盛頓會議的勳議是唐寧街英國人所起草，由當時的紙約泰晤士報發行人已故的阿多夫俄克斯從英國外交部轉送給哈定總統與國務卿休士的。

「我現在要求你們的現任發行人，阿瑟·塞斯·塞爾茲柏吉爾先生將我的提議直接轉交羅斯福總統，」他接着說：「除了總統、赫爾國務卿和塞爾茲柏吉爾先生，別讓美國任何人曉得這個建議，或者是由我提出的。假若這個計劃似乎是由日本發動的，就很少成功的機會。我有特殊而重要的理由不利用我們駐華盛頓大使館轉達這個意思。假使你願意寫信給塞爾茲柏吉爾先生，我可以派私人郵差乘一艘美國或英國輪船送這封信到橫濱。不過我寧願你由香港寄發，那裏不會遭遇干涉或檢查。」

那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前約十個月，香港還沒有檢查制度，而在日本和「滿洲國」一切信件須經嚴格檢查，由上海或其他日本軍隊控制的中國地方投郵的信件也是一樣，松岡說：假若日本軍隊中「某種人員」得知了他的建議途背在中國的與南進的軍事計劃，他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必喪失。

最後商就的辦法是，在松岡贊同我對我們談話的詳盡記錄以後（這點，第二天，十一月十一日他以書面辦到），我保藏這個記錄在身邊，日夜不離，一直到我回到上海之後，將記錄重寫成給羅斯福總統與赫爾國務卿的信件，（這信我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寫成，）抄錄三份，其中一份我現在還保存着，另外兩份送給紐約泰晤士報當時駐重慶

的訪員，下梯爾門。杜丁。他在我往北方旅行時替我負責上海新聞。

杜丁當時完全不曉得此信的內容，奉命將此信鎖在他所乘坐的美國船的會計員的保險箱內，船到香港下旋以後才拿出來，之後一封交付往馬尼刺與舊金山的飛鴉號機，另一封交由駛往英屬哥倫比亞溫古華的一隻加拿大太平洋航線皇后號郵寄。

兩封信都是寄交索爾茲格吉爾先生的，請他收到時分別電復，並於第一次電報中說明他是否願意將松岡的驚人建議送交或面交羅斯福總統。這種煞費匠心而頗富於戲劇性的小心是由於松岡先生的認真堅持，他深怕爲日本檢查員或間諜發覺，他又願區當時密佈於整個遠東的歐洲各國任何一國的特殊人員會得知他的大胆的計謀。這信最後定稿大半引用松岡先生的原語，並且得到他的許可的。

假若我是個咬指甲的，在這一切細節商就以前，我或者早就將指甲咬掉了，因爲松岡對他的設計還沒有一點吐露。最後，燃起一支異常猛烈的雪茄，關上他的起居室的所有門聲，通知電話總站不要打擾他，他開始作簡括而明晰的解釋。

「你看，阿本德，我怕我們正走向另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提議的是對某些黨派立即綏靖的辦法，是促使日本不對蘇聯與對美國作戰的辦法。我想解除海參威蘇維埃飛機與「滿洲國」及朝鮮邊境蘇維埃陸軍對日本的威脅，同時成就與美國的真正共同社會。所以，我提出一個互相有利的買賣——一個鉅大的土地購買。

「我所謂東西伯利亞，不僅是濱海省，而是貝加爾湖以東的東西伯利亞全部，日本在駐紮該地的大量俄軍，海參威的八十艘潛艇，沿我們的滿洲北方邊界的七百架飛機，以及待命於僅只二十四小時航程以外地點的另外九百架蘇維埃飛機的經常威脅之下，是再不能生存了。

「假若這種形勢短時間內不能改良，我們的軍隊會罷工的，除了我們天皇個人干預之外，沒有什麼能遏止我們的極端愛國份子，而且這一定也很困難。衝突出不了三年，我害怕還要早些，早到不及提防。這種戰爭就是世界戰

爭，並且照目前趨向看來，美國勢必成爲日本的敵人。我要盡人事以求避免，我們與美國作戰就是國家的切腹。」松岡作這次預言之後六個月，日本與俄國在「滿洲」國與外蒙古邊境腦門坎區域果然發生了大規模的戰事。日本官方承認日軍死傷一萬八千人，雙方都宣稱擊落敵機數百架。這是一九三九年秋天俄國開始入犯波蘭時日本提議休戰才結束了戰鬥，這次衝突由六月延續到九月半。

對於這點，松岡在他的建議中亂扯了一大篇，討論日本軍隊的缺乏訓練與「反抗精神」。他說，對德國軍事方式的景仰使日本走入了令人悲哀的危境，帝國內部「某與希特勒同樣可惡的東西」恐將迅速滋長，除非日本能與美國結成伙伴。

「我的意見是美國與日本提議聯合購買貝加爾湖以東的東西伯利亞全部。三十兆日金或許可以做成這件買賣，但是如有必要，也可投資五十兆，先付十兆日金，下餘的於三十年中分期償清。兩國互作担保，假如史大林如此要求。」

我打斷他的話說，此事有困難，尤其是美國國會方面，松岡表示同意。他反駁說，美國以前時常購買土地，並非完全得到國會同意的，他引證路易西安納、佛羅里達、阿拉斯加、菲律賓羣島、處女羣島的購買。他又力言他不是提議一種我們的傳統所禁止的「錯綜同盟」，僅僅是商業的伙伴。

「在我腦子裏的地區面積略多於一百萬方公里，」他說：「點然第二根雪茄，在我們中間地方攤開一幅大地圖，「北邊一半，」他向前傾斜，用鉛筆指點，「大半是地盤形成的苔原，有數處重要的森林，另一半大於滿洲，是農地，與加拿大的一樣肥美。有森林、鮮水與鹹水漁場、煤、鐵、金，在這裏堪察加或許還有油。」

「這個廣大地區只有不到二百萬的文明人口，其中八十多萬是被流放的哥薩克人與烏克蘭人。他們一定歡迎更換主人的。他們痛恨莫斯科，有一個秘密的組織，爭取自治，他們的首腦部設在哈爾濱，我們裝做不知道，因爲他們的動機與志向我們都很清楚。東西伯利亞的可居與可耕區域比滿洲還大，可以輕易的養活同量的人口，現在「滿

洲國」差不多有三千五百萬人。

松岡接著談論關於保證日本安全的緊要細節。「我也想過。」他說：「假若購買成功，華盛頓、東京與莫斯科可締結一個完全解除新邊界武裝的協定，從貝加爾向北向南全線，像美加邊界一樣，不許建設堡壘與駐紮軍隊。」細按我寄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件的內容，我發現假使購買能達到目的，松岡對於處理這個龐大區域的計劃將作如下的擴大。引用松岡的話，我寫道：

「美國和日本可共同派遣一小支武裝憲兵維持此購得區域的秩序，或由日本單獨派遣這種軍隊，美國人任監察與顧問。一旦合夥的基本原則被接受了，這種細節很容易解決的。整個西伯利亞缺乏終年不凍的港口。我們可以建築南北行的鐵道與公路，經滿洲與朝鮮邊界將物產南運，並且，可以聯合給予蘇聯輸入與輸出烏拉山脈以東地區各種貨物的運輸權。」

松岡提交白宮的對局勢的解釋接着說。

「我這樣看：日本必須解除蘇俄東西伯利亞的威脅。訴之戰爭將花費三十或四十兆日元，還不計及雙方不可計算的生命財產損失——與歐洲的必然牽入，世界大戰，以及美國與日本的陷於敵對。

「我認為，無論就政治或經濟觀點論，購買這塊土地都算上策；美國成爲伙伴，於是免除了生命財產的損失與財富的浪費。這種台夥又可結束美日海軍的造艦競爭。而且，在二十五年以內，雙方都可獲得大量財富。至於開發、投資、移民、管理等等問題，是可以很容易地公平解決的。」

信中直接引述松岡先生語句的部份就這樣結束。但是我接着寫給邁爾茲柏吉爾先生下述各語。

「松岡問我的意見，我告訴他我認為這是個狂妄的計劃，而且非常坦白的說，我認為沒有成功的可能。他問我爲什麼抱這樣悲觀的見解，我告訴他。

「第一，鑑於日本之在滿洲與中國的藐視條約，與鑑於目前繼續使佔外國權利，我相信美國人民不會視日本爲

忠實或可靠的伙伴。於是他宣佈假若這件交易成功了，日本準備在中國切實進行門戶開放政策。

「此外，松岡說，假如他出任外相或首相，他將設法使日本軍隊由華南以及揚子江流域撤退。我於是提到山東省，他說日本願意撤出這個區域，但只是勉強的，以為獲得美國贊同東西伯利亞的購買計劃的交換條件。

「但提到華北問題時，他強硬起來。他說，日本永遠不願也不能退出河北、山東、察哈爾、綏遠等省，換言之，他們要保持北平天津區域，山西煤礦，內蒙古境內橫度察哈爾及綏遠的鐵路，以及此區域內的煤鐵礦藏。最重要的，日本要保留沿蘇維埃統治的外蒙古的兩側的軍事據點。」

再談我給塞爾茲柏吉爾先生的信吧。

「第二，我告訴松岡這種購買的交易會破壞東京柏林羅馬反共軸心。他似乎不懂得，我乃告訴他，特別是希特勒對於蘇聯得到十兆日元的巨款，一定大為震驚，尤其是蘇維埃東部邊疆的解除武裝因而允許史達林轉移其鉅量西伯利亞陸軍與大隊空軍到蘇維埃的歐洲邊疆。」

這事正當希特勒公開指責蘇維埃與共產主義是人類敵人的時候，離一九三九年八月柏林與莫斯科締結協定，希特勒得以任意進攻英法還早將近九個月。

這種看法似乎幾乎立刻擊暈了松岡。他坦白承認他未曾考慮過交易的這一方面。然而他曾經仔細想過對英國與法國的關係，相信兩國都會誠心默許，因為日本的不休止的擴張主義勢必在東西伯利亞有好多年的忙碌，「南進」立即會鬆弛下來，不久且必告終。

深思與沈默幾分鐘之後，松岡開朗了。「我們能夠並將要說服希特勒的，我想到了一種方法，你莫要顧慮這點。」但他未加解釋，就他任外相後為日本所作許多食言舉動而論，我猜不透那時他的打算究竟是什麼。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松岡將他的野心的提議告訴我的那天，用來說服我的其他辯辭，還有蘇聯必願得到美國貨物，食品與機器，以為付款的一部分。他說：「日本工廠那時都忙於製造軍用器材。所以美國商業界必將因物物交

換而大量賺錢，當時美國國內極其嚴重的失業數字必將急速下降。

自然，美國政府永遠不會考慮任何背叛中國而使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四省的提案。但是假若這種協定真一成了事實，世界史必將大為改觀。

如果史達林能够獲得十兆日元的巨款，轉移其西伯利亞軍隊到蘇聯的歐洲邊界，他一定不會在一九三九年與希特勒締結使德國能够在波蘭滅亡之後只在西線作戰的條約了。而現在一定不會有勝利的日本軍隊佔領菲律賓羣島、印度支那、暹羅、緬甸、荷屬東印度羣島、英屬馬來亞與新加坡之事了。

松岡的提議於一九三九年初由塞爾茲柏吉爾先生秘密交給羅斯福總統。在行政界與國務院內部發生了感情的騷動，問題只是直到當時為止，與前數十年，松岡是極端親美的。他在一九四一年春天聲明他「多年」來拖着與德國結盟的希望顯然是虛偽騙詐的，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他洩露給我，他認為當時日本傾向與德國站在同一地位是絕大的錯誤，他稱贊這種傾向的日本軍人為「該死的要劍的極端愛國份子」，他希望與美國合夥能有效阻止這般軍人，而之後他變成他們的心甘情願的工具與口舌。

爲什麼華盛頓簡直未曾重視他的提議，我不知道。或者總統與赫爾國務卿覺得無須回答任何日本領袖的言辭或詰問吧？而就後來事件與許多日本背信的事實看來，這無疑是聰明的決定。

我的傳達松岡關於東西伯利亞提議的信正式交給了羅斯福總統，他保留了四天，之後不加批評的還給了塞爾茲柏吉爾。總統顯係決定由官方作覆，因爲塞爾茲柏吉爾先生間接由香港寄給我的信是完全未受委託的，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松岡後來從當時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克拉克·格魯得到過白宮的答覆。

松岡隱居於東京西北一所別墅內，他必定注視着戰爭的進展，時而雀躍歡騰，時而憂鬱疑懼。馬尼刺、新加坡、爪哇之戰必會使他非常快慰，但是珊瑚海與中途島之衝突必定在他的腦子裏激起了疑慮與焦急。並且，在他等待與注視時，他一定計劃重返公共生活，並已着手草擬計劃，破壞聯合國的主要戰爭目的，未來侵略的保障。

第十八章 賭徒近衛

儲備協助談判妥協的和平的另一日本政治家兼政客，是曾三度任首相的近衛文麿親王，所有日本領袖中最不穩固最不可靠的人物。他過去的政治色彩至爲複雜，與各黨各派都發生過關係，而他之於珍珠港事件之前幾個月下野，時間也甚爲恰適，所以日本人於戰事失敗，企圖逃避聯合國勢將提交他們接受的獨斷的條件時，一定會將他寫作「愛國的自由份子」推戴出來的。

美洲與歐洲對近衛親王的權力與地位從未估計的正確。他是一個神祕人物，侍候軍人很是伏貼。他的家系差不多和皇室相等，可是他的家產不多。多年來他就被目爲日本宦海的「未來名人」。

各黨各派都拉攏近衛，要求他的合作或公開入夥。一般人認爲他是反對軍人的自由份子。但事實上早在一九三五年他與軍人政權就有了秘密勾結，從此被軍人認做他們的「囊中物」，一個有地位的日本將軍一九三六年有一天在瀋陽這樣告訴我。

一九三七年夏初近衛親王第一次出任首相時，紐約泰晤士報拍電報到上海給我，要我寫一篇一千五百字的文章，討論這位貴族昇任首相職位對日本與中國的關係的影響，用信件寄去。於是我寫了一篇論文，簡潔了當地說，以爲近衛是愛好和平份子的一切觀念都是極大的錯誤，他的升任政府首長表示軍人集團中的開羅主義者準備進攻中國，戰事在秋天以後一定會爆發。

這篇文章刊登於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的紐約泰晤士報上，與當時歡迎近衛獲得權力的文章與社論大相逕庭。這張泰晤士報的特刊銷路很好，我是七月底在天津夜總會讀到的，其時正當日本飛機轟炸此城，將南開大學燬爲灰燼。一個多星期之前，七月七日晚上，日本人開始行動，在北平城郊廣溝橋進攻中國人。

近衛親王具有神祕的性格，異乎尋常的缺乏意志力與驅策力，但是像許多優柔寡斷的一樣，有時他是特別固執的。在他三次首相任內，他害過不少次數的「政治病」，以為靜休的藉口，好讓陸海軍中激烈政黨份子相互鬥爭，解決爭端。候勝利的方向趨於明朝時，近衛就在頗可注意的喜躍下康復起來，宣佈其決策，而對勝利一方表現忠誠。

近衛不很康健，時常害傷風與近乎流行感冒的徵恙。每當宣佈首相遠和，不能見客時，種種猜測就會攪動東京——他是真的生病，還是有了新的內閣危機待解決呢？

雖然近衛心甘情願的作軍人集團中最激進分子的工具，他的個性生來好時常翻悔，至少有兩次他祕密地想妥協地結束中國戰爭。其中一次他想利用我做他派往蔣介石將軍那裏的密使之一，那時他不但願意並且瘋狂地急於背叛幫助他獲得大權與仍支持着他的陸軍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佔領南京之時，日本人認為他們已經戰勝了。他們深信中國的抵抗已經擊破，中國的統一已經崩潰，所以在猛攻中國首都的勝仗以後，他們無須延長時間，以休息與整編他們的疲勞之師了。

同時，蔣介石將軍將中國政府搬到了漢口，不歇歇地重整軍隊，並由廣州香港經過粵漢鐵路輸入戰爭物資到華中。

夏初，局勢漸漸明朗，日本將沿揚子江發動新的攻勢，目的在摧毀中國軍隊並佔領漢口。他們的陸軍由陸路前進，其海空軍隨即猛攻揚子江上阻礙直接深入內地的各個要塞與砲台，他們佔領了安慶，他們佔領了九江，中國的戰時首都危在旦夕。

是在這次戰役的這個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一個叫鈴木文治郎的日本人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鈴木先生在美國不大知名，雖然他曾經旅行美國與歐洲。但是在日本他是一個卓越的國民，幾家東京橫濱日本報紙的大股東，著作家與註疏家。

有一個半鐘點，鈴木先生以驚人的坦白談論日本在中國戰事的代價與進展，帝國軍人的貪婪與腐敗。他們繼續不分階層的踐踏所有中國人，甚至於否認他們有自衛的權利等等殘暴而笨拙的行爲。我以為他一定就是他所指責的軍人集團的祕密工作人員，想套出我個人的意見，所以我的回答頗爲謹慎。最後，我告訴鈴木，我很抱歉我必須去赴一個重要的約會，只得結束這次晤談。

他齊慌了。「但是我有一件緊要而十分機密的事情要與你長談。」他終於突然說了出來，「我是以近衛親王私人代表的資格來的，這，」從他的襯衣內面拿出一小包紙，「是他的英文與日文的任命狀。」

「爲什麼？你的任務是什麼？」我問，於是鈴木說出下述話語，使我大喫一驚。

「首相想結束戰事，他說佔領漢口不過是軍事的自戕，他想在中國新都陷落以前，瞞着陸軍談判和平。」

鈴木不肯多說，堅持他至少要有兩小時與我單獨在一起，以便詳述他的計劃。我們商定當晚晚餐後在我的寓所相會。他要求在這個時間，我把他的任命狀交給當時無任務的日本駐華大使谷先生或日本總領事看看，以證明其真實。我都做了，曉得日文的是近衛的親筆，說鈴木擁有他的完全信任，轉達「萬分重要」的口頭消息給我。

當時——一九三八年十月——大部分世界還在驚異所謂新外交技術——就是，張伯倫飛往慕尼黑會晤希特勒，以贏得「我們時代之和平」，鈴木先生那天晚上到我的寓所來時，他使我吃驚的一開始就說張伯倫的觀念至少是一年前的舊物，近衛在一年多以前就計劃飛到南京，與蔣介石將軍當面談判締結一個中日協定。

在我第二天，十月十四日，寫給蔣將軍的信中，有幾段是直接引用鈴木文治郎的：

「去年七月北平附近發生首次衝突時，我往晤廣田先生（當時的外相），他很久以來就是我的親密的私友，與他計議恰如張伯倫先生上月中所爲的。換言之，我要廣田先生電達蔣介石將軍，表示他願意飛往南京，當面會談，嘗試解決一切中日的爭端。」

「廣田先生贊同了這個意見，並以之與近衛親王商討，首相也認爲不錯，但提議他自己作這次飛行。這裏後來

於內閣非軍人閣員秘密會議中提出討論，未得通過，理由是日本似乎想求妥協，未免「太丟臉」。

這是近衛親王第一次企圖改變政策與背叛軍人集團的明證，他們在他們深信的迅速征服中國的時期中助他獲得政權，以爲他們的工具與首相，這位首相默許了在蘆溝橋發動戰事之後，他對於他促使帝國所採取的步驟的是否聰明，漸漸氣餒與懷疑起來，而急於飛往南京與蔣介石將軍磋商持久的和平，可能是某個非軍人閣員將他的意念告訴了陸相與海相，而他們阻止了這個獲得「我們時代之和平」的亞洲復本。

近衛的第二次背叛製造他的軍人的行動，構思非常有趣，有如國際間諜的電影戲劇。下面是計劃的詳情，用的是鈴木一治郎的口氣，十月十三日晚上他告別之後，我記在我的手冊上的。

「近衛親王知道你是委員長的朋友，並且相信他對於你認爲可行的任何提議必將給予認真考慮。你已驗過了我的任命狀了，現在我希望你陪我到漢口去，在我呈送我們首相正式任命狀與日本與中國媾和提議的文件給蔣介石時，你爲我作見證，首相想在陸軍成爲對日本政府之存在的致命威脅之前，阻止其征服的行動。」

「他怕，假若陸軍佔領了漢口，中國被征服了，日本本身將陷於赤裸的軍人獨裁的局面。他怕這就是帝國的最終崩潰，因爲征服了中國之後，我們的軍人必向美國與歐洲列強在遠東各地挑戰。他想不到任何代價以求避免，日本人民厭倦這次戰爭，假如近衛親王能夠突然宣佈一個合理的和平協定，陸軍是絕不敢延長無意義的戰爭的。」

說到這裏，我打斷了鈴木先生的話，提醒他上海到漢口所有交通都切斷了，除了取道香港。我問我怎樣能將近衛的言語轉達給蔣將軍，假若委員長願意接見我們，他和我又怎樣能去漢口？

這時，所有去中國內地的鐵路，除了粵漢線之外，都因戰事而停頓了，而且揚子江兩岸的戰鬥，加上日本海軍在這條大江上的行動，使江上的交通也不可能了。我向鈴木指出僅僅寄送他的原議就有困難，因爲取道香港與廣州的郵件既慢又不可靠，而上海與漢口間的電報與無線電交通不是毀壞就是完全操在日本檢查官的手裏。

假若將提議拍電到香港，再由內地電報送到漢口，則很少有保持這次行動秘密的希望，因爲日本到處佈有特務

人員與間諜，並且具有各種密碼密本以資應用——甚至於美國海軍與遠東外交使團的幾種密本。

可是這些困難似乎在東京早就考慮過了，因為鈴木答稱：

「假若委員長肯接見我，我計劃你我一道飛往漢口或其他他所指定的地點。近衛親王將替我們安排一架上海北平線的民航機，由日本政府供給，假若委員長不同意這個辦法，他可以派遣任何他自己的中立國的飛行員——如美國飛行員——駕運我們到內地去，此機塗上他提議的任何記號，以便飛過中國航線，降落中國機場，而不被射擊。」

「至於我呢，我願意在飛行與在漢口勾留期內遮上眼睛，除了像在委員長面前那樣的時候。在那裏的期間，我自然不會希望有行動的自由。我們計劃過，此機啓飛時指向北平，離開日本防空哨之後，轉向西駛，前往漢口。我們一定可以佈置妥當，務使日本監視哨和聽音機發覺我們改換航程，派機追趕我們時，追趕不上。」

「假若不同意這個計劃，我願意與你乘美國船同去香港，再乘美國或中國飛機由香港飛往漢口——完全照委員長的意見。」

我告訴鈴木，飛行的佈置似乎週到，但是較大而根本的困難在如何將和平磋談的建議交給蔣將軍。我指出，日本軍隊正沿江迅速推進，中國戰線有幾處出現逐漸動搖的象徵，而取道香港廣州送一封信到漢口至少要一週或許十天，但是鈴木對這個反駁也預備有回答。

「我們至少有六個星期，我們的陸軍在十一月底以前不能佔領漢口的，顏露爾海軍上將在上海，他的旗艦阿格斯達在此間江中，必定每小時與漢口美國砲艦有無線電來往。紐約泰晤士報有一個人人在漢口，顏露爾上將顯不願意用密碼將這個提議拍交泰晤士報代表，親自交給委員長？」

於是我告訴鈴木先生，我覺得非要紐約泰晤士報知道與同意，我才能自由參加這次談判。第二天早上有一艘輪船開往香港，我答應寫一封信給我們的香港通訊員，請他將我附入的電稿拍給泰晤士報總經理。

泰晤士報同意我參加這次計劃，但是當時的我們的亞洲艦隊總司令哈利·H·顏露爾上將不答應由他的兵艦以無線電轉送這必須的實信。一個理由是，他相信日本陸軍有他的電碼本，假若他的旗艦不讓他們知道就轉遞了和平提議，他們必將採取報復行動，這種報復行動或將釀成日美戰爭。

第二天早晨，我與顏露爾上將在他的旗艦上辦公室內作了一次密談，我將全部近衛的建議給他看了，他引述了幾個理由，說明爲什麼他不能核准美國海軍無線電台作這種用途。但是最後他勉強允許漢口的美國砲艦拍一封一個字的無線電報給他轉交給我，這個字是「可」或「否」，好讓鈴木與我知道蔣介石將軍是否答應接見我們，並聽述近衛親王的和平提案。

上將陪我走到舷門盡頭，正當我預備下去到停在江中等候就我離開阿格斯達到黃浦灘的座艇中的時候，他放他的手在我的肩上，用一種低到站在旁邊的艦上官員不能聽見的聲音對我說：

「阿本德，我希望你不要作這次飛行，我曉得這是一件驚人的冒險，你可以發一筆大財，但百分之九十九的機會，日本陸軍會事先知悉這次冒險，你們的飛機不出上海一百公里就會被擊落。不然，你回到此地來之後也會被槍殺。過細想想。」

我寫到漢口的信由海道寄到香港，於十月十七日到達這個英國港口，十八日飛往漢口，紐約泰晤士報駐漢口人員第二天將近衛提案當蔣夫人之面呈交蔣介石將軍，信封是黏好的，他毫不知道其內容，十月二十日，一個字的答覆到了，顏露爾上將在電話中告訴我，是「可」。

我馬上去找鈴木先生，他當晚乘船回日本，去取得首相的正式任命狀，與近衛的妥協的祕密條件。

但是和平的行動發動的太晚了，十月二十五日中國的漢口防線崩潰，二十六日晚上日本軍隊佔領了揚子江傍的漢口、武昌和漢陽三城市，蔣介石將軍，他的政府，和多半他的將軍或者飛往重慶建立中國新都，或者登上擁擠悶熱的輪船在日本飛機槍林彈雨之下沿江上行。

近衛親王缺乏做首相的決斷與毅力，所以在珍珠港事件前數月軍部請他下了台，另以米內將軍充當政府首長，不錯，近衛與他的外相松岡洋右甘願導使日本正式加入騎馬柏林軸心，可是現在他們的功用已經完結了，顯然的，從日本人的觀點，活動名單上的將軍應該担任戰時首相，近衛、松岡之流的政客在軍人獨裁與事實上的戒嚴令時期內是無大用處的，但當談判和平的時間到臨時，他們充當設計者與談判者的功用還是可能變成很大的。

以談判者論，近衛親王與松岡一樣狡猾而不可靠，有害於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作官時他甚至不忠於擁戴他為政府首長的黨派，充當和平談判者，他必定預備背叛和他談判的人士，違背他私人的諾言與公家的委託。

第十九章 不能有軟性的和平

沒有人真正相信火會焚燬他的房屋或企業，但是謹慎的人士都擔保着火險。

發動戰爭的國家通常相信在他们所進攻的民族能够聚集全部力量之前，他們就可以獲得勝利。但是謹慎的國家，善於安置萬一戰敗的保險，這種保險的最好方式是在他們敵人的領域內發動一種以取得軟性和平爲目的的巧妙宣傳。

歷史可能重演，也可能不重演，宣傳却是可以的。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美國人民聽到一種聰明的宣傳，認爲我們不是和德國作戰，我們唯一的真正的敵人是「罪惡的凱撒與他的軍閥們」。我們首肯了這種宣傳，得到了勝利而失掉了和平。這是我們陷於當前狀態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日本和德國在我國傳播着同一種類的針對萬一戰敗的宣傳。數量一月比一月加多，論調一月比一月寬泛。他們發表了許多談話。寫作了許多書籍和論文，以說服美國人民：我們不是對日本，只是對「罪惡的日本軍閥」與應該對偷襲珍珠港事件負責的「燥進的青年軍官集團」作戰，柏林發生相似的宣傳，他們說，這次我們不是對德國人民，而只是對「希特勒與他的罪惡的納粹領袖們」作戰。

這批以反基督教自負的納粹的與以非基督教爲榮的日本的宣傳人員是絲毫不講道德的，他們漸漸利用聖經。近來郵件中傳遞着驚人數量的半宗教的宣傳品，提醒聖經告誡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對征服了的敵人寬大，滌清我們心中的憎恨，讓上帝來施懲罰。

美國的受敵人津貼的宣傳人員工作地域不只限於大城市，而且深入農村區域甚至美國人口稀薄的地帶。現在尙在拘禁中的這類待遇很好的宣傳人員中，有一個就是在人口僅有七百八十八名的凡蒙特小鎮被捕的。

這使我們想起皆口豐牧師案件。口豐生於日本，一八九七年來到我國，還是十四歲的小孩子。除了一九三八年內有三個月時間他曾旅行日本、中國與滿洲之外，他繼續在此地住了近四十五年。本世紀之初，他接受了完備的教育，上過四個著名大學——味吉尼亞、南卡羅來納、曲安夕法尼亞、耶魯。之後他到奧伯林上研究院，得到一個神學的學位，一九一〇年受任爲國會的牧師。

口豐曾在伊利諾斯州且斯特菲爾地方教會任過一個時期的教士。之後他成爲却厝瓜的宣講，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他在西方中部各州從事自由公債與紅十會運動。一九二一年他與一個在凡蒙特的格洛福爾出生長成的美國女子遇見與結婚。他們在格洛福爾定居下來，在那裏生了兩個女兒。一九二七年口豐擔任凡蒙特的皮羌地方一家教堂的教士，繼續任職，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後他回到格洛福爾擔任暫時宣講，直到十二月七日他被登記爲敵國人民。

大約在珍珠港事件之後一個月，我在柏林教自由新聞上讀到一篇兩欄的口豐會見記，心下大不以爲然，這裏是那篇會見記裏重要的幾段：

「日本人民並不希望這次戰爭，他們是被掌握着政權的少數軍人派系強迫加入的。

「偷襲珍珠港一定是一般掌握政權的軍事集團中年青暴燥份子的作爲。

「說日本人民是天生好戰的民族，是不正確的。」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幾個月，這位口豐陰險地工作着，鼓勵輿論贊同美國試爲中日間的調解人。在他爲紐約連州 *Monitor* 所寫的文章中，他說：

「愛好和平的人士很多，其中有些是具有基督教頭腦的，他們對日本在中國的行爲曾提出無數次抗議。我不懷疑他們動機的誠懇與善意，然而我很失望沒有任何調解中日事件的呼籲。和平愛好者對於補綴兩大國間的裂縫一事更少友誼的努力。

「認爲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而與中國共同反對日本，是不能使遠東獲得調協，產生更高尙的生活

的。他們現在可能分開，但他們是被一種鎖鏈不可分離地連繫着的，每一個都有其重大任務待完成。

「美國既對亞洲大陸沒有領土野心，爲什麼不能在這國際不幸事件中担任調解者呢？讓美國對中國和日本這樣說吧；「我們希望在這個西方大洲上建立更完美更安全的社會，沒有壁壘，沒有武備，各民族各人民互助共存。你們在東亞也可以這樣做，你們是鄰邦，你們同文同種。」

訊問揭穿了事實，一九三八年由日本回來後，口豐到處談論、宣講、辯護日本的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構成一種法西斯蒂的哲學。

這一切是惡意的宣傳，所以我寫了一封信給柏林敦自由新聞的編者，並要求他刊登出來。信中我指出口豐的論斷在國內被敵國宣傳人員廣泛引用着。

這封信引起了一陣子責難。我的信箱裏塞滿了譴責我批判一位牧師與「無保護的外國人」的信件。有一封信刊載在自由新聞上，是威爾滿州費爾法克斯一所教堂的牧師寫的，稱我爲「自命的捉妖者」，並且公然暗示我大約是「代表擁護侵略政策的上次大戰期間形成的一千個富翁工作的領薪的或義務的辯護人」。

這件不關重要的地方風浪不久就平息了。但在兩個月以前口豐牧師由總統的拘票而被捕了，控告他是敵國人民，危害美國的和平與安全。主管這件案子的聯邦調查局代表亞培爾·哥尼宣佈，口豐多年來就以日本帝國政府的宣傳代表的資格經常按月向日本駐紐約總領事領薪二百五十美元。

口豐當宣傳員的津貼等於他在威爾滿鄉村當宣講所賺的新俸大約兩倍。在他的威爾滿家中，聯邦調查局人員沒收口豐的文件、通信、賬簿與日記的時候，他們還發現了一架很值錢的短波無線電收音機，一副攝影機和大批軟片——總統命令嚴禁外國人保有的物品。

口豐所從事的這一種宣傳，不僅是對日本戰敗的一種保險方式，而且也是「軟化」美國人民，使我們自願製造軟性和平的一種辦法。內容與一九四一年夏天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海上相會時草擬的大西洋憲章所列舉的聯

各國戰爭目的恰恰相反。

大西洋憲章允許，一切國家，戰勝者與戰敗者，公平得到世界戰爭物資，允許一切被奴役的民族，有決定他們本身政治前途的權利，並宣佈一切侵略國家和可能的侵略者必須解除武裝，這是我們所敢於在這次大戰終結時承認的最「軟性」的和平了。任何「更軟性」的條件的含義就是我們將又一次贏得勝利而失去和平，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後，日本和德國又會試驗他們的命運。

二十年來，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受着這種有關日本的宣傳的欺騙。當日本於一九三一年開始強佔滿洲的時候，他們告訴美國不要採取任何認真的舉動，「給金融家、知識份子及自由份子以機會得謀左券，而賜開軍閥。」好，美國給了他們那般所謂日本自由份子十年時間。而在十年終了，美國必須在珍珠港附近掘土埋葬二千八百多個美國的死難的水手和士兵了。

這次戰爭不是對「日本軍閥」的戰爭。是對日本，其國家民族的戰爭。半個世紀來他們仗征戰劫掠而生活和擴張——每次征戰所獲劫掠品用作下次開疆拓土的戰事之用。

口實案件本身並不特別重要，但是證明這種軟化的宣傳之被認為值得不惜金錢在窮鄉僻壤推行，却是非常重要的。證明我們的敵人不惜利用我們的教士和教會散播他們的為獲軟化的和平的宣傳，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很明白表示我們假若不不斷地警惕，我們很可能獲得勝利而失掉和平——又一次。

第二十章 文字的烟霧

假若立即宣佈一個專為亞洲的戰後計劃，數億亞洲人民對民族主義與自由的要求及對帝國主義的憎恨，可能轉變成聯合國的極大財寶。大西洋憲章，雖然其中數則包羅無遺，是不够用的。所急切需要的是太平洋憲章。

這次戰爭的勝利，全仗飛機坦克的大量生產，也全仗世界大眾的支持。我們已經沉默過於長久，這種沉默的結果使一部分東亞細亞人民對我們的誠意失掉了信任。他們開始懷疑我們是為一種改頭換面的帝國而戰，如果戰勝了，我們對於黃種與種人民僅將於我們所不敢不讓步的方面給予讓步。

這種不幸情況的形成，一部分是由於日本的這次是種族戰爭，膚色戰爭的宣傳。但是久久不願對目標與宗旨作明白的宣告幫助了日本宣傳的傳播與接受，雖然事實上中國，最大的亞洲國家，是堅決地反軸心的。我們應當終止一切猜疑與猶豫，清晰明瞭地說明我們的宗旨；盡可能的與所有現為日本軍隊佔領的地區內的有政治意識的團體通力合作；經常利用無線電廣播，偷運的文件，我們飛機上投下的傳單，與潛入敵人佔領區域的工作人員，對被役服人民作口頭宣傳，反覆申述我們的宗旨，以造成普遍的怠工與遊擊戰，嚴重削弱日本的力量；正式宣佈戰爭目標，允諾平等待遇前此被壓迫與落後的人民，以解除現在充滿了失望，漠不關心，或者真正不信任的各地域內的潛勢力。必須有共同的了解，和諧的目標與相互的信任。

在我們新近參加的這次長期戰爭中，已經有數百萬中國人民與旁的亞洲人民為自由付與了他們的生命。沒有我們的助力，愛好自由的亞洲人民不能贏得戰爭，沒有他們的助力，我們也不能贏得戰爭。假若我們因他們的協力獲得勝利而在戰後世界的設計上使他們大失所望，我們不會得到持久的和平的。澄清這些爭論，開始為周知同意的目標盡力工作，現在是時候了。

美國必須在這件事中採取領導。英國在印度及亞洲各地受着懷疑甚至於憎恨，荷蘭是有害關係的份子，而聯合國中再沒有一國在遠東有領袖輩倫的威望。真的，這些國家中再沒有一國有力量勸導帝國主義放棄其對亞洲人民的特權，或者如果需要武力時武力強制執行。

公開討論在盟邦間運用威脅或武力似乎是不智的，不過，假若萬一任何一個有害關係的國家堅持恢復東亞的戰前殖民地情狀，或拒絕同意一個寬厚的太平洋憲章，今日接濟與協助世界一半軍火的美國一定只有發表聲明，提請注意這個事實，以得到默許了。絕不能容許任何具有私自利益的國家固執昔日的「權利」，或堅持永遠延續昔日的錯誤，而犧牲亞洲人民對聯合國的擁護與合作。

有些地方這樣辯駁，在我們的船舶還在被敵人潛艇擊沉與幾處主要戰線上我們仍然佔着劣勢的時候，宣佈戰後計劃是不合時宜的。有些地方又認為，我們全副注意力應該集中於如何贏得戰爭，思考和平而耗費時間是愚蠢的行為。

統一與邊境的合作有助於贏得戰爭，而保證公正的和平將使對聯合國戰爭目標的擁護增加。沒有比懷疑最終目的更能敗壞士氣了，不幸的，這種懷疑業已廣佈於全球。

關於戰爭目標與和平宗旨已經發表過無數的言論。實際上我們的戰爭目標與和平宗旨就是被文字的烟霧弄的模糊不清了。動聽的宗旨，含糊的承諾，曖昧的保證的宣言，可以也不可以應用於特殊情況——這些文件迷亂了重大的爭點，急切需要予以澄清。

羅斯福總統較任何其他聯合國領袖作過更多的聲明與保證。但是只於大西洋憲章有關部分得有邱吉爾首相，威廉明婦女王及其他聯合國領袖明白承諾支持所有的保證，赫爾國務卿與副國務卿威爾士也申述過目標與宗旨，而沒有得到其他國家外交部的反應。

今日的企望的世界記得很清楚，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另一位美國總統對戰爭中的世界作過諾言，這些諾言之後

被美國擯棄了。要問了，有什麼能够担保「四大自由」與其他諾言——甚至於大西洋憲章本身——最後不會遭遇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原則與其他宗旨的宣言的命運呢？

不管誰是我們戰爭期中的友邦，誰是我們聯合國勝利以後構建和平時的友邦，却似乎是有點問題的。

雖然有大西洋憲章的諾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邱吉爾首相在倫敦的演說中坦白陳述，他之接受首相的職位不是爲了瓦解大英帝國。

這個宣言很有意義的緊接着外交部議會次長李查·紀斯敦。勞在下院的聲明，就是，英國無意在戰事結束以後將香港交還中國。

關於放棄帝國主義與實踐大西洋憲章對於給予各民族選擇他們自己政府的諾言，因克洛弗特勳爵旅長的宣言而使情勢更加複雜了，他是英國聯合作戰部議會次長，對下院說：「我們的目的是將侵略者驅出馬來亞與緬甸，恢復這些不幸的國家的安樂與自由，我們不但不離開，而且有機會將這些國家由愚昧升到了解，用我們自己的才智，在我們自己的時間，終有一日使他們能够自我表現，依照我們的榜樣，導使世界進入一更完美更快慰的生活。」

然而，在東方的美國遠征軍甘願爲恢復不列顛帝國主義戰鬥嗎？

與上述英國聲明針鋒相對的是約瑟夫·史達林在蘇俄成立第二十五週年紀念會上發表的斬截的言論他說：

「英蘇美聯盟的行動方針是，種族排斥行爲的廢止，民族的平等與他們領土的完整，被奴役各民族的解放以及他們主權的恢復，每個民族都享有依照自願的方式安排自己的事務的權利，會受苦難的各民族予以經濟援助以及幫助他們得到他們的物質的幸福，民主自由的恢復，希特勒式統治的消滅。」

這種言論似乎使美國與蘇聯的步調趨於一致，不過倡言廢行大西洋憲章的保證，而且要實踐「四大自由」的諾言。處於相反立場的至少有英帝國的保守黨發言人，假若不是英國本身。這種糾葛是很嚴重的。

自從古代專制政府以來，有無國家曾經秘密受託像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大家認爲他離開作非常需要的

休假與華鈞旅行時付諸美國的那樣包羅無遺的保證與責任，是大可懷疑的。會晤邱吉爾於紐芬蘭的撲拉新息亞灣，他與英國首相制定了大西洋憲章，簽署之後，公佈給震驚的世界。

這個文件托付美國與大英帝國實行社會的與經濟的世界革命，除了承諾拿出兩國全部資源以擊潰軸心之外。雖然美國大眾在大西洋憲章公布的時候沒有認清，實際上這是聯合對日宣戰，因為第八點說，除非準備解除侵略國家的武裝，太平洋不能保持長期和平。

下面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華盛頓倫敦同時發表的標題大西洋憲章的聯合宣言的全文。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及英帝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爾已在海上某地會晤，雙方之政府要員及海陸空軍高級長官均出席參加，當時即據租借法案以軍火供給英國及其他一切反侵略國家與各國武裝部隊之全部問題重新提出，予以檢討。英供應部長卑維勃魯克亦參加各項討論。卑氏即將前往華盛頓，與美主管當局繼續研究此項問題，美總統與英首相共會談數次，當時雙方均感覺希特勒統制下之德國政府及其他與希特勒政府有關之各國，現時所採取以武力征服世界之政策。對於世界文明危險極大，故對於兩國應以何種辦法保障其本國之安全，應付此項危險，均互相通告，同時并決定作下列之宣言。

聯合宣言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英帝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爾會晤之結果，咸認為有將兩國之國策共同之點加以宣布之必要，因為彼等認為根據此項政策，世界之局勢有改善之希望。

「(一) 兩國不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或其他。

「(二) 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

「(三) 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

「(四)兩國在適當尊重其現有義務之原則下，將力使全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不分勝負，對於其經濟繁榮所必需之原料及貿易享受平等之待遇。

「(五)希望促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勞力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

「(六)待納粹之專制宣告最終之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之保證。

「(七)所有各民族，應可在公海及大洋自由來往，不受阻礙。

「(八)兩國相信：全球各國無論為實際原因或精神上之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蓋國際間倘仍有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軍軍備，致在邊境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和平勢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軍備之解除，實屬必要，同時，兩國尚試行一切切實之措置，以減少愛好和平各民族因軍備關係所忍受之重大負擔。

佛蘭克林·D·羅斯福。

文斯敦·S·邱吉爾。」

一年之後，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羅斯福總統，紀念大西洋憲章簽字的第一週年，拍了一封電報給邱吉爾。總統的電報中有這些話：「我們重新確定我們的原則。它們將帶我們到一個更快慰的世界。」

不知邱吉爾是否也曾拍電到美國重新確定大西洋憲章，華盛頓沒有發表這個事實。倫敦報紙雖以顯著地位刊載羅斯福的週年聲明，而未曾發表英國官方任何類似的文件。

大西洋憲章至今仍為聯合國對戰爭目標正式採用的唯一宣言，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二十六國的領袖或正式代表在華盛頓發表下述聯合宣言。

聯合國宣言

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中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古巴，捷克斯拉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希臘，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印度，盧森堡，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南非，南斯拉夫聯合宣言。

本宣言簽字國政府

對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國總統及英國首相聯合宣言，即大西洋憲章，所包含之共同目的與原則，業經予以贊同，並為尋於適當生活，自主獨立，與宗教自由，及保全其本國及其他各國之權利與正義起見，完全戰勝敵國，實有必要。同時，各簽字國家正對企圖征服世界之野蠻與獸性之武力，從事共同奮鬥。爰特宣言如次：

（一）每一政府承允對於與之立於戰爭狀態之三國同盟分子國家及其加入國家，使用其全部軍事與經濟資源。

（二）每一政府承允與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合作，並不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與和約。

其他國家可加入上述宣言。

在一月二日到十一月一日期間，又有六個國家或流亡政府對軸心宣戰並簽字於聯合國宣言。這幾國是，巴西，厄瓜多爾，阿比西尼亞，戰鬥法國，墨西哥與菲律賓，總數達到三十二國。

羅斯福總統的著名的「四大自由」一般也承認為聯合國的主要戰爭目標。然而，就記載言，這四大自由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給國會的咨文中闡明的，比我們參戰差不多要早一年。這篇咨文有一部分說：

「我們必須全力支持世界各處抵抗侵略的一切堅忍不拔的人民。

「我們必須認清，道德的準則與我們本身安全的考慮，永遠不會允許我們接受侵略者指定與綏靖者贊可的和平。」

進一步列舉美國可能接受的和平條件，咨文以為下述四點是不可少的：

一、言論與發表的自由——世界各處。

二、宗教崇拜的自由——世界各處。

三、由於經濟的誤解，免除困乏的自由——世界各處。

四、由於全世界的縮減軍備，免除恐懼的自由——世界各處。

這是勇敢的言辭，但仍不過是言辭。言辭是外交的通貨，由來已久。像其他通貨一樣，它們都時常流於膨脹，於是乎失去了價值，不少次數它們曾經成爲真正無用。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務卿柯德爾」赫爾作過一次無線電廣播，演講詞仔細準備過，並且事先經過羅斯福總統的批准。赫爾在此時際所作聲明中有幾點使最後和平的觀念愈加模糊起來，他說，只限於那些贏得接受這個寶貴禮品的權利的國家與人民才能得到自由。這些特殊資格之一有如下述：

「我們始終相信——我們今日還是相信——所有準備與情願接受自由的責任的人民，不問種族、膚色或宗教的區別，都有享受安樂的權利。

「我們始終想法——我們今日還是想法——鼓勵與協助所有渴望自由，而準備担負其義務以獲得這種權利的人民。……」

「過去我們的目標是——我們將來的目標仍將是——利用我們的全部力量支持所有以他們的行爲表明他們够資格與有準備獲得自由的人民……」

在許多地方，赫爾國務卿的廣播的這一段被解釋爲對印度的警告，但假使是這個意思，甘地不過聳了聳肩背而未加注意。

下面一段被認爲專對維琪而言：

「所有這些進步——政治的進步，經濟的改善，社會的正義，精神的價值——每個民族只能以自己的工作與努力，自己的聰明的政策與行動作成。只有接受與培植人類權利與人類自由的概念與精神的地方才能做到。」

「任何民族或民族集團都不能制定一種計劃，或者供給一個方針，使任何其他民族能够完成或維持其本身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獨立、盛強、繁榮，並且達到崇高的精神目標。不過，任何民族是可以給予與接受協助的。」

假若這個機巧的警告是指着法國的貝當、賴伐爾派而發，就與助理國務卿威爾士的論調適相逕庭了，他告訴維琪駐美大使，「美國政府熱誠希望能够看見法國的復興與獨立及法國領土的完整。」

這個聲明表明美國贊成完全恢復法國的殖民地系統，可以解釋為戰後將印度支那交還法國。亞洲幾百萬土著人民從這種聲明能够得到什麼激勵呢？

然而，這不是原來的意旨，政策很快就改換了，六星期之後，威爾士先生在阿靈敦的演說中這樣說：

「假若這次戰爭真的是民族解放戰爭，它必須確定全世界民族的主權的平等，美洲各民族也是一樣。我們的勝利必須是各民族得到解放……帝國主義的時代已告終了……每一民族對於他們的自由的權利必須承認……不能容許有小集團的自私自利……來障礙人類福利的新陣線。」

又是勇敢的言辭。但是又沒有得到英國、荷蘭或三十二聯合國中的任何一國的正式贊同。

雖然赫爾國務卿在他的七月廣播講演中強調主要的問題是贏得戰爭的事實，他也強調規劃政策，當作戰爭法案，以待最後和平時期應用的必要。關於這點，他說：

「爲使戰爭充分進行不受阻礙——實際上，爲使戰爭的進行發生最有效的結果——美國應該時時，像他們採用大西洋憲章的作爲，擬訂與公佈他們對於根據持久的精神價值指示人類正當途徑的基本政策的共同見解。」

「必須促進一種有教養的輿論來支持這種政策。這是一件需要精深研究，嚴密思想，遠大眼光與引導的工作——不是政府單獨的，而是父母、教師、教士以及各個國家內所有負有精神、道德與智識的指導責任的人士的工作。標有公私職位的人士從來沒有担負過如此重大，強制的責任。」

威爾士先生曾被選任爲政府發言人，他曾用這個題目對輿論作過試驗，他主張先有一個很長的休戰時期，然後

分區於規定時間磋商和平，以代替短期的休戰與依據對合理的新國界與新經濟安排的胡亂斷斷所爲的和平。直到現在爲止，除了像支加哥 Tribune 這種報紙之外，還沒有反對這種長期休戰的提議的。

除了中國是唯一的例外，整個亞洲東部解放區域必須受聯合國的代表管理一個時期，長短因地而異，但都不會很短。戰勝者應有樹立一種國際統治及與各土著民族中的智識與具有政治頭腦份子合作的重大任務，直到知識份子的選民團形成，而其人民對自治有充分準備的時候爲止。

一九四二年八月，英國自由黨依據赫爾國務卿七月二十三日的廣播講演，制定該黨國際政策，宣稱：「全世界所有殖民地都必須受一國際團體的統治與保護。統治當局的指導原則必須是殖民地人民的幸福，「門戶開放，」訓練土人發展自由的制度以期他們能够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

這確實是鉅鉅的工作。在亞洲很多人口稀少的廣闊區域，現在平均每二萬未受教育的人民中不到一個合格的教師。僅是教育與訓練一批教師以教育與訓練將被解放的數百萬亞洲人民，就是一件龐大的驚人的工作。而且，像許多其他的因和平的臨迫需要迅即着手進行的工作一樣，對於訓練這批教師迄未還沒有基本計劃。甚至對那般將到切特聯合國救濟與訓練的地方去充當官吏與教師的男女施行必須的語言訓練，都還沒有準備。這些廣泛的計劃，如果要得到圓滿的成就，需要繼續克己與犧牲。戰爭延續到未來以後，聯合國的人民必將習有這種精神的。

美國副總統亨利·A·華萊士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對自由世界協會的演說曾經引起廣泛的討論。他說：

「任何民族都沒有剝削其他民族的天賦權利。先進的民族有幫助後進的民族走上工業化道路的特權，但不能有軍事的或經濟的帝國主義……是的，和平的時期到來時，國民有爲大眾幸福的較大利益犧牲較小利益的責任，至高無上的責任。計劃和平的人士應該顧及整個世界，不能够有剝削特權的民族。」

這樣一來，日本在公平分配於所有民族的東亞重新獲得了地位。有一點必須先弄明白，在日本懂得怎樣做滑太平洋各國的好鄰邦之前，她不要期望完全的自治政府。除非日本爲本身形成一種政府，可以算做維持遠東安定的和

平的合作力量，戰勝者必須保留干涉日本內政的權利。

直到日本表明真正願意遵守正當的國際行爲（這點也適用於德義），他們的國家必須是世界剝削特權的地方之一。華萊士副總統說絕不能有一剝削特權的民族，但是爲消滅國際強盜作過重大犧牲的各國一定要在一個時期內享有聯合的特權與嚴重的責任，重建國際法律與秩序，指導再造在清除最後戰鬥的烽烟時勢必半成灰燼的世界文明。

除了沒收她在她所侵略、征服與蹂躪的地帶的投資之外，不必要日本償付懲罰的賠款。不過，她必須賠償個人與社團被盜竊及因勝利的軍事行動而遭受損失的財產。但是，應該立即給予日本充分的糧食。戰勝者若對糧食物分配、醫藥援助與重建破碎的經濟等人道事件予戰敗者以差別待遇，則戰勝者的邪惡與他們所制止的殘酷並無二致。

日本在迅速與自由獲得亞洲鄰邦與亞洲其他部分的市場與原料這點，可以不受差別待遇，她所必須遭受的剝削特權，只應限於可能使她重新成爲太平洋和平的危機的活動方面，理所當然的，她應該削去參加維持世界和平工作的特權，和應該接受正當行爲的教訓，一如她是一個落伍的國家，不配處理她自己的事務。

日本的活力已經嚴重地枯竭了。國民的死亡大量超過出生，幾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早在一九四一年，日本投入全盤戰爭之前，國民生活水準就已經比一九三五—三六年的水準低落了百分之五十。

嚴格懲處犯罪國家是一件繁重的工作。甚至於在八月底由日本及東亞旁的部分裝載約一千五百名美國與他國難民的難民船 *Christaholm* 上，有些美國乘客就會召集會議，主張軟性的和平。說來可恥，戰事發生前這些美國公民在日本頗爲活躍，公開倡議對美國政府「加倍提防」的政策，支持日本侵略與野蠻壓迫被征服人民的行爲。

對人道主義的忠忱與不忠（甚至可以成爲不知不覺的背信）間的分別是極大的，有幾種型態的頭腦却不能領會。活躍聰敏的敵人特務人員時時準備利用不善思考與誤信謠論的人士，在這次戰爭期內——這次戰爭以前——敵

人特務人員企圖從全盤戰敗的毀滅裏挽救一部分的陰謀之一，是利用衆所週知的美國人民的「大同胞」的情操。

我們這個民族許多年來就情願倡導任何人道的計劃，獻出我們的同情，我們的財富與我們的力量以治療存在於世界任何部分的苦難。現在我們應該擴大觀點，懂得除非我們這個民族準備從事真正的繼續不斷的引導，協助預防這些苦難的發展，我們就無以談人道主義。但是我們的人道主義不應該是如此軟弱而愚笨的性質，容許另一種局勢發展，結果不可避免地走向另一次戰爭——而又發生拯救未曾餓死人民的新問題。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赫爾國務卿與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簽訂了一個少有人注意的互助協定，可作我們對遠東（日本在內）的經濟態度的典範，這個互助協定使美國與中國得以共同行動，「藉國際的及國內的適當辦法，以增加爲全世界人類自由幸福物質基礎之物品之生產、使用、交換與消費，並取消國際貿易間一切歧視待遇，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

這個聯合宣言沒有曖昧的烟霧，這是將來新太平洋憲章中的經濟宣言，不幸的，迄今只涉及中美兩國，但最終必將普遍適用的。

分析這個協定，不僅對中國人，甚至對美國人，都是有幾乎無法估計的重要的。在東方，僅以食物而論，中席之家的預算百分之七十到七十六用以購買食物，值得注意的在我國比率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中國、日本與所有東亞應該有一種最低水準的公共營養；這現在被認爲世界上所有政府的事務。價格與供應現在受着戰時法規與津貼的控制。假若我們與中國的經濟協定是戰後經濟的典範，有些類似的制度戰後仍應繼續施行。

戰爭結束時，美國將是世界空前的最大的原料與成品的生產者，並將擁有最多數目的熟練工人。在其餘世界的部分，則只將有毀滅與飢饉。假若不能資助仍在繼續毀滅中的生產，逐漸將戰時物資轉變成平時物資，那麼美國必將發生紊亂。完成這種生產的轉變，必須逐漸加高世界各地的生活水準——不只是放鬆國內的計口授糧與戰時禁令及國外的繼續的極度貧乏。

讓界與主權應當留待以後討論。首要的問題是運輸、食物與燃料的問題。假若這些問題處理得沒有效果，戰勝者還在舉杯祝捷時，飢餓的遠東就會瓦解，——這樣，勝利就毫無意義了。

希望和平衡之時因共同利益而自然產生的全世界的聯合的人士將要深感失望。甚至戰勝者之間也沒有着實統一的東西。只有最強大的戰勝者，除了他們的武力之外，具有領導的行動與決心，世界才會有秩序與公道。我們應該緊守我們最高的道德目標，因為假如我們忘記了我們對世界其他部分的道義上的責任，一旦敗壞的危險成爲過去時，武力的存在就成爲不能忍受的了。

戰後時期立即發生的危險之一，是美國人民將遭受整個遠東——一切外國——的頑端厭惡。我們的興趣曾經略形發展，關門過高，自然會趨於鬆弛，而轉向我們自身與我們自己的問題。這種厭惡確因高倡相反的要求的價值的批宣傳家的出現於華盛頓與美國其他地方而加深其程度。不同派系不同地域的自私與喧囂的叫喊者，勢將把我們的人道主義與公共熱心轉變成尖酸的大儒主義。

現在是我們宣佈與維持我們的威望的特權的千載一時的機會，過去我們缺少領導的心理。我們是自恃的民族，習慣於使旁人立定腳跟，然後叫他們「不用扶持的向前走」。我們爲了張伯倫干涉歐洲事務失敗駭責過英國，而之後英國竭力從事生存鬥爭時，我們拒絕討論在遠東採取干涉行動的需要。

戰事結束之後，與美國的力量與威望比較起來，歐洲集合的力量與威望將要大量減輕。在東方，中國將強大而重要，超過遠東任何歐洲國家地位之上。在歐洲，他們將自然的與英國，並在較小程度上與蘇聯結夥。在東方，我們應該與新中國一致行動，以代替我們過去的大半與英國一致行動。並且應該與澳大利亞、紐西蘭發生新的關係，兩國定將期望美國的而非英國的更多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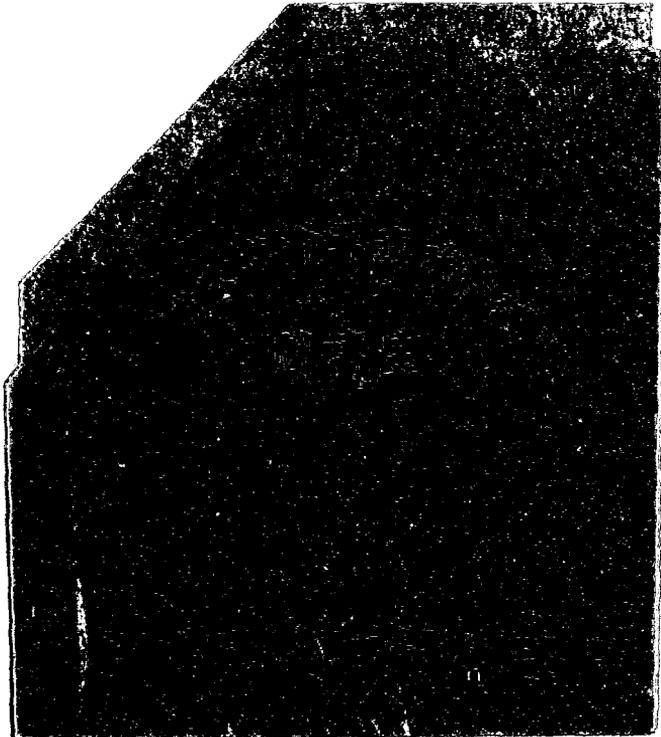
這種局勢需要一種極度柔性的和平解決方法。新民族將成爲新強國，日本將最後重現並得到世界遵守法紀國家同等的地位。假若擬訂一種非柔性的和平解決方法，對逐漸的與合法的改變不加規定，那麼改變定將企圖以暴力完

成，而這種企圖必將遭遇暴力。一九五〇年劃好的地圖到一九六〇年必定失去時效，除非草擬發展與改變的法律的工作被保守主義所阻止了。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給國會的咨文中，造下一個崇高、明晰的記錄。他說：

「我覺得我是代表美國人民說話——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也是代表與所有我們共同作戰的其他人民說話——當我說這是我們決心不但贏得勝利而且維持隨後的和平的安全的時候。我們今天爲安全，爲進步與爲和平而戰，不僅是爲了我們自己，也是爲了全人類，不僅是爲了一代，也是爲了子孫萬代。我們是爲洗清世界上的昔日的罪惡與昔日的災禍而戰。」

美國人民現在正爲求勝利而作戰與犧牲，希望戰後世界的災禍有個公正的調整。假若我們幫助制定有只正當利用美國武力才能維持的公正和平，而且假若之後又回到孤立主義，拒絕利用這種武力，則一切的成就等於零——甚至我們的善良的宗旨。而地獄將有一條貶謫的天使從未夢想到的華麗的通道。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太平洋憲章 (全一冊)

Pacific Charter

◎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Hallet Abend

譯者

朱金庭
光永祚

發行人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顧樹森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二三三六) (滬印)



712.04
35

8487

2 14

(13326)